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专 论

- 3 李建民 /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路径与趋势

冷战史研究

- 31 沈志华 /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
- 61 艾伦·林奇 / 美国与中苏联盟（1950-1965年）
- 91 俞紫梅 / “冷战”与“解冻”：双重背景下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调整（1953-1964年）

政治思潮研究

- 110 郭丽双 / 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
- 143 周 超 / 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的兴起——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的分析

地方·地区研究

- 176 宋铁勇 / “地方性”视角的中东路事件——基于地方史料的研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曲文轶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9 年第 6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Ли Цзяньминь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 Путине: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и тенденции (3)

Шэнь Чжиху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опроса кредита США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1943-1946 гг.)---Исток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ежду США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31)

Аллен Линч

США и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альянс(1950-1965 гг.) (61)

Юй Цзымэй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и «оттепель»: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1953-1964 гг.) (91)

Го Лишун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еоевраз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110)

Чжоу Чао

Рост правого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и крайне правого популизм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Анализ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143)

Сун Теюн

Инцидент на КВЖД с «локаль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На основе изучения мест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176)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9 年第 6 期 (双月刊)

Contents

Li Jianmin

Russian Economy under Putin: Development Path and Trends····· (3)

Shen Zhihua

A Historic Review of American Loans to the Soviet Union (1943-1946)---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the U.S.-Soviet Economic Cold War (Part
one) ····· (31)

Allen Lyn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50-1965) ·····(61)

Yu Zimei

“The Cold War” and “Thaw”: The Soviet Union’s Adjustment in Its Foreig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olicies against the Twofold Background
(1953-1964) ····· (91)

Guo Lishuang

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Conception of Neo-Eurasian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Russian Civilization ····· (110)

Zhou Chao

The Rise of Radical Right-wing and the Extreme-right 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 (143)

Song Tiejong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Incident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Based on Local
Historical Data····· (176)

专论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路径与趋势

李建民*

【内容提要】普京执政的20年，对于俄罗斯国家重塑和大国地位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普京上任之初提出的维护国家统一和重振大国荣耀的目标已经实现；与之相比，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现状则与其国际地位和影响不相匹配。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陷入停滞，普京2008年提出的到2015-2020年俄罗斯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的目标，亦成镜花水月。俄罗斯经济发展滞后，既受到全球化周期性因素结束、国际战略环境恶化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也受到自身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制约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制造业的衰退、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及固定资本投资的不振。普京在第四个总统任期，再次提出到2024年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的目标，其施政重点重新聚焦社会经济领域，着力解决增长和民生问题。在经济方面，实现多元化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长期政策目标，其目的是使传统产业继续发展，同时使经济结构得到逐步调整，以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未来5年，预计俄罗斯政府在经济领域较少会有大刀阔斧的深入改革，但会通过产业、金融、财政、投资、出口政策的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如何将经济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的“突破式”发展，仍是俄罗斯面对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制造业 俄罗斯资源依赖 俄罗斯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D851.2; F156.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6-0003(28)

*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1999年8月9日，叶利钦解散斯捷帕申政府，任命普京为代总理。自此算起，普京主政俄罗斯已满20周年。普京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将持续到2024年。如何评价普京20年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到2024年，普京能否完成自己提出的目标：使俄罗斯重回世界经济前五强？本文试从普京执政20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经济陷于停滞的深层次原因、政府经济政策取向和经济发展趋势等角度，来回答以上问题。

一、普京20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

以2008年为界，普京2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第二总统任期（简称1.0和2.0）为第一时期。2008年以后，与梅德韦杰夫的“双核”体制、普京第三及当前的第四总统任期（简称3.0和4.0）为第二时期。

普京是在叶利钦时期建立的市场经济框架内开始其任期的。从经济政策角度看，普京1.0是以全面调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振兴经济、实施强国战略为主线；改革和加强国家控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特征。普京上任后，对叶利钦时期的改革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强调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走自己的改革道路，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制定并实施所谓的格列夫计划（“2000-2010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方案”），实施税收和养老金改革，制定土地法典，大幅度减少创业和经营障碍，启动公务员制度改革，加快俄罗斯入世谈判等。普京2.0继续了1.0阶段的部分改革，但也有一些新的调整，主要是惩治寡头，开始了早期的国有化。总体看，这一时期的改革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宏观经济的稳定和获得投资国际评级，使外国投资急剧增加，俄罗斯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1999-2008年，俄罗斯GDP连续10年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保持了年均7%的快速增长，GDP总量增长了94%，人均GDP增长了1倍。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俄罗斯经济史上除新经济政策时期和国内战争之后的经济复苏^①外最辉煌的10年。^②2006年，俄罗斯进

① 斯大林工业化期间，俄罗斯人均GDP年均增长5%，低于普京执政第一时期。

② Кирилл Рогов. 20 лет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ежима. 09.08.2019. <https://www.e-vid.ru/politika/090819/20-let-vladimira-putina-transformaciya-rezhima>

入全球GDP超万亿美元经济体俱乐部，成为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显示出强势回归的势头。同期内，除了改革之外，动员富余劳动力和富余产能以及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都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据不同估计，1998-2008年，国际油价几乎上涨了8倍(从年均每桶13美元涨到97美元)。由此普遍认为，普京执政第一个8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1/3到50%是油价上涨带来的。但这种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其增长效应在2008年已经耗尽。普京在2.0卸任前，组织制定了《2020发展战略》^①，提出必须走创新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转型，到2015-2020年使俄罗斯经济进入世界前五强的目标。^②

普京20年的第二时期与第一时期相反，2008年以来，俄罗斯共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2009、2015年)、一次国内政治危机(2011-2012年莫斯科大规模抗议活动)、三次战争(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战争)，和长达5年的西方制裁(至今^③仍未取消)。这些非常规事件构成了普京20年第二时期的主要情景。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经济政策的最大特点，是从常规条件下的促增长转向反危机，造成所承诺的改革无法实施，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无法实现。俄罗斯经济经历了2008年危机后，在2010-2011年实现快速复苏，但自2012年起经济又开始放缓。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和西方因俄归并克里米亚发起制裁后，俄经济快速进入了负增长和低增长区。2009-2018年，俄罗斯GDP年均增幅仅为0.9%，大大低于世界经济3.2%的年均增幅；俄罗斯GDP规模从2013年峰值时的2.289万亿美元，缩水至2018年的1.58万亿美元，回落到2008年的水平；在全球经济中占比1.67%，排名已从第6位降至第12位。俄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认为，俄罗斯已被拖入长期停滞的泥潭。曾担任过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的伊拉里奥诺夫认为，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停滞已持续11年，这期间的GDP年均增长甚至低于苏联停滞时期的年均增长(勃列日涅夫8年停滞时期经济累计增长17%)。普京时期的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а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7 ноября 2008 г. №.1662-р.

② 系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进入世界前五。

③ 注：2019年年底。

停滞比勃列日涅夫时期情况更艰难、更停滞。^①姑且不论伊拉里奥诺夫的批评是否合理（此人对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表现长期持批评态度），从统计数据中还是能够看出俄罗斯经济与世界总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化，俄罗斯2014年以来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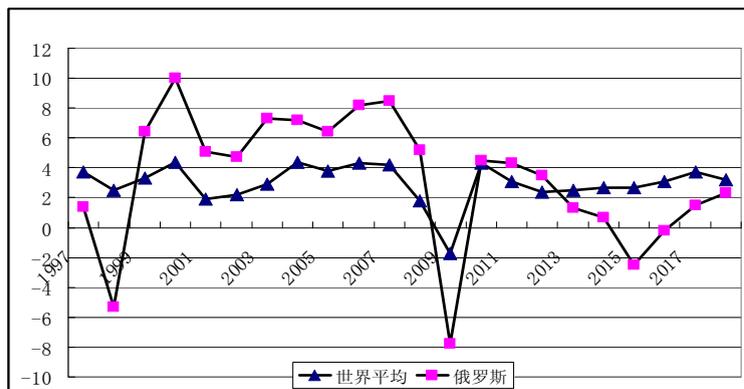


图1 1997-2018年俄罗斯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比较 (同比, %)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世界经济预测）；俄罗斯统计署相关年份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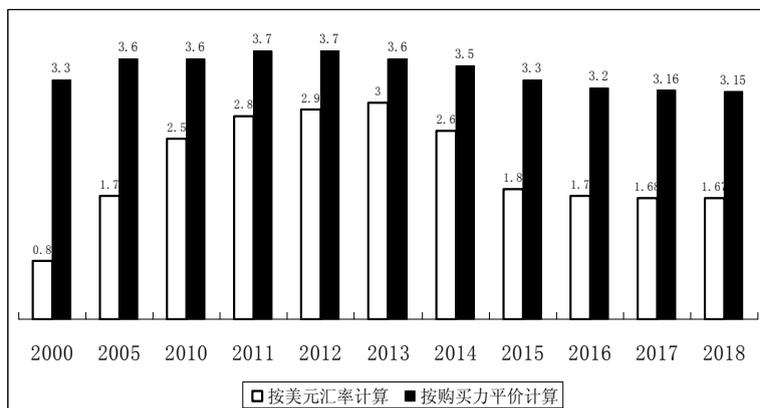


图2 2000-2018年俄罗斯GDP在世界中的占比 (%)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关报告数据制作。

^① Андрей Илларионов. Даже во времена засто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ла быстрее, чем сейчас. 14.11.2019. <https://www.obozrevatel.com/russia/dazhe-vo-vremena-zastoya-ekonomika-rosla-byystree-chem-sejchas.htm>

二、经济陷于停滞的原因

拖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既有外生性的冲击因素，也有内部因素，二者之间又相互交织、强化和放大。外部因素是指全球化的周期性因素和地缘因素，内部因素是指俄罗斯固有的结构性因素。综合来看，内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相对更大。

（一）外生性冲击因素

1. 全球化周期性因素影响

如前所述，进入 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保持十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全球化周期性因素带来的良好外部环境，包括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大宗商品价格长时间的上涨、快速的出口增长等。全球化周期性因素给新兴经济体国家带来普遍的发展机遇，其中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俄罗斯的影响尤为深刻。

资本流动周期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大约每 15 年完成一次方向性的变化周期。自 2003、2004 年起，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低利率和流动性扩张政策，促使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从 2005 年开始，国际资本呈现出对俄罗斯的净流入。资金的大规模流入，使俄外部融资成本大幅下降；资本流入俄罗斯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并推高了这些资产的价格。这一时期，俄罗斯进入了全球对外资吸引力最大的前十行列。但资本的快速流入，掩盖了财富积累增长背后的系统性矛盾。2013 年后，美国启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美元升值和资本从新兴市场向发达市场的转向回流，标志着这一周期的结束。

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和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2003 年开始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以能源资源出口为主的俄罗斯是另一大利好。全球经济迅速增长和流动性扩张，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需求。2000-2008 年，俄产乌拉尔牌石油，平均价格从每桶 23.94 美元上涨到 90.68 美元；能源成为俄主要出口创汇产品。这一时期，原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在出口构成中占比，从 1994

的 40%和 1997 年的 45%上升到 63%，石油出口累计收入 6465 亿美元^①，对联邦财政预算收入的贡献率达到 45%-50%。俄居民人均收入，从相当于 OECD 国家的 33%提高到 50%。^②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油价在经历了 2009 年的下跌和 2011 年的回升之后，于 2014 年再次大幅下跌（俄产乌拉尔牌石油价格下跌 45%）。以油价暴跌为标志，大宗商品价格超级上涨周期告一段落，俄罗斯成为油价暴跌的最大受害者。

表 1 2000-2015 年俄罗斯原油价格和出口量

年份	平均价格 (美元/桶)	出口总量 (亿吨)	出口价值 (亿美元)	年份	平均价格 (美元/桶)	出口总量 (亿吨)	出口价值 (亿美元)
2000	23.94	1.44	252.72	2008	90.68	2.43	1611.47
2001	20.78	1.65	249.90	2009	55.61	2.48	1005.93
2002	21.02	1.89	291.13	2010	74.11	2.51	1357.99
2003	23.81	2.28	396.79	2011	101.74	2.45	1818.12
2004	31.02	2.60	590.45	2012	103.14	2.40	1809.29
2005	45.21	2.53	834.38	2013	100.41	2.37	1736.68
2006	56.32	2.48	1022.83	2014	94.21	2.24	1538.96
2007	64.28	2.59	1215.03	2015	50.12	2.45	895.88

资料来源：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в России за 2000-2016 год. 06.2016. <http://total-rating.ru/1674-eksport-nefti-v-rossii-za-2000-2016-god.html>

可以看到，普京 1.0 和 2.0 与上一经济周期，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基本吻合；其间，国际原油价格的反复拉升给俄罗斯经济注入了额外的动力，初级产品净出口额几乎达到 GDP 的 20%，使其得以保持了 7% 的快速增长。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随着周期性因素的相继终结，原本促进俄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条件已不复存在。

2. 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西方违背政治承诺，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此举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势必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普京认为，俄罗斯是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受害者，一直面临由美国主导的直接或者间接的

①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в России за 2000-2016 год. <http://total-rating.ru/1674-eksport-nefti-v-rossii-za-2000-2016-god.html>

② 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жнев. Расти стабиль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Бизнес-газета. 17.12.2013. №. 49(927). <https://rg.ru/2013/12/17/struktura.html>

外部威胁。自 1999 年底执政开始，普京就致力于实现如下两大重要目标：捍卫俄罗斯国家统一，重振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2014 年，俄罗斯与西方因乌克兰危机，爆发了冷战后最严峻的地缘政治较量。美国、欧盟以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事件、叙利亚化武危机、俄干预美国大选、俄特工在英国中毒案等多种理由，发起了对俄制裁。尽管俄罗斯政府称，俄经济在长期制裁下情况一切正常，但制裁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小觑。制裁与油价下跌的叠加效应，恶化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引发资本大规模外流。2019 年 8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俄罗斯经济报告》指出，自 2014 年以来的西方制裁和全球油价下跌等种种不利因素，导致俄经济年均增长率低于预期；其中制裁使俄经济增长年均下降 0.2%^①，油价下跌使经济年均下降 0.65%^②；俄罗斯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增长，分别占 0.1 和 0.2 个百分点。2014-2018 年，俄 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 0.5%，低于预期 2%。^③彭博社专家认为，由于制裁和其他多种原因，俄罗斯 GDP 自 2014 年以来少增长了 6%。^④

（二）自身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低、质量效益的优劣，主要是由增长的动力决定的。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四大因素：要素配置、需求优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

要素配置：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一国国民财富的基本性质和增长的原因，是其代表作《国富论》研究的主题。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讲，劳动分工实质就是对劳动力要素的一种优化配置。

需求优化：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通过政府干预或

① 相当于 1 万亿卢布，按当年汇率计为 150 亿美元。

② 按当年汇率计 487.5 亿美元。

③ “Russian Federation 2019”, IMF Country Report No.19/260, August 2019, <https://www.imf.org/Publications/CR/2019/1RUSEA2019001.ashx>

④ Экономисты оценили потери России от санкций в 800 млрд. 14 авг. 2019. <https://www.rbc.ru/economics/14/08/2019/5d51780c9a7947cd5eb6eb56>

者其他手段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总需求均衡于总供给，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凯恩斯的理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奉行的“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需求动力原理”，即来源于凯恩斯的理论。

技术创新：源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将创新归结为五种情况：第一，生产新产品；第二，使用新技术；第三开辟新市场；第四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第五，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进一步强调，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与经济组织的组织者是企业家，促使他们进行创新活动的是“企业家精神”；这种创新活动能够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因此，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活动，以及促进这种创新活动的“企业家精神”。

制度变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其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实质就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这里的“制度”包括体制机制以及经济制度等内涵。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诺斯理论体系的基本要义为：“一套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有效率的产权保护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所在”。

按照以上经济增长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可以对影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原因做一个学理上的分析。

1. 制造业萎缩削弱俄罗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俄罗斯经济陷入持续低增长，表明其增长的根本动力不足。从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来看，一般认为俄经济具有较高的资源依赖特征。普京 20 年，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部门，能源部门是基本的增长动力。在对资源过度依赖的同时，俄罗斯出现了“去工业化”特征。

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不同，俄罗斯实施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去工业化”。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主要靠激进转型和“消极适应”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所谓高度化。这种调整不是通过明确的产业政策去扶持某个产业或部门、加快其经济增长来实现的；相反，它是通过各部门生产下降的幅度

大小来实现的。通过这一“消极适应”，在加工制造业大幅萎缩的背景下，服务业在三次产业关系中的比重迅速提高。2000年后，“去工业化”表现为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趋强。由于原油价格反复拉升导致的大量名义出口增长换来的超额收益，支撑了俄罗斯的投资性消费和居民最终消费，促使俄罗斯国内所有要素流向资源型行业，形成“能源推动效应”。资源收益又导致俄罗斯国内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提升，但由于俄本国制造业竞争力缺乏，引发大量进口制成品。由此，强化了以出口资源换取外汇，从国外进口制成品，从而进一步挤压国内制造业发展空间的恶性循环。这一循环导致俄罗斯制造业进一步萎缩，和工业内部结构进一步原材料化。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俄罗斯制造业产值占比、就业人数、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额呈现持续下降，出现了自发性和退化性的逆工业化趋势。可以认为，正是这种逆工业化，最终削弱了俄罗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制造业衰退是俄罗斯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也是导致其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

从认识上说，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脊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重点。德勤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提出，只有制造业生产部门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持续的影响。踏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取得成功的案例也证明，制造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民生福祉增长至关重要。现阶段，俄罗斯制造业却是高科技生产与落后、低竞争技术的共生体。^①詹森合伙咨询公司2018年发布的俄罗斯和世界加工制造业报告指出，由于20世纪90年代工业潜力的丧失，2000-2015年，俄罗斯国民财富的增长率是发展中国家^②中最低的国家之一。从2017年的数据看，俄罗斯一、二、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4%、36.3%、59.7%。^③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工业绝对值规模偏低。制造业的现有规模和多元化，还不足以在俄罗斯国内工程、机床行业、电子和电信行业实现工业突破，经济转型和优势重塑的难度加大。

① Гла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15.07.2015. <https://torgprominfo.com/news/glavnye-problemy-rossijskoj-promyshlennosti/>

②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е(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13 стран). Август 2018 года. json.tv/ict_telecom_analytics_view/obrabatyvayuschaya-promyshlennost-v-rossii-i-v-mire-sravnitelnyy-analiz-13-stran-20180816061422

③ ВВП России по секторам экономики. https://spravochnick.ru/ekonomika/struktura_sektorov_ekonomiki/vvp_rossii_po_sektoram_ekonomiki/

制造业的发展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竞争力水平。2000 年以后,俄罗斯制造业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系统性危机后开始恢复增长,但仍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2003 年,俄罗斯的能源工业恢复到了 1991 年的水平。但直到 2017 年,俄罗斯的整体工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 1990 年的水平,其中制造业比 1990 年低 20%,这一差距反映出制造业产出对经济的推动力不足。2015 年,俄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 1.2%。^①就制造业产值而言,俄罗斯比中国少 95.45%,比美国少 93%,比日本少 83%。俄罗斯不仅落后于印度,而且落后于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指标正在迅速接近俄罗斯。2005-2015 年,俄罗斯是这 10 年中唯一一个在其他国家制造业产值明显增长的背景下,其产值(绝对值)却下降的国家。^②导致俄罗斯制造业长期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匮乏。大量外商投资集中在能源行业,制造业投入严重不足,进而造成产出不足。

表 2 俄罗斯与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比较
(单位:亿美元,1995-2015 年)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CAGR 2000-2015
中国	155	252	509	1400	2973	17.9%
美国	814	1015	1163	1208	2170	5.2%
印度	44	47	90	178	311	13.5%
日本	910	770	712	842	810	0.3%
德国	402	308	461	556	690	5.5%
俄罗斯	39	33	86	138	135	9.8%
印尼	22	21	41	87	180	15.3%
英国	151	154	185	163	249	3.2%
法国	163	138	183	182	243	3.9%
意大利	150	140	207	221	258	4.1%
韩国	101	109	179	245	370	8.5%
泰国	20	18	32	60	106	12.5%
马来西亚	18	24	31	47	67	7.1%

资料来源:转引自 J'son & Partners Consulting 根据 OECD 数据整理。

①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е(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13 стран). Август 2018 года. json.tv/ict_telecom_analytics_view/obrabatyvayuschaya-promyshlennost-v-rossii-i-v-mire-sravnitelnyy-analiz-13-stran-20180816061422

② Там же.

表3 俄罗斯创新活动主要指标变化（2013-2017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工业生产					
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在全部企业中的占比，%	9.7	9.7	9.5	9.2	9.6
用于技术创新的支出（亿卢布），按现行价格计算	7467.8	7627.7	7357.6	7775.2	8480.5
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299.5	284.6	254.2	259.5	269.1
在所生产完成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占比，%	2.2	2.1	1.8	1.8	1.7
创新型商品和服务总量（亿卢布），按现行价格计算	30725.3	30374.1	32582.5	37236.9	34030.6
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1232.3	1133.2	1125.6	1242.9	1079.7
在所生产完成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占比，%	8.9	8.2	7.9	8.4	6.7
电信和信息技术					
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在全部企业中的占比，%	10.3	9.5	9.4	7.7	8.0
用于技术创新的支出（亿卢布），按现行价格计算	661.3	470.7	667.2	527.3	546.3
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26.5	17.6	23.1	17.6	17.3
在所生产完成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占比，%	3.6	2.4	3.3	2.3	2.3
创新型商品和服务总量（亿卢布），按现行价格计算	710.9	629.3	860.5	809.6	1112.5
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28.5	23.5	29.7	27.0	35.3
在所生产完成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占比，%	3.9	3.3	4.3	3.5	4.8
农业					
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在全部企业中的占比，%	3.4	3.1
用于技术创新的支出（亿卢布），按现行价格计算	149.6	158.1
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4.9	5.0
在所生产完成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占比，%	0.9	1.0
创新型商品和服务总量（亿卢布），按现行价格计算	222.2	284.5
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	7.4	9.0
在所生产完成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占比，%	1.4	1.8

资料来源：Иннов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динамика основных показателей. 26 сен 2018.
<https://issek.hse.ru/news/224259845.html>

俄罗斯制造业产出动能不足大大削弱了技术创新的能力，导致对国外技术依赖不断增加，反过来使其本国经济创新发展动力进一步不足，最终削弱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从技术创新看，2013-2017年，只有约9.5%的俄罗斯企业（2017年工业部门仅有2321家）开展创新活动。该指标在欧洲国家中排名第28位，处于靠后位次，仅超过罗马尼亚（6.4%）。^①欧洲发达国家的指标分别为：德国58.9%、芬兰52%、法国46.5%、英国45.7%、丹麦39.4%。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署的数据，科技对俄罗斯GDP增长的贡献率，2011年为19.7%、2015-2018年在21.3%-21.6%之间。^②不仅低于先进国家的水平，也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在俄罗斯出口构成中，创新和高技术产品只有6%；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上，俄罗斯的份额只有0.5%。当前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大背景下，只有科技创新才能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俄罗斯创新科技创业错过了黄金发展期，致使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缺乏新的引擎。

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进出口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该国国内的资源状况、产业发展状况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长期以来，俄罗斯出口商品构成中，资源能源类产品占65%-70%；进口商品构成中，高技术和制造业产品为第一大项，占60%以上。据俄罗斯工业贸易部数据，截至2014年西方发起对俄制裁时，俄罗斯约一半的工业部门中，进口产品占同类产品销售总量的50%以上。其中重型机器制造业达70%-80%，制药业80%-90%，民用飞机制造业80%，石油天然气设备60%，农业机器制造业50%-90%。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推出了进口替代政策。俄政府不仅希望通过进口替代缓解西方制裁的影响，还希望能藉此实施再工业化和结构调整的政策，从而扭转工业落后的局面。根据进口替代计划，到2020年，俄总体进口依存度将从88%降至40%。其中机器制造业从44%降至29.5%，石油天然气设备从60%降至43%，飞机零部件从92%降至71%，汽车零部件从44%降至38%，船舶从55%降至30%，联合收割机从67%降至36%，履带式拖拉机从98%

① Иннов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динамика основных показателей. 26 сен 2018. <https://issek.hse.ru/news/224259845.html>

② Доля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снизилась до уровня 2015 года. 06 фев 2019. <https://www.rbc.ru/economics/06/02/2019/5c598ccb9a7947731eea7477>

降至 53%。^①进口替代政策自 2014 年实施 5 年来，效果并不理想，所提出的计划指标有很大一部分未能完成。根据俄罗斯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的监测报告，截至 2018 年，俄部分工业部门的进口依存度仍高达 60%–80%，机床制造业甚至上升至 92%–93%。该报告称，制裁期间，不愿放弃从国外购买技术和原材料的俄罗斯企业数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其中对机器设备的采购情况最糟糕，2015 年有 30%的企业曾表示准备减少（或完全转向国内）从国外采购机器、机床和技术；到 2017 年，这一数字下降到 7%。准备减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转向国内采购的企业占比，从 2015 年的 22%降至 8%。^②俄罗斯智库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市场行情调查实验室的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拒绝放弃从国外采购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国内缺乏同类质量的产品”。^③这表明，由于消极“去工业化”和多年的“资源依赖”，俄罗斯工业体系的完整度和技术水平受到了极大影响，造成高技术产品、机床、机器设备制造等部门的瘸腿，无法完成进口替代的任务。与培育产业和产品所需的时间、投资、技术和人才相比，选择继续从国外进口高技术产品和基础性工业制成品，实为无奈之举。

表 4 俄罗斯部分工业部门的进口依存度（2017 年）

工业部门	进口依存度 (%)
机床制造业	90
重型机械制造业	60–80
轻工业	70–90
电子工业	80–90
医药工业	70–80
食品工业用机器制造业	60–80

资料来源：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т импорта превысила 90%. 15.11.2018. <http://www.finanz.ru>

① Как выглядят планы по замещению импортных товаров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Взгляд. 21 июля 2015. <https://vz.ru/infographics/2015/7/21/757291.html>

②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т импорта превысила 90%. 15.11.2018. <http://www.finanz.ru>

③ Сергей Цухло выступил на круглом столе по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ю. 25.09.2019. <https://www.iep.ru/ru/novosti/sergey-tsukhlo-vystupil-na-kruglom-stole-po-importozameshcheniyu.html>

2. 高度国有化难以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国家控制资源主导发展的方式来确保经济增长。普京 2.0 以来，俄罗斯政府逐渐把油气资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银行的控制权收归国有，对大型国有企业实施国家控股。俄罗斯联邦反垄断署在 2016 年竞争环境报告中指出，俄罗斯政府通过国有化把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①这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第一，国有经济表现形式。俄罗斯的国有经济主要由以下三种形式构成：有国家参与的公司（КГУ）^②，根据OECD的界定标准，所有国家持股超过10%的公司都属于这类（在俄罗斯为国家持股25%以上的公司）；履行国家管理功能的部门（СГУ）^③；国有单一制企业（ГУП）^④。俄罗斯的国有经济高度集中在能源、银行和其他“战略性行业。”

第二，国有经济规模。国有化程度应该多高，世界各国情况不同，也没有统一标准。目前俄罗斯经济的国有化程度有多高，没有统一权威数据。根据俄罗斯联邦反垄断署等俄罗斯国内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评估，俄罗斯国有经济比重 2005 年为 35%–40%，2015 年以后提高到了 46%–70%，目前一般认为在 40%–46%左右。从国有经济三种表现形式看，三者加总在GDP中占比已从 2000 年的 31.2%提高到了 2017 年的 44%。其中有国家参与的公司占比从 20%提高至 28.7%，履行国家管理功能的部门占比从 7.1%提高至 13.7%，国有单一制企业占比则从 4.1%降至 1.6%。^⑤

在不同的部门，国有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交通、电力、采掘业等垄断行业的国有化程度最高，而农林、贸易、轻工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化程度较低。

① Оценка состояния конкурентной среды в России. 2016. <http://ac.gov.ru/files/publication/a/8979.pdf>

② Компании с гос. участием-КГУ

③ Секто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СГУ

④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нитарн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ГУП

⑤ Ольга Соловьева. Долю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экономике оценили по-новому. 26.12.2018. http://www.ng.ru/economics/2018-12-26/4_7474_gossektor.html

表 5 俄罗斯国家在其各经济领域内的参与程度

部门	国有公司的销售收入占同行业最大的 100 家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 %
交通	83
电力	70.9
采掘业	70
金融保险	46.8
公用事业	31.9
机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30.9
信息化、通信、媒体	22.7
建筑业和建材业	18.4
商业性房地产	15.9
教育*	11.8
医疗卫生*	11.5
化工	9.3
咨询、法律、保安	8.5
酒店服务和公共餐饮业	6.7
冶金业、冶金制品和冶金开采	4.4
文化、艺术、体育、彩票业*	3.5
制药业	2.6
林业和木材加工	1.3
贸易	1.1
农工综合体和食品工业	1
轻工业	0.7

资料来源: Эксперты ЦСР: доля госсектора в экономике достигла 46%. 11.05.2018.
<http://2035.media/2018/05/11/gossector/>

*不考虑有财政预算支持的企业

第三, 俄罗斯国有经济的效率。国有企业的通病是效率低下、因而会拖累经济增长的说法, 主要源于以下西方产权理论。

“代理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 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 因而难以实现对管理人员工作绩效的有效激励。由于国有企业代理链条成本过长, 其代理成本也就更大。

“搭便车问题”——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属于全体公民, 因此个别公民并没有任何动力去监督企业管理者的行为, 而是希望“搭便车”, 即, 由别人去监督而自己受益, 因此将不会有人真正履行监督责任。

“预算软约束问题”——作为政府的延伸, 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是

“软性的”，即，在产生亏损或面临破产时，由于常常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援助，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和决策难以受到竞争压力，从而造成企业管理的无效率。

从国际比较看，笼统地说国有经济效率一定比私营经济低、国有经济拖累经济增长，似乎不够准确。OECD 成员国中，挪威、瑞典、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法国、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均保持了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关键是看国有经济的管理水平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有经济由于能够依靠政府优势垄断大部分资源，在资金使用方面一直优于非国有经济。这对其他企业会产生挤兑和阻滞效应，严重阻碍市场准入和竞争，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使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非国有经济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俄罗斯国有企业治理的样本经验表明，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表现更差。其特征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市场竞争较少。政府控制国家采购更加剧了竞争的缺乏，尤其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效率普遍比较低。俄罗斯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与国有产权指数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据测算，国有部门比重平均每增加 1%，GDP 增速会下降 0.5%。因此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国有部门的扩大有很大关联。^①2019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也认为，政府在企业中的份额与企业的效率成反比。

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署的数据，2018 年，俄罗斯有国家参与的公司只有 66% 是盈利的，低于 72.6% 的平均水平；而在亏损方面，表现最差的是国家参股的酒店和公共餐饮企业（亏损率 62.5%）、国防工业（亏损率 60%）、建筑业（亏损率 58.8%）及批发、零售和维修企业（亏损率 53.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约有 3 万家俄罗斯国有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没有反映在国家预算报表中。^②根据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调查，俄国有公司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私营公司：2006 年，私营公司的人均产值为 491 万卢布；而国家间接参股和直接参股的公司，人均产值分别为 398 万卢布和 139 万卢布。

① Ольга Соловьева. Долю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экономике оценили по-новому. 26.12.2018. www.ng.ru/economics/2018-12-26/4_7474_gossektor.html

② В России стало меньше госкомпаний. 12 авг. 2019. <https://www.rbc.ru/economics/12/08/2019/5d4c347c9a7947a615e02b77>

2014 年，私营公司在平均总赢利指标^①方面仍居于领先地位，为 1253 万卢布；国家间接参股和直接参股的公司，分别为 1179 万卢布和 464 万卢布。2014 年的资本赢利率差异不大，私营公司为 9%；国家间接参股和直接参股公司，分别为 8.77%和 7.71%。^②

第四，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俄罗斯的国有化和私有化一样，带有自己的特色。普京 2.0 结束前，通过组建超大型国有旗舰型公司，安排核心圈的高官到俄罗斯最大也最赢利的“国家公司”任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形成新的利益集团。新官僚利益集团的崛起，成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俄罗斯被称为“伪国有化”和“私人的国有公司”，“以现代化为幌子的腐败”。这些公司一方面要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制度运作，另一方面也要遵循腐败的“潜规则”，向政府寻租以获取资源控制权，满足国家寡头的个人利益。官僚利益集团控制国有公司不但有损市场秩序，而且阻碍改革，恶化营商环境，引发资本外流，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大量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扭曲了市场竞争秩序。长期看，这种国家控制资源主导发展的模式，很难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俄总理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低效的，俄罗斯的发展缓慢与国有垄断直接关联；要实现创新发展，提高竞争力，必须进行制度改革。^③俄现任审计署长库德林在给普京 4.0 准备的智库报告中提出，俄罗斯要实现成为世界经济前五强的目标，首先要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真正建立起能够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模式。^④

3. 固定资产投资率偏低制约了经济增长

根据 2008 年制定的《2020 发展战略》，到 2020 年前，俄罗斯要摆脱过度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模式，实施全面现代化，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为此，至少需要 2 万亿-2.5 万亿美元的国内及国外投资。根据《俄罗斯联邦

① 扣除成本获得的利润

② Эффект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ю в 2018-2024 гг. и до 2035 г.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Москва, январь 2018. <https://www.csr.ru/news/gossektor-ekonomiki-inertiya-ili-effektivnost/>

③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 10 сентября 2009.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13>

④ Эксперты ЦСР: доля госсектора в экономике достигла 46%. <http://2035.media/2018/05/11/gossektor/>

至 2024 年经济发展预测》报告，为实现进入世界经济前五的目标，自 2020 年起，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必须加速，超过平均增速。普京 3.0 和 4.0 的两次五月命令，均提出将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高至占 GDP25%的要求。

从俄罗斯的现实看，1999 年普京上任时，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为 14.4%；2008 年达到峰值，为 22.3%；2011-2018 年，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在 20%左右徘徊。^①若以 1990 年为基期，苏联解体近 30 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一直没有恢复，2018 年仅相当于 1990 年的 73.6%。^②总积累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偏低，无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有时甚至是反向拉动经济。与此同时，作为补充投资来源的外资流入量少，平均相当于 GDP 的 0.2%。考虑到流入外资中 30%是俄罗斯外流资金的回流，则外资对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低。根据俄罗斯央行的统计，1994-2018 年的 25 年间，只有 2006、2007 两年俄罗斯出现了资本净流入，其他年份均为资本净流出。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制裁更加大了投资的风险，2008 和 2014 年俄罗斯均出现资金的大规模外流，分别达 1336 亿美元和 1541 亿美元。

表 6 1994-2018 年俄罗斯资金流入/流出情况（亿美元）

年份	流出/流入	年份	流出/流入	年份	流入/流出
1994	-144	2003	-19	2012	-539
1995	-39	2004	-89	2013	-61
1996	-238	2005	-3	2014	-1541
1997	-182	2006	437	2015	-569
1998	-217	2007	878	2016	-154
1999	-208	2008	-1336	2017	-313
2000	-248	2009	-575	2018	-600
2001	-150	2010	-308	2019	-
2002	-81	2011	-814	总计	-7662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编制。

① 2011-2018 年，俄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20.7%、20.9%、21.2%、20.5%、20%、21.2%、21.4%和 20.6%；2018 年已低于 2011 年水平。

②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Инвестици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Москва, 2019. https://www.fbk.ru/upload/docs/Investments_report.pdf

俄罗斯固定资本投资率低，有多种原因，国内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差是基础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对俄罗斯银行体系缺乏信任；复杂的税收会计体系和官僚体制；司法制度薄弱；现有法律对企业家保护不力等。除此之外，国有经济投资少、效率低也是重要原因。据俄罗斯战略分析所的报告，私人投资在俄固定资本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17年最高峰时达到 59.7%；国有投资则呈现下降趋势，2017 年的占比仅为 14%。俄固定资本投资最大的流向是采掘业，2017 年占 19%。^①改善营商和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投资，是俄罗斯政府未来的政策重点。

三、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取向

发展经济是普京 4.0 最重要的任务。2018 年 5 月 7 日，普京在其第四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上，提出未来 6 年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俄罗斯要实现“突破式”发展，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俄要位居世界经济前五，人均 GDP 要提高 50%，并力求在六年内将贫困率减半。这意味着，普京 4.0 的施政重点将聚焦社会经济领域。这不仅关系到执政的合法性，也关系到俄罗斯未来的发展。俄罗斯政府既需要把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又需要着眼长远，为俄经济模式革新创造条件。但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变化背景下，在剩余的 4 年时间里，其腾挪空间并不大，难以有大的改革和突破，只能是对原有政策进行修正和调整，在保持传统优势产业和发展创新产业之间做出平衡，在资源依赖和投资导向之间做出选择。从俄罗斯近年来出台的相关规划，大体可以看出政府未来的政策取向。

（一）未来政策取向

通过出口政策波及效应，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是目前俄罗斯宏观政策的重点，俄罗斯 2008 年启动的《创新国家发展战略》和 2014 年启动的《进口替代战略》，都是以此为着力点。如前所述，进口替代无法解决俄罗斯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原料、产能和产业链不足的问题。

^①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Инвестици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题，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不大。目前进口替代效应递减已经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口替代政策或将退场。未来将向刺激非资源类产品出口导向转换，通过出口政策的波及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

国家巨额投资、实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18年9月30日，俄政府批准了《至2024年大型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扩展配套计划》，共包括11个联邦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中9个为交通基础设施项目。2019年2月11日，俄政府公布了至2024年国家大项目规划，包括医疗、教育、安全和高质量公路、人口、文化、住房和城市环境、生态、科学、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国际合作和出口等12个国家优先发展方向。主要目标是确保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实现突破式发展，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最终使俄经济进入新的高技术发展轨道；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提高公民生活水平，保障国家安全。这些规划出台意味着，未来俄罗斯经济增长将由消费拉动转为投资驱动。国家项目总预算达25.7万亿卢布（按俄罗斯中央银行2019年12月24日汇率计算约合4128.5亿美元^①），其中51%来自联邦预算。国家投资将成为拉动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投资对GDP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管理的有效性，进而直接影响公共投资对GDP的乘数效应。据俄罗斯阿尔法银行测算，国家项目实施带来的乘数效应，可拉动GDP年均额外增长0.2%–0.4%。俄经济发展部预期，2020年当俄经济增速达到2%时，国家项目将开始显现更强的影响力。

通过国防工业多元化，释放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研发潜力和优势产能。随着国产武器在俄军大规模列装任务的相继完成，俄国防工业订货开始减少。为释放俄国防工业的研发潜力和优势产能，并为国家项目提供智力和产品支持，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俄罗斯国防工业多元化计划”。普京在2018年、2019年的两次国防部和国防工业领导人例会上，都提出了要实现“国防工业多元化发展”；军工企业将增加高科技民用产品和军民两用产品的生产，到2020年达到军工企业产量的17%，2025年达到30%，到2030年达

^① Курсы валют, Доллар США \$:руб. 62,2499. 24.12.2019. <http://www.cbr.ru/>

到 50%；以此提高俄罗斯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并将其定位为“战略性的国家任务”。^①俄罗斯总统要求，“俄罗斯技术”、“俄罗斯核能”、“俄罗斯宇航”等公司，要为医药产业、建筑-筑路机械、电信系统、废料和垃圾处理提供民用产品。目前，俄罗斯政府已组织俄罗斯外经银行、俄罗斯出口中心、工业扶持基金等，参与解决国防工业转产需要的资金问题。^②

多手段刺激扩大投资。2014 年以来，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和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一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做法在稳定俄罗斯宏观形势的同时，也抑制了实体经济生产投资的积极性。目前俄罗斯的外债水平低于国际警戒线，贸易和预算保持盈余，黄金外汇储备充裕。从政策储备的角度看，俄罗斯刺激投资的潜力和空间足够大。俄将采取多手段刺激扩大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降低财政盈余占 GDP 的比重，货币政策从紧缩转向宽松，2019 年以来已连续 4 次降息；二是继续完善营商环境，提高投资吸引力，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和外国投资；三是为吸引私人资本对大项目投资，制定出台新的《投资法典》，旨在对税收条件的不变性、投资补偿规则等做出规范，尤其是对私人投资者提供保护；四是建立相当于 GDP0.5%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用于向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通过多种手段和措施来刺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加强底线思维，防范金融风险。面对全球可能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俄罗斯央行将继续清理问题银行，以保证俄银行系统的稳定性。面对美欧制裁长期化，为防范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断网，封闭贸易结算通道，俄罗斯已建立完全由俄央行控股的国家支付结算和清算中心，建成独立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俄罗斯将继续在中俄、中俄印、俄欧、欧亚经济联盟等多个层面，探讨相互连接结算平台的方案。去美元化主要在三个方向展开：在石油、军火进出口业务结算中，加快向使用欧元、人民币和卢布过渡；实施国际储备多元化计划，下调美元在其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大

① Путин: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ОПК одна из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задач. 21 ноября 2018. <https://easaily.com/ru/news/2018/11/21/putin-diversifikaciya-opk-odna-iz-strategicheskikh-nacionalnyh-zadach>

② Путин поручил довести долю продукц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в ОПК до 50% к 2030 г. <https://tass.ru/armiya-i-opk/3847493>

量抛售美债和增加黄金持有量；提高卢布在对外贸易结算中的比重，计划到 2024 年从目前的 21%提高至 30%，在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内部贸易中将本币结算比重提高至 90%。^①

重组国有企业，提高国有经济效率。20 世纪的大规模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和民众留下的负面阴影还远未消退，现阶段俄罗斯不具备实施大规模私有化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俄政府将通过“小私有化”提高国有公司效率，包括降低国有经济在竞争性市场中占比，央行从改组后的银行撤资，减少单一制国企的数量等。通过对国有企业重组的方式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包括合并零售批发贸易、维修、建筑、农林渔猎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在地区一级，合并相关的医院、诊所和高校，将部分法人实体转变为分支机构，目前这一重组已在进行中。2019 年 11 月 13 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已向政府提交了 2020-2022 年的私有化计划^②，拟在合适的时候出售俄罗斯水电站、俄铁、联合造船公司、石油运输公司、俄罗斯电信公司等国有垄断企业的股份。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私有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以上公司资产是否需要出售、何时出售都属“有争议的”问题，仍需在政府层面进行讨论。新的私有化计划能否获得批准，计划实施能否提高国有经济效率，都需要继续观察。

（二）俄罗斯国内关于经济发展目标的讨论

到 2024 年，俄罗斯能否和如何实现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大国的目标，是近年来俄罗斯国内的热议话题。俄罗斯经济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学界智库曾多次讨论，但意见不一。经济主管部门虽然认为目标可能实现，但其给出的经济预测又意味着目标实际上无法实现。金融机构和学界智库则认为，目前俄罗斯国内缺乏实现经济增长的通盘计划，经济主管部门之间相互掣肘不作为，要实现增长目标必须改变现行政策。

① Россия хочет поднять долю рубля во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е до 30%. 22 Ноя. 2019. <https://futurerussia.gov.ru/nacionalnye-proekty/rbk-rossia-hocet-podnat-dolu-rubla-vo-vinesnej-do-30?utm>

② Минэкономразвития внесло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лан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на 2020-2022 года. 13 ноября 2019. <https://www.interfax.ru/business/684068>

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鲍里斯·波尔费里耶夫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根据该所学者计算，只有以至少年均 3.7% 的速度增长，俄罗斯经济才能在 2024 年之前达到世界第五位。但是根据经济发展部的预测，俄罗斯经济要到 2023–2024 年，才能实现 3.3% 的年均增速。2013–2018 年俄 GDP 的年均增速仅为 0.4%，已被视为长期停滞。根据该所的计算，即使国家项目能够全部落实，到 2024 年，这些项目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每年不超过 0.8%。波尔费里耶夫认为，“从经济增长的未来动态（至少从中期）来看，这种情况尤其不利，因为摆脱停滞之路比摆脱危机要困难得多，时间要长得多。”“在当前情况下，无所作为的风险，比当局在经济刺激措施中害怕犯的错误，要高得多”。“为实现总统提出的目标，政府的政策重心必须从宏观稳定，转向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现代化”。^①

根据俄罗斯“独立报”的访谈，大多数机构都认同上述看法。俄罗斯阿洛尔（Алор）金融中介公司分析师阿列克谢·安东诺夫认为，仅维持现有的经济政策，在没有科学密集型工业生产领域的质量型增长、没有人力资本发展的情况下，俄罗斯进入世界上五个最大经济体之列的机会为零。仅靠围绕采掘业而建立的俄罗斯经济结构，无法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② AMarkets 国际金融公司分析部主任阿尔焦姆·迪夫认为，“迄今为止，只有油价大幅上涨，俄罗斯才可能实现明显的经济增长。即使如此，其增长也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进入世界前五大经济体，未来 6 年，俄罗斯的 GDP 必须实现翻番。”^③

俄罗斯总统企业家权利保护全权代表、全俄社会组织“实业俄罗斯”联合主席、俄中和平友好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要想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五，俄罗斯 GDP 必须实现年均增长 5%–6%，否则到 2035 年，俄罗斯的世界排名将下降到全球第 10–11 位，人均 GDP 下降至第 69–70 位。“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刊登鲍里斯·季托夫提出的发展路线图，认为

① Борис Порфирьев.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та есть//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Спецвыпуск. 11.11.2019. №.253 (8011).

② Затяжная стагнация страшнее кризиса. 17.11.2019. http://www.ng.ru/economics/2019-11-17/4_7728_vvp.html

③ Там же.

有必要发展 9 个优先领域：（1）消费品生产；（2）发展住房建设、建材业和基础设施；（3）发展油气、木材、黑色和有色冶金及其他原材料的深加工；（4）实现网络安全，发展无线电、电子仪器工程、电力工程和机床制造业；（5）发展新能源汽车、建设高铁网、地区航空及无人运输；（6）发展旅游业、餐饮业和疗养产业；（7）发展清洁食品和工艺、绿色环保和高效农业；（8）发展健康产业，推广最新医疗和医药技术；（9）发展数字经济、区块链和IT设备、软件开发和数字商品、电信技术等。季托夫认为，上述领域的发展，一方面不需要大量的政府投资，另一方面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投入（比如国家级的大项目）。^①

俄罗斯联邦审计署署长库德林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建议，认为俄罗斯实现 GDP 年均增长 3% 的任务十分艰巨，仅靠一些国家级项目拉动远远不够。他呼吁减少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认为有必要扩大各地区的权力，并将部分土地资源转让给它们。此外，库德林指出，俄罗斯应该减少和化解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制裁持续加强，那么总统设定的目标实际上将不可能实现。^②

四、代结束语：俄罗斯经济中短期走势

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连续 8 年保持了较快增长，年均增幅大大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幅。2009 和 2015 年经济又分别出现两次大的下降，降幅也高于同期内 G20、金砖国家及大多数国家的平均降幅。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和下降的背后，都有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或下跌的影响。油价上涨在给俄罗斯带来诸多实际利益的同时，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后果之一是强化了原本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生产、投资、出口结构的原材料特征，始终未能发生根本改变。值得关注的是，2015 年以来，即使油价维持

① Как России войти в пятерку лучших экономик мира: Борис Титов назвал свой рецепт. 15.05.2019. <https://www.kp.ru/daily/269774/4035543/>

② Кудр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как вывести Россию в пятерку крупнейших экономик мира. 16.01.2019. <https://ria.ru/20190116/1549456785.html>

相对高位，俄罗斯经济再也未能回到之前的快速增长，表明俄在对资源高度依赖的背后，还有制约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原因。

制造业衰退、国有经济低效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偏低，是拖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三大制约因素。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现的自发性逆工业化，削弱了俄罗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制造业的衰退成为俄罗斯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产业发展引导政策、对制造业长期投入不足，使得俄罗斯工业体系的完整度和技术水平受到了极大影响，也削弱了技术创新的基础，使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引擎。俄罗斯国有企业治理的样本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与国有产权指数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表现更差，资源利用效率更低，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效率普遍比较低。大量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扭曲了市场竞争秩序。长期看，这种国家控制资源、主导发展的模式，很难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俄罗斯总积累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偏低，不仅无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有时甚至是反向拉动经济。这方面的政策调节有较大空间，改善营商和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投资，将是俄罗斯政府未来的政策重点。

2019年初以来，全球各大机构一致预测，2020年极有可能爆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若全球经济下行风险进一步增大，外部需求收缩将会使俄罗斯出口减少。美欧制裁将会继续抑制私人资本对俄罗斯的投资，脆弱的俄罗斯经济会再度承压，中期前景并不乐观。近期，俄经济发展部和俄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纷纷下调2019-2020年俄经济增长预期，认为2019年俄经济增速最低可能降至1%，2020年从预期的2%下降至1.7%，之后逐步恢复增长。2019年9月，俄经济发展部修正后的预测认为，2021-2024年俄罗斯的经济增幅将分别为3.1%、3.2%、3.3%和3.3%。^①

低油价和西方制裁将是俄罗斯所要面对的新常态。2014-2015年，在国际油价跳水和西方制裁影响下，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经济降幅达到-2.5%。之后3年，俄经济一直在谷底徘徊。2018年，在国际油

^①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гноз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4 года. 30 сентября 2019 г. economy.gov.ru/minrec/activity/sections/macro/prognoz/2019093005

价保持相对高位和政府反危机政策效应影响下，俄经济出现 2.3% 的增长，但预期的连续增长并未出现。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如能落实，俄经济会出现局部的亮点，但实现整体“突破式”发展的挑战仍然很大，到 2024 年很难实现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目标。在低增长的情况下，俄罗斯恐怕更难实现进入世界前五的目标。多年来，就其在全球 GDP^① 中的占比而言，俄罗斯与德国排名一直在第五或第六相互交替。而按美元汇率计算，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 年俄罗斯 GDP 排世界第 11 位。2019 年，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大选中，两国都提出了进入世界经济前五的目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到 2023 年，印尼的经济增长率可达 5.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总产值中的比重将达 2.8%，超越俄罗斯、巴西、英国和法国等，成为世界排名第六的经济体。^② 总体看，俄罗斯重回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前景可期；但在新兴经济体赶超式发展的态势下，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俄罗斯进入世界经济前五也面临新的挑战。

【Abstract】 The 20 years under Puti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ssia and its return to the global stage. The goals of safeguarding Russia's national unity and revitalizing Russia's glory as a great power, put forward at the beginning of Putin's reign, have both been achieved. In comparison, nevertheless, Russia's current economy does not match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s. Since 2012, Russia's economy has been stagnant, and Putin's goal, put forward in 2008, of becoming one of the top five in the world economy by 2015-2020 remains off target. Russia's economy lags behind, which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such external factors as the end of cyclical factor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but also restricted by its own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ont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deep-seated reasons restricting Russia's economic growth lie in the decline of its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low efficiency of the

① 系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总量。

②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е(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13 стран).

state-owned economy and the sluggish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In his fourth term, Putin once again proposed the goal of becoming one of the top five in the world economy by 2024. His administration again focused on social and economic fields, t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growth and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ally, achieving diversification is Russia's important long-term policy goal. His purpose is to enabl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continue develop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radually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so as to ensure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xt five year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re won't be drastic and in-depth reforms in the economic field. Nevertheless, new dynamism will be injected into the economy through adjustments in industries, finance, public finance, investment and export policies. Actually, how to turn potentials of economic growth into real "breakthroughs" remains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Russia.

【Key Words】 Russian Economy, Russian Manufacturing Sector, Russian Dependence on Resources, Russian Economic Structure

【Аннотация】 20 лет 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имею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к статусу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Цель Путина, поставленная им в начале прихода к власти по сохран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 возрождению славы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была достигнута,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нынешнего статус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оторый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её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статусу и влиянию.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застыла с 2012 года, и цель Путина войти в пятёрку крупнейших экономик мира к 2015-2020 годам также стала миражом. На отставание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и влияют не только внешние факторы, такие как прекращение циклической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 ухудш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о и её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С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лубоко укоренившимися причинами, сдерживающи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России, являются упадок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изк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лаб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В течение четвёртого срока сво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Путин вновь выдвинул цель войти в пятёрку мировых экономик к 2024 году, е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сосредоточила внимание на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феру и на решение проблем роста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средств к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насел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достижение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задачей России, целью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постепенная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Ожидается, что в ближайшие 5 лет в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проведено мало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и глубоких реформ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но будет придан новый импульс росту экономики путём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политики в сфе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финансов, инвестиций и экспорта.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евратить потенциал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 реалистичное «прорыв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всё ещё серьёзная задача, стоящая перед Россие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сурсн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струк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冷战史研究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 ——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

沈志华**

【内容提要】在美苏双方希望和推进战后经济合作的氛围中，苏联提出了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期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而美国有意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雅尔塔会议没有提出贷款问题，从而错过了历史最佳时机。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苏联对自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认知偏差，导致双方在贷款问题上长期交涉但最终未果。贷款流产成为苏联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关键词】 冷战起源 美苏经济冷战 美苏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6-0031(30)

冷战起源和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较多的研究课题。人们从外交、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个层面介入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关于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或者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①不过，相对于其他层面，经济冷战起源的

* 本研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幸福之花”先导研究基金项目资助。

**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上海市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① 在以往的研究中，从经济角度出发研究冷战起源的成果多来自英语世界，但最近几年俄国学者的研究后来居上，新作不断，如 Соколов В.В. Ленд-лиза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10. №.66. С.3-17; Соколов В.В. ЮНРР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3-1948 годы(по новы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新出现的俄国和东欧档案的利用不足，有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甚至有的史实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实际上，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历史已经证明，苏联发展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①追根寻源，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构建的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新型关系，已经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而苏联领导层却没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面对战后美苏两强不对称的特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②——苏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以及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这里涉及诸多问题，例如信用贷款、布雷顿森林体系、租借清算、战后赔偿、马歇尔计划、经互会、莫斯科国际贸易会议以及苏联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等等。笔者拟在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近年来开放的俄国档案，逐一讨论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在冷战开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学者注意。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这一问题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渐渐被“放在一个更加突

история. 2011. №.6. С.61-74; Сорокин А.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СССР: Взгляд с Запада// Родина. 2015. №.3. С.120-128; Минкова К.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орговля; 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СПб: СКИФИЯ принт, 2016; Липкин М.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Европе: середина 1940-х - конец 196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митрия Пожарского, 2016; Болдырев Р.Ю, Невский С.И. Советская репарацио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ермании в 1945-1953 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3. Март 2017. С.49-69; Минкова К.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торговые и финансовые институ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5-1946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18. №.1. С.75-90. 中国学者也有一些新的研究，如崔海智：“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世界历史》，2011 年第 1 期（总第 206 期），第 27-35 页；舒建中：“克萊頓与馬歇爾計劃”，《西南大學學報》，第 39 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第 202-207 页；李凤艳：“试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对德索赔政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6 期，第 72-78 页。

① 参见张盛发、沈志华：“苏联在冷战中如何败北？”，载于沈志华等：《冷战启示录：美苏冷战历史专题系列报告（1945-199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366-389 页。

② [美]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王振西、钱俊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4-15 页。

出的地位”。^①特别是俄国档案开放以后，贷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②尽管如此，这里仍然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看法，如苏联是否真正需要美国的贷款？美国为何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苏联未能如愿取得美国贷款造成了什么结果？这一结果与冷战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悬念确实存在，正如当年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 Stettinius）所说，“这种贷款能否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更加合理和国家的国家，将是历史上最大的‘如果’问题之一”。^③

一、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迟迟没有得到美国的承认，但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美国商人对苏联采取了“政经分离”的态度——政治上不承认而经济上保持往来。特别是在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NEP）的主张以后，苏联经济体制的改变和国内市场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的美国资本家，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常为对外贸易提供的便利和保护，企业家们还是积极进行对苏贸易和投资。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到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对苏贸易额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2倍，对苏出口贸易额达到最高点：1930年的1.113亿美元和1931年的1.034亿美元。^④

1933年11月17日，美国出于基本的政治原因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⑤

① Thomas G. Paterson,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to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3-1946”,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69, Vol.56, p.89.

② 以下著作都有专门章节或段落讨论贷款问题：Батюк В, Евстафьев Д. Первые заморозки: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45-1950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1995; Попов В.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1953гг. Москва-Тамбов: ТГТУ, 2000; Печатнов В. О. От союза к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45-1947 гг, Москва: МИДРФ, 2006;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1945-1955 гг.). Москва: ИРИ РАН, 2005; Липкин М.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Европе.

③ Edward R. Stettini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 Garden City, 1949, p.121. 转引自 Paterson,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pp.70-71.

④ 参见 Philip J. Fun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2.

⑤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33,

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还试图通过取消对苏联产品的特别限制、接受购买从苏联直接运来的黄金等措施推动美苏贸易。然而，由于美国国务院试图把美苏债务问题^①作为“一种杠杆”，以获取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让步，并迫使苏联遵守国际经济关系中有关财产和合同安全的准则，而苏联则坚持拒绝在美国同意延长贷款期限之前解决债务问题，双方关系再次进入紧张状态。随着美苏债务问题谈判破裂，加上苏联抛弃“新经济政策”后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变，美苏经济关系陷入低谷。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约翰逊法案（Johnson Act）禁止私人或机构向欠债国提供贷款，也是导致美苏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②战前，苏联唯一得到的一次美国贷款是1933年复兴信贷公司提供的400万美元（购买美国棉花），利息5%，期限一年。^③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后，美苏关系急速升温。战争期间，美苏之间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租借。1941年3月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授权总统向“对美国国防至为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租用、借用或以其他方式处置”防务用品。据此，美国向英国、苏联以及中国等盟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其他物资援助，奠定了战时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的基础。据统计，美国用于租借援助的资金达436亿美元，约占二战期间国防开支总额的14%。其中，近110亿美元提供给了苏联，约占国防开支的3.5%。^④美苏贸易由此大幅提升。1935年至1939年间，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到2%，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大约1%。在战争期间，由于租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Vol.2, Washington D.C: GPO, 1949, pp.805-814.

① 美国要求苏联归还的债务包括两项内容：二月革命后美国向俄国临时政府提供的贷款和苏俄政府根据国有化法令没收的美国在俄资产。

② Funj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p.3-4. 关于约翰逊法案的通过，参见 *FRUS, The Soviet Union 1933-1939*, Washington D.C: GPO, 1952, pp.66-67, 71-75, 79-81.

③ 刘德芳主编：《苏联经济手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第237页。

④ John Lewis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2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pp.154-155. 关于对苏联租借援助还有不同数字，有资料说是108亿美元，差不多占全部租借金额的四分之一。见[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87-388页。还有资料说，到1945年8月21日，美国租借物资总额达到为430亿美元，其中91亿美元给了苏联。见迈斯基致莫洛托夫的报告，1945年11月15日。АВНПРФ. ф.06. оп.7. п.18. д.184. л.38-75.

(UNRRA)的出口，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达20%左右。^①

在接到美国向苏联提供第一批租借物资的通知后，1941年11月4日，斯大林（И.В. Сталин）致电罗斯福：“对于您有关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无息贷款用以支付武器和原材料供应的决定，苏联政府不胜感激，并将其视为……对苏联的最大支持。受苏联政府委托，我对您所述的向苏联提供此种债务的条件完全赞同，即这些债务应在战争结束5年之后开始偿还，并在这5年期结束后的10年逐步还清。苏联政府准备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向美国提供苏联所掌控的美国所需的商品和原料。”11月6日获悉了斯大林信函的内容后，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H. Hopkins）当晚给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米柯（А. Громыко）打电话说，“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莫斯科回信了”。^②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突飞猛进，堪称“生产奇迹”。与战前（1937-1939）工业指数相比，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1.23倍，其产量相当于三个轴心国的两倍。^③出口贸易也急剧增加，从31.9亿美元增加到153.4亿美元。国外投资从1940年的12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68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量的59%。^④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在战争后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其主要内容为：以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计划为基础，制定一系列基本的多边国际规则，如国际贸易领域的削减贸易壁垒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即多边自由贸易原则）等；在美国的主导下创建一系列多边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① Alexander Baykov, *Soviet Foreign Trade*, Princeton, 1946, p.89. 转引自 Paterson,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pp.74-75.

② Печатнов В.О., Магадеев И.Э. 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Ф.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У.Черчиллем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ом 1.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17. С.87-88. 中译文参见[俄]弗·奥·佩恰特诺夫、[俄]伊·爱·马加杰耶夫：《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上卷，于淑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48页。1942年6月11日美苏两国签署了租借协议。

③ 韩毅：《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176页。

④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pp.537, 565, 649.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一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2页。

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①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一个自由贸易的、没有关税差别待遇的国际经济环境,即“门户开放”,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竞争,并会使各国保持稳定、和平和民主。“一个按照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待遇原则进行运转的健全完整的世界贸易体系,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结构的基石”。^②为此,美国极力倡导国际经济合作,其中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早在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W.Churchill)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除了强调放弃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还提出希望“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实现“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③在1943年10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C.Hull)提交了两份备忘录,认为战后各国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应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础”,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美国主张采取的具体措施:创建国际贷款机构;为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扩大国际贸易而缔结贸易总协定;调节和最后废除旨在限制个人消费品生产与贸易的措施;确立固定的国际货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以及在资源开发、航运、空运、电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④1944年2月23日,罗斯福致函斯大林,再次提出战后经济合作问题,认为“迫切需要一个联合国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借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应予以讨论的问题、讨论程序以及现有

① World Peace Foundation,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VI, 1943-1944, pp.6-10, 21-24; Vol.VII, 1944-1945, pp.32-38. 转引自舒建中:“美国与1947年日内瓦会议——兼论关贸总协定机制的建立与美国霸权贸易”,《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5年5月),第103页。

② Rober A.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Bretton Woods, the Marshall Plan, and American Rearmament, 1944-50”, *Diplomatic History*, 1985, Vol.9, №.3, pp.268, 270.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37-338页。

④ Громько А.А.(гла. ре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гг. Том 1. Москов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19-30 октября 1943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8. С.338-346, 357-363. 秘密议定书关于经济合作的附件的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第339-342页。

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段”。^①

罗斯福本人对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十分强烈。1944年11月24日，他在向国会报告租借问题时宣称：这个“法案是一个系统性的军事供给体系。它们应该与战争一同结束，然而我们联合国家的伙伴关系应该延续，并应变得更加牢固”。^②1945年2月22日，罗斯福在要求国会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所发表的咨文中指出，“如果我们要以担当战争任务的同样气质来担当和平任务，我们就必须保证使和平的组织稳定地建立在国际上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上”。罗斯福指出，在经济领域里，各国的“宗旨和利益是统一的”。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国家所需要的“是互相符合的——扩大生产、就业、交换和消费，换言之，就是生产更多的商品，提供更多的就业，进行更多的贸易，以及大家都有更高的生活水平”。^③

虽然存在积极的合作愿望，然而，美国人也明白，在考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时候，所谓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是对各种自成体系的经济形式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挑战，这里既针对英国，也包括苏联。正如助理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1944年12月11日在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和规划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的，在“同一世界”的自由贸易必须取消关税、配额、禁运和其他人为的障碍。关于苏联，艾奇逊指出，美国必须制定“公平的贸易规则，这涉及政府的垄断和国家贸易，也包括私营企业盛行的国家与由国家管理的对外贸易之间的贸易”。^④

除了安全问题，经济问题——战后重建和国际经济秩序——也是苏联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早在1941年12月2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С.А. Лозовский）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提出秘密建立财政-

① Печатнов В.О, Магадеев И.Э. 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Ф.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У.Черчиллем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ом 2.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17. С.75-77. 中译文见《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下卷，第52页。

② РГАЭ. ф.413. оп.12. д.10128. л.223. 转引自 Соколов В.В. Ленд-лиз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10. №.6. С.14.

③ 《罗斯福选集》，第603-604页。

④ Dean Acheson, “A Program for Restoring and Enlarging Our International Commerce”, *Export Trade and Shipper*, 11 December 1944, pp.5-6. 转引自 Funij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11.

经济委员会，负责估算苏联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以便确定战败国如何在经济上对苏联做出赔偿。^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很快就接受了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并于1942年1月28日做出决议，成立以莫洛托夫（В.М. Молотов）为主席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负责收集和整理一切涉及战后安排的现行协议及有关计划和方案，其中包括“战后经济安排的设想，工业和农业原料产地的再分配计划，成立关税联盟、消灭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建立货币集团的方案，以及关于拟订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国际‘计划’的设想和其他战后经济问题”。^②

在精心和全面准备战后安排事宜的同时，苏联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1943年莫斯科会议期间，美国战时生产总局局长纳尔逊（D. Nelson）访问苏联。在其逗留的10天里，“与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凡的合作”。^③10月16日，在与纳尔逊进行的一个半小时的单独谈话中，斯大林对美国的产品，特别是苏联是否能够赊购美国货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货单。斯大林赞同纳尔逊关于美国商人与苏联政府商谈两国在和平时期的贸易计划的建议，并提出应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或许是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过去债务问题的记忆，斯大林还几次提到，苏联政府一定会履行义务，绝不会只是“象征性地”付款。^④

苏联表现出来的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热情并非心血来潮。1944年1月11日，从伦敦归来3个月的原驻英国大使迈斯基（И.М. Майский）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其中讲述了他对处理战后美苏经济关系的深层思考。迈斯基指出，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决定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 and 英国手中，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在极大程

①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1941年12月26日。АПРФ. ф.3. оп.63. д.237. л.1-3.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65-667页。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年1月28日。АПРФ. ф.3. оп.63. д.237. л.4-8// Источник. 1995. №.4. С.116-118.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68-671页。

③ “Hamilt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9, 1943”, *FRUS*, 1943, Vol.3, Washington D.C.: GPO, 1963, pp.715-716.

④ “Hamilt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6, 1943”, *FRUS*, 1943, Vol.3, pp.713-715.

度上将取决于这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美国是“最有活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迅猛增长的生产实力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扩张。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首先冲击的是正在衰落的英国，而英国将力图用和平的方式同美国进行艰苦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美苏之间没有领土纠纷，“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涉及我们”，相反，美国“会希望苏联至少保持中立”。至于英国，在其与美国的斗争中，“应当越来越向苏联靠近”。因此，只要战后的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无论从战后经济恢复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必须维护和平出发，苏联都希望同美国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说到经济关系，迈斯基认为，美英“这两个大国在未来的国际商品流通领域里必然要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而特别重要的是，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对苏联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给予援助的十分重要的来源”。所以，苏联必须在“战争气氛”的影响下，立即着手与美英进行会谈，要求美英（特别是美国）从对盟国义务的认识出发，保证在战后 5-10 年的时间内，通过租借法案的方式，向苏联提供对其重建至关重要的商品，而其他较为次要的商品则根据长期贷款的原则提供。^①

迈斯基的分析可谓精细、周全、深入，所提措施也很到位。对此，斯大林心知肚明。在 1944 年 3 月 10 日答复上述罗斯福 2 月 23 日来电时，斯大林写道：“毫无疑问，……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值得关注。我认为，现在完全适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构，用以研究这些问题，以制定研究根据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序。”这无疑也对美国起到了推动作用，总统收到信后交给国务卿赫尔，并附言：“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②

1944 年 6 月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顿 (E. Johnston) 对莫斯科和乌拉尔地区的访问，显然是美苏双方有意推动经济合作的举措。6 月 27 日凌晨 4 点，

①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 年 1 月 10 日。АВПРФ. ф.06. оп.6. п.14. д.145. л.1-41// Источник. 1995. №4. С.124-144. 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684-713 页。

② Печатнов В.О., Магадеев И.Э. Переписка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Ф.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У. Черчиллем. С.91. 中译文参见《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下卷，第 64 页。

斯大林会见了约翰斯顿，并同他进行了2个小时饶有兴趣的谈话。斯大林赞扬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向苏联工业提供的援助，并说苏联所有大型工业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造的，还表示欢迎美国在商品销售方式方面提供帮助。斯大林说，战后苏联进口的主要是工业设备和机械，而不是消费品。不过，这些设备的一部分将用于生产消费品。出口在苏联经济中绝不会发挥很大作用，除非为了进口。苏联可以从美国订购数十亿美元的货物，如果了解美国的需要，苏联可以向美国出口原料和消费品。最后，斯大林还对美国的大选表示关心：苏联担心一旦共和党上台会影响当前的美苏关系，特别是影响已经签署的经济协议的实施。约翰斯顿表示，罗斯福继续当选的机会很大，无论如何，他本人会尽一切努力发展美苏之间的经济合作，并使苏联得到长期贷款。据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E. Harriman）在一旁观察，斯大林态度“和蔼可亲”，显然很喜欢这位商会会长和他所说的话。^①约翰斯顿也深受感动，回到美国后不久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②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战后的苏联，“即使不是我们最大的客户，至少也是我们最热切的客户”。^③

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但直到1945年初，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还是十分融洽的，美苏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也颇为乐观。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苏联提出了为战后重建而要求美国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的问题。

二、苏联对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苏联的战后重建的确面临极大困难，四年的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关于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有不同的估计，据俄国档案披露的数字，

① “Harri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7, 1944”, *FRUS*, 1944, Vol.4, Washington D.C.: GPO, 1966, p.972; June 30, 1944, *FRUS*, 1944, Vol.4, pp.973-975. 关于这次谈话的苏方记录参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2. 1944-1945.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3. С.139-146.

②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Т.2. С.155.

③ Eric Johnston, “A Business View of Russia”, *Nation's Business*, No.32, October 1944, pp. 21-22. 转引自 Funij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10.

战后赔偿委员会主席迈斯基 1944 年提供的“直接物质损失”为 7000-8000 亿卢布（约合 1320-1500 亿美元），这“超过了整个英国或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①其中固定资产的损失，据美国国务院财政金融司司长科拉多（G. Collado）1945 年 1 月的估算为 160 亿美元，约占战前总资产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库存（Inventory）资产损失 40 亿美元。^②1943 年 11 月，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说，据他观察，“苏联政府认为重建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③

苏联领导层很早就认识到，取得国外提供的长期贷款是战后经济重建最重要的条件和前提。1943 年 7 月，针对美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А.Я. Вышинский）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出，美国试图建立的稳定基金“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尤其关心的提供长期贷款的问题”。在强调必须修改美国草案中对苏联不利的那些条款后，维辛斯基认为，“苏联参加稳定基金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基金将被赋予长期信贷的国际组织职能，或者在其建立的同时便将组建联合国长期信贷银行”。^④对此，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А.И. Микоян）也有同感：无论是美国提出的稳定基金组织，还是英国主张的外汇清算同盟，对于苏联而言其意义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的只是用于维持支付平衡的贷款和实质上带有短期性质的信贷，“而苏联此时实际需要的乃是长期性贷款”。不过，米高扬也指出，这两个组织都有贷款利率较低（仅 1%）的价格优势，可以成为苏联的信贷来源，况且也是苏联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形式之一。^⑤

苏联人很快但隐晦地向美国传达这个想法。1943 年 11 月 5 日，在与刚到任的哈里曼大使的会谈中，米高扬对租借物资有可能成为“主要用于战后重建的物资”这一话题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说，苏联对重建铁路系统、冶金

①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1.

② “Memorandum by Collado, January 4, 1945”, *FRUS*, 1945, Vol.5, Washington, D.C.: GPO, 1967, pp.938-939.

③ “Harri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6, 1943”, *FRUS*, 1943, Vol.3, pp.788-789.

④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的报告，1943 年 7 月 12 日。АВПРФ. ф.06. оп.6. п.17. д.170. л.138-141.

⑤ 米高扬致莫洛托夫的报告，1943 年 9 月 18 日。АВПРФ. ф.06. оп.6. п.17. д.170. л.142-148.

厂、煤矿和发电站所急需的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正在增加，而且还会不断增加。米高扬还提出，在最近美苏达成的第三个租借协议中已经列入一些项目，但“肯定需要提出更多的要求”，价值 3 亿美元的额外订单是不够的。哈里曼解释说，从法律上讲，租借法案规定只能供应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设备和材料。不过，总统和华盛顿有关方面倾向于对该法案做出“一个合理而宽泛的解释”。接着哈里曼提出，或许可以开始讨论为苏联重建“提供贷款和财政援助”的问题。对此，米高扬回答说，对比英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设备，苏联人更喜欢美国设备，因为它们质量好且标准化程度高，但苏联的订单取决于贷款条件和货物价格。^①苏联的确非常需要美国的贷款，但是正如迈斯基在报告中所说的，此时莫斯科考虑更多的是“按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获得援助，能以租借法案的形式给予供应最为理想”。^②

根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的研究，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外部资源对于苏联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但对美国货物的大规模订单只能等待相应的贷款到来，在此之前，需要关心的是“根据租借法案灵活地调整与美国的结算业务”。毕竟当时租借物资也是苏联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1945 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总计 2980 亿卢布，其中租借法案收益 310 亿卢布，占 10.4%。^③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美英苏三巨头第一次聚会讨论战时和战后诸多重大议题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没有提出战后重建和贷款问题。在一次与罗斯福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在罗斯福谈到战后美苏将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时提到，“如果美国人向我们提供装备，我们可以供应他们原料”。^④尽管知道租借限于战争时期，此时苏联人还是期望通过条件优惠而手续简单的租借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ovember 5, 1943”, *FRUS*, 1943, Vol.3, pp.781-785.

②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 年 1 月 10 日。АВІРФ. ф.06. оп.6. п.14. д.145. л.1-41// Источник. 1995. №.4. С.124-144. 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684-713 页。

③ Попов В.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1953гг. Москва-Тамбов: ТГТУ, 2000. С.104, 109.

④ “Roosevelt-Stalin Meeting, November 28, 1943”, *FRUS*, 1943, Cairo and Tehran, Washington D.C.: GPO, 1961, pp.485-486. 会谈记录的俄国档案见 Санакоев Ш.П. и Цыбулевский Б.Л. Тегеран-Ялта-Посдам.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1. С.17-21.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7 卷，第 401-405 页。

德黑兰会议以后，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的尾声，苏联越来越关注战后重建问题，对于长期贷款的要求也日益强烈。1943年12月7日，外贸人民委员会的专家向米高扬提交了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指示草案，草案指出，美国“只有向苏联政府提供大规模长期政府贷款”，才能得到恢复苏联经济所需要的大量美国工业产品订单。在对复兴银行（世界银行）方案的修改意见中，则需要包括如下内容：“大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应该拥有不经一般程序即获得长期贷款的权利，贷款数额无论如何不少于缴纳额的150%。”^①维辛斯基也认为，只要美国同意苏联的修改意见，苏联可以接受美国关于稳定基金的计划，“因为我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长期贷款，而这一需求可以通过该银行（指复兴银行——引者）完成”。^②莫洛托夫在12月31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主动提出了美国在苏联经济恢复中提供援助的问题。哈里曼表示，根据《租借法案》，美国政府只能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满足苏联的重建需要。具体来说就是：（1）美国政府机构有可能向苏联政府提供贷款，以购买用于重建的美国设备和产品；（2）希望苏联政府告知最迫切需要的设备和物资清单以及交货时间；（3）邀请美国专家来苏联帮助进行规划。哈里曼向国务卿报告说，莫洛托夫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通过他的问题和评论表明，他理解并赞同我概述的方法，莫斯科高度重视美苏在经济领域“最紧密的合作”。^③苏联当然非常需要贷款，但关键是条件。

1944年2月1日，米高扬试探性地向美国大使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贷款及其条件：第一期10亿美元，利息0.5%，期限25年，从第16年开始以年均等额分期偿还。^④苏联人考虑的主要是条件问题，与（战前）苏联从德国、英国和瑞典得到的贷款的条件——额度少（不足1亿美元）、期限短（5年）、年利高（5.5%—6%）^⑤——相比，米高扬的要价的确是惊人的。不过，此时美国人考虑的主要是法律问题。

对于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美国当时并没有明确和一致的政策。国务

① 切丘林等致米高扬函，1943年12月7日。ABПPΦ. ф.06. on.6. п.17. д.170. C.161-169.

②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1943年12月11日。ABПPΦ. ф.06. on.6. п.17. д.170. C.181-201.

③ “Harri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7, 1944”, *FRUS*, 1944, Vol.4, pp.1034-1035.

④ “Harri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1, 1944”, *FRUS*, 1944, Vol.4, pp.1041-1042.

⑤ 刘德芳主编：《苏联经济手册》，第236页。

院接到报告后通知哈里曼，财政部的建议与驻苏使馆基本一致，即应在莫斯科进行帮助苏联战后重建的讨论。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正在考虑以租借形式提供 3 亿美元商品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与苏联的谈判应通过定期的外交渠道进行，并应成为美苏整体关系的组成部分。国务院的初步考虑是，“在消除某些法律限制之前”，目前美国不能为战后贸易的贷款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安排。因此，在与苏联当局讨论信用贷款时，使馆只能泛泛而谈。^①所谓“法律限制”，首先是指 1934 年 1 月 11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约翰逊法案规定，禁止向拖欠美国政府或公民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而在 1933 年 11 月的苏美建交谈判中，双方未能就债务问题（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临时政府拖欠的美国债务和实行国有化时没收的美国资产）达成协议。^②其次是 2 月 8 日国务卿通知哈里曼，总统已经批准了如下行动程序：继续向苏联政府表明美国政府将尽可能协助苏联战后重建的愿望，并要求苏联政府尽快提供所需物资数量和类型的准确信息；美国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遇到的法律限制问题（指约翰逊法案和租借法案），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授权的最高限额问题；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研究和协调在两国谈判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③

然而，将近一年的贷款交涉没有任何进展，却呈现出一种混乱局面，美苏双方内部都存在不同的主张。在苏联内部，米高扬与约翰斯顿谈判后于 6 月拿出的具体贷款方案，遭到了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Н.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的反对，莫洛托夫则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他不知道“风会往哪个方向刮”。^④美国内部分歧意见更大，财政部长摩根索（H. Morgenthau）全力支持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建议的金额高达 50-100 亿美元，甚至同意取消利息。商务部负责官员罗普斯（E. Ropes）也认为，美国在一项慷慨的长期信贷政策中的受益将与苏联一样多，而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则完全

① “Secretary of State to Harriman, February 2, 1944”, *FRUS*, 1944, Vol.4, pp.1042-1043.

② [美]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06，118-119 页。

③ “Secretary of State to Harriman, February 8, 1944”, *FRUS*, 1944, Vol.4, pp.1047-1048.

④ Липкин М.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Европе. С.126. 关于米高扬与沃兹涅先斯基的意见分歧，还可参考米高扬本人的回忆录 Микоян А.И. Так было.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минувшем.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9. С.493.

拒绝这种可能性。^①受到孤立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反对意见在政府和社会上都普遍存在。这场争论甚至在美国的媒体上反映出来，一些报纸杂志刊登了各不相同的看法。^②在这种情况下，战后长期大额贷款问题的谈判自然不会取得进展，而是进入了“休眠状态”。^③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 1944 年仍然以租借的方式继续进行。3 月 18 日，苏联与美国签订了第三次租借协议^④。毕竟，战争还在进行中。

刚刚进入 1945 年，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 月 1 日，摩根索致函罗斯福说，财政部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以期在苏联重建期间向其提供全面援助。这“不是考虑增加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而是一种对美国和俄国都将产生长远利益的安排”。摩根索还说，他从驻苏使馆那里了解到，“俄国人不愿采取主动，但欢迎我们提出一项建设性计划”。因此建议，美国应该“现在就站出来，向俄国人提出在重建期间援助他们的具体计划”。^⑤然而，没等华盛顿采取行动，苏联就“挺身而出”了。1 月 3 日，莫洛托夫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哈里曼提交了苏联关于长期贷款的方案：额度 60 亿美元，期限 30 年，年息 2.25%，从第 9 年末开始偿还。此外，对于战争结束前的订货，要求美国在价格上给予苏联 20% 的折扣。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非常希望“在长期贷款的基础上发展苏美经济关系”，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美国在过渡时期和战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这一方案的提出，也是考虑到美国活动家多次表示，希望在战后得到大量的苏联订货。^⑥哈里曼后来回忆说，

① Rober A.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2-13; Funij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p.8-11; John Morton Blum(ed.),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Vol.3: Years of War, 1941-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p.304.

② Сироткин В.Г, Алексеев Д.С. СССР и создание Бреттон-Вудской системы 1941-1945 гг.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аратов. 2004. №.21. С.86; Funij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p.13-14.

③ Paterson,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p.76

④ 协议文本参见 *FRUS*, 1944, Vol.4, pp.1065-1069.

⑤ “Morgenthau to President Roosevelt, January 1, 1945”, *FRUS*, 1945, Vol.5, pp.937-938.

⑥ 莫洛托夫与哈里曼会谈纪要，1945 年 1 月 3 日。АВПРФ. ф.06. оп.7. п.2. д.29. л.1-5//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нау.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9-1945.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4 г. Твердый переплет. С.602-604. 参见“Harri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4, 1945”, *FRUS*, 1945, Vol.5, pp.942-944. 据米高扬回忆，60 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斯大林本人坚持提出的，尽管外贸人民委员认为 10 亿美元比较合理，可以提出 20 亿美元

这是“一份惊人的荒诞无稽的书面照会”，是“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奇特的要求”。^①莫洛托夫之所以采取如此姿态提出问题，一方面是出于谈判策略^②，更主要的是在当时苏联人的理念中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战后美国将进入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和大量失业会迫使美国求助于苏联。^③

与米高扬一年前的试探不同，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要求，白宫必须认真对待并做出官方回应。对于苏联照会，哈里曼首先提出，对其不寻常的性质和不合理的条款应该“完全置之不理”，但他“感觉到一种暗示”，即美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慷慨的信贷”。因此必须向莫斯科表明，美国愿意合作，全心全意地帮助苏联解决重大的重建问题。美国应该尽其所能“通过信贷帮助苏联发展健全的经济”，并且已经到了提出具体政策的时候。另一方面也要让俄国人明白，这一切“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为此，“美国政府应保留对所发放的任何信贷的控制权，以便保留政治优势”。^④国务院在向总统转交哈里曼的意见时强调了三点：（1）协助苏联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2）俄国人应该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3）对长期信用贷款的讨论应与当前的租借谈判完全分开。^⑤

不过，财政部的意见完全不同，摩根索于1月10日向罗斯福提交的贷款方案，甚至比苏联方案所要求的还要优惠：为期35年的100亿美元贷款，年息2%！摩根索强调，苏联完全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而且这样做将为美国在战后制造6000万人的就业机会。^⑥国务院各部门对这一方案表示强烈反

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而60亿美元则是不现实的。Микоян А.И. Так было. С.494.

① [美]艾·哈里曼、[美]伊·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429-430页。

② 用哈里曼的话说就是“漫天要价”（twice as much for half the price），见“Harri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6, 1945”，*FRUS*, 1945, Vol.5, pp.945-947.

③ 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的宣传给美国人留下的就是这种印象。见“Memorandum by Durbrow to Acheson, January 21, 1946”，*FRUS*, 1946, Vol.6, pp.820-821；Funj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19.

④ “Harri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6, 1945”，*FRUS*, 1945, Vol.5, pp.945-947.

⑤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January 8, 1945”，*FRUS*, 1945, Malta/Yalta Meeting, Washington D.C.: GPO, 1955, pp.312-313.

⑥ “Memorandum by Morgenthau to President Roosevelt, January 10, 1945”，*FRUS*, 1945, Vol.5, pp.948-949.

对，理由是：在国会取消法律限制之前不可能向苏联提供战后贷款；大规模贷款是解决美苏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唯一的具体谈判杠杆”，现在放弃在战术上是有害的；对于如此大量的贷款，苏联的偿还能力存在问题。^①商务部的看法大体相同，只是口气缓和一些。^②罗斯福本人非常支持对苏联战后重建提供经济援助，也表现出对贷款问题的“浓厚兴趣”。^③不过，贷款面临的国内法律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障碍，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只能在租借方面想办法。罗斯福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俄国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苏联。”目前已经要求苏联对涵盖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的第五个租借协议做出陈述。希望国务院在现有资源的限制下，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些要求。在签署第五个协议之前，要“尽一切努力继续向苏联提供充分和不间断的物资”。^④至于战后贷款问题，正如加迪斯指出的，罗斯福也倾向于以此作为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一种“外交工具”。与国务院和哈里曼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愿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使用这种手段。^⑤所以，罗斯福不主张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战后贷款问题：“在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我们要有所保留，不要给他们任何资金上的承诺，这是非常重要的。”^⑥

1945年1月27日，美国对苏联的照会做出了正式答复：关于莫洛托夫提出的战后贷款安排问题，“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供战后长期贷款的方式和方法，但颁布相关立法以及决定相应拨款额度尚需时日。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前，我们无法在纯粹的战后贷款问题上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战后的长期贷款是我们两国战后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政府对此深信不疑。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期间，我们希望苏联将所有可能的信息都发给我们，包括苏联政府

① “Memorandum by Collado, January 4, 1945”, *FRUS*, 1945, Vol.5, pp.938-940; “Memorandum by Clayt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0, 1945”, *FRUS*, 1945, Vol.5, pp.964-966.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25, 1945”, *FRUS*, 1945, Vol.5, p.966.

③ “Grew to Harriman, January 26, 1945”, *FRUS*, 1945, Vol.5, p.968.

④ “Memorandum by 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5, 1945”, *FRUS*, 1945, Vol.5, p.944

⑤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

⑥ Blum(ed.),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pp.305-306.

准备提出的偿还条款以及贷款需求的数量和范围。就目前而言，苏联政府从我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依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款。”^①

雅尔塔会议果然没有涉及长期贷款的话题^②，莫洛托夫只是在2月5日三国外长的午餐会上提到，苏联希望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而斯退丁纽斯回答说，美国愿意随时在莫斯科或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③斯大林在雅尔塔也没有提战后贷款问题，只是在2月8日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说，希望美国把一些剩余航运物资卖给苏联。总统说，这需要对立法进行一些修改，以使战后美国和英国不需要的过剩物资可以不加任何利息地以信贷方式进行转移。斯大林马上赞扬说，租借法案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④在同日的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再次高度评价说，“租借是总统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⑤显然，斯大林从法律方面领会和理解了罗斯福的立场，因而专注于通过租借方式取得经济援助。当然，雅尔塔会议讨论最多的对德索赔问题，实际上也是构成苏联战后重建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斯大林或许是担心此时提出贷款问题不仅无效，还会干扰关于苏联必争的重要资源问题的讨论。贷款条件肯定也在莫斯科的考虑之中。1944年12月米高扬建议不接受10亿克朗（约2.38亿美元）的瑞典

①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Kennan, January 27, 1945”, *FRUS*, 1945, Vol.5, pp.968-970.

② 在一些俄国研究著作中流行着一种显然没有根据的说法，即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许诺斯大林将为苏联提供100亿美元左右的贷款。Данилов А.А., 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С.20-22; Батюк В, Евстафьев Д. Первые заморозки. С.95.

③ “Luncheon Meeting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February 5, 1945”, *FRUS*, 1945, Malta/Yalta Meeting, pp.608-610.

④ “Roosevelt-Stalin Meeting, February 8, 1945, *FRUS*, 1945”, Malta/Yalta Meeting, pp.766-768. 相关会谈记录的俄国档案参见 Громыко А.А.(гла. ре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гг. Том 4. Крым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рех союзных держав-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4-11 февраля 1945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4. С.128-133.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第484-491页。

⑤ “Tripartite Dinner Meeting(Bohlen Minutes), February 8, 1945, *FRUS*, 1945”, Malta/ Yalta Meeting, pp.797-799. 会谈记录的俄国档案参见 Громыко А.А.(гла. ре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гг. Том 4. С.135-145.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第492-506页。

贷款，其理由就是条件不好（3.5%的利率、25%用现金支付等）。^①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②无论如何，这次最重要的三巨头第二次聚会再次避开了贷款问题。

罗斯福的确有意尽快排除美国关于贷款问题的立法障碍，雅尔塔会议刚结束，总统就强烈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美国马上响应建立国际银行的建议，其理由之一就是国际银行将对成员国“重建和开发计划的外汇需要提供可靠的贷款或对这种贷款提供保证”。准备提交国会通过的还有扩大和加强 1934 年贸易法、缔结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国际协定、修改进出口银行章程以及废除约翰逊法案等。^③然而，病魔缠身的罗斯福未能看到这些结果，更没有机会处理战后对苏贷款的问题——他在两个月后病逝了。罗斯福应该后悔他做出的在雅尔塔会议不讨论对苏贷款问题的决定。无论如何，世界三巨头会议的决议会对以后事情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即使战后贷款问题无法看到直接和明确的结果，一个意向性的文件也会约束继任总统的行事方向和范围。事实是，担任副总统仅 83 天的杜鲁门（Harry Truman）接管白宫权力后不久，与罗斯福的对苏外交路线便渐行渐远了。

三、美国拒绝贷款与苏联的强硬态度

哈里·杜鲁门是民主党内的右翼，其对苏联的思想和主张都属“鹰派”。就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不久，据后来成为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葛罗米柯说，当时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宣称，应该“先让两国尽可能地互相残杀”，美国再施以援手。^④另一方面，欧洲战事临近结束、苏联在处理波兰和东欧事务中的强硬态度以及罗斯福的去世，使美国国内受到压抑的孤立主义和反苏情绪迅

① Кен О., Рупасов А., Самуэльсон Л. Швеция в политике Москвы, 1930-195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С.342-343.

② 如，等待美国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那时华盛顿就会给予更加慷慨的条件；在意识形态上苏联对自给自足和计划经济充满自信。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p.51.

③ 《罗斯福选集》，第 605-606、608 页。

④ Соколов. Ленд-лиз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14.

速蔓延，尤其在国务院和国会。^①这种政治氛围无疑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对苏政策中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倾向。1945年4月23日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的讲话，可能并非如他所回忆的那样粗鲁、无礼，但确是强硬和冷漠的。^②5月10日杜鲁门草率地批准“立即停止”对苏联的租借援助，确属经验不足（没考虑到对日作战），也非刻意针对苏联（英国接到了同样的通知），而且在莫斯科抗议后立即收回了成命。^③不过，这些无知举动也表明了其下意识中对苏联的不满情绪。无论如何，在对日作战结束以后，经历了几个月的反复试探和磋商，美国对苏联的租借贷款走到了尽头，关于信用贷款的谈判也无果而终。

尽管雅尔塔会议没有涉及贷款问题，但美国总要给苏联一个答复，所以政府内部的讨论仍在继续。4月11日，哈里曼建议，“应该尽一切努力从国会获得贷款授权”，尽快“主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但必须表明，这种合作“取决于苏联政府在其他事务上对等合作的态度”。^④4月19日，金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OFD）主任科拉多（E. Collado）建议：在“政治条件”有利的前提下，与苏联开始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亿美元贷款的谈判，但利率不应接受苏联提出的2.25%的特殊要求；考虑将来部分通过世界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可行性。^⑤5月9日，斯退丁纽斯提交了将向总统报告的有关租借物资的原则意见：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优先于苏联；开始削减对苏联的租借物资；给予苏联的对日作战物资继续大力推进；在租借及类似问题上对苏态度要坚定，同时避免任何威胁暗示或政治谈判的迹象。^⑥

① [美]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决定性的一年（1945）》，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93-94页；“Minutes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Staff Committee, April 20, 1945”, *FRUS*, 1945, Vol.5, pp.839-842; Funj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p.21-22.

② 谈话内容详见 *FRUS*, 1945, Vol.5, pp.256-258; [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刘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65页；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决定性的一年（1945）》，第73-74页。关于这次对话的评论参见 Groffrey Roberts, “Sexing up the Cold War: New Evidence on the Molotov-Truman Talks of April 1945”, *Cold War History*, Vol.4, No.3, April 2004, pp.105-111.

③ 详见 Blum(ed.),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pp.447-448;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Т.2. С.388-391.

④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11, 1945”, *FRUS*, 1945, Vol.5, pp.994-996.

⑤ “Memorandum by Collado, April 19, 1945”, *FRUS*, 1945, Vol.5, pp.997-998.

⑥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Grew, May 9, 1945”, *FRUS*, 1945, Vol.5, p.998.

在6月11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美国驻苏代办佩奇（W. Page）通知并再次强调：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战争结束后租借就将停止；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战后贷款问题，但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①这个难题已经拖延了一年多，现在总算开始解决了。1945年7月，杜鲁门要求国会将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权限从7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并提出如果能按照租借协定中的3-C条款^②达成一项贷款协议，其中的10亿美元将专门拨给苏联（据金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的设想，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总计28-33亿美元），以后可能还需要10亿或20亿美元。^③《进出口银行法》经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后，于1945年7月31日开始实施。^④这样，限制向苏联贷款的一个法律障碍（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已经消除，而采用租借贷款形式则可以规避约翰逊法案。但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对贷款问题实施政治干预，正如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J. Byrnes）所说，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将进出口银行的计划与“美国外交政策框架相联系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参与了世界银行重大贷款政策的制定及与特定国家的每一步信贷谈判。^⑤

在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经济问题清单中，国务院在苏联项下列出的第一条就是信用贷款问题。^⑥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尚不清楚波茨坦会议为何也没有讨论美国对苏贷款问题。^⑦不过，哈里曼还是在8月9日通知苏联政府，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11, 1945”, *FRUS*, 1945, Vol.5, pp.1018-1021.

② 根据对1941年租借法案的3-C条款，租借援助中的工业设备和物资在战后仍继续使用，可以贷款方式提供，还款期30年，年利率2.375%。见 *FRUS*, 1946, Vol.1, p.1395(note).

③ “Collado to Acheson, July 9, 1945”, *FRUS*, 1946, Vol.1, Washington D.C.: GPO, 1972, pp.1395-1396; Paterson,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p.81;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p.30. Pollard 在书中说，国会废除了1934年的约翰逊法案，这显然是错误的。约翰逊法案至今仍然有效，但正如 Paterson 所说，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都免于适用该法。

④ *FRUS*, 1945, Vol.5, p.347(note).

⑤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rowley, Drafted September 3, 1945”, *FRUS*, 1946, Vol.1, pp.1402-1403.

⑥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June 18, 1945”, *FRUS*, 1945,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I, p.181.

⑦ 后来杜鲁门曾对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说，1945年他本来打算在与斯大林见面时提出给苏联60亿美元贷款的问题，后因受到“羞辱”就放弃了。1950年5月赖伊向斯大林提及此事，斯大林没有否认，只是说：“战时和战后初期，我们迫切需要贷款，现在不再需要了。”斯大林与赖伊会谈记录，1950年5月15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53. л.18-34//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3. С.109-116.关于该问题，笔者尚未找到相关的史料。

美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贷款。^①于是，在美国的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主席鲁登科（Rudenko）正式提出，苏联政府同意以贷款的方式采购约 4 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租借物资，还希望通过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获得一笔 10 亿美元的信贷，期限 30 年，从第 9 年末开始还贷，年利率 2.375%。此外，苏联还要求美方在目前合同价格的基础上给予 10% 的折扣。^②显然，苏联已经从原来的提案退缩，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条件。然而，这时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特别是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

1945 年 9 月，以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科尔默（W. Colmer）为首的国会众议员代表团和参议员佩珀（C. Pepper）访问苏联，关于贷款问题，美国提出了很多政治条件，如提供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情况，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等。^③根据哈里曼的记录，在 9 月 14 日分别与科尔默和佩珀会谈时，斯大林抱怨说，苏联曾提出 60 亿美元的贷款要求，但至今没有得到美方的答复；苏美在贷款利率上有些分歧，而价格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斯大林详细讲述了苏联战后重建所需要的援助项目，并说苏联可以用谷物、肉类、原材料和黄金偿还美国贷款。斯大林还强调，必须先原则上就贷款问题做出决定，再由专家们讨论细节问题。会谈结束后，斯大林私下拉住凯南说：“告诉你的伙伴们，不要为那些东欧国家担心。我们的军队会离开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④这最后一句“多余的话”，明显是为了打消国会议员们的政治顾虑。参议员佩珀在 9 月 21 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讲到，美国人民了解战争给苏联带来的巨大损失，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对苏联“批评”的声音，认为苏联想无偿地从美国得到贷款。佩珀还特意提到，美国希望苏联对周边弱小国家继续推行友好政策，避免给人造成苏联想要割占这些国家领土的印象。^⑤显然，美国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贷款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和迫使苏联改变对东欧政策的杠杆，尽管苏联一

① Paterson,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p.82. 据作者说，这个情况是哈里曼本人在 1967 年 11 月 20 日告诉他的。

② “Rudenko to Crowley, August 28, 1945”, *FRUS*, 1945, Vol.5, pp.1034-1036.

③ [美]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 591-592 页；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62-63.

④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5, 1945”, *FRUS*, 1945, Vol.5, pp.881-884.

⑤ 维辛斯基与佩珀会谈记录，1945 年 9 月 21 日。АВПФ. ф.06. оп.7. п.4. д.4. л.23-25.

再表示出对贷款的强烈要求。这一轮谈判几乎也是无果而终。根据俄国档案，10月15日美苏签订了一项协定，美国同意向苏联支付一笔贷款，用于支付战后剩余的按照租借法案供应的设备和材料。不过金额只有苏联对于租借贷款要求的一半：这批设备和材料的价值2.4亿美元，如果去掉美国尚未提供的物资和供应不配套的设备，仅剩2亿美元。^①

此后，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以科尔默为首的美国国会关于战后经济政策和计划特别委员会于11月提出的报告指出，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有六点：必须保证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苏联应该“全面和坦率地披露”他们的生产统计数据；苏联必须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苏联必须披露与东欧国家贸易条约的条款；苏联不得从东欧榨取救济物资；在向东欧国家提供任何贷款之前，美国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此外还提到许多与“门户开放”有关的事项。^②这实际上等于宣布关闭了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闸门。贝尔纳斯承认，对于苏联提出的10亿美元的贷款要求，美国政府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国务院一直奉行不鼓励积极讨论的政策，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③面对美国的态度和立场，11月15日迈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警告说，租借和贷款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手段”。^④

当然，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副国务卿艾奇逊认为，美苏之间的根本利益不会发生冲突。商务部长华莱士（H. Wallace）指出，那些对我们的盟友产生怀疑并在国家之间制造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拉蒙特（C. Lamont）则呼吁，苏联新的五年计划证明了其“和平意图，这对美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⑤驻苏大使哈里曼也感到，到目前为止的美国对苏经济政策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误解，助长了苏联

① РГАЭ. ф.413сч. оп.25. д.3338. л.1-2//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науч.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9-1952.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6. С.559-560.

②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Post-War Economic Policy and Planning, 8th Report,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Europe", 79 Cong, 1 Sess, 1945(Serial 10936), pp.10-11, 31-33. 转引自 Paterson,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p.84.

③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Harriman, November 30, 1945", *FRUS*, 1945, Vol.5, p.1048.

④ 迈斯基致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5年11月15日。АВПРФ. ф.06. оп.7. пал.18. д.184. л.38-75.

⑤ National Council of American-Soviet Friendship, *USA-USSR: Allies for Peace*, New York, 1945, pp.13, 20. 转引自 Funj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11

“采取单边行动的倾向”，甚至还可能促成“他们对红军占领或解放的国家的贪婪政策”。^①苏联还是需要贷款的，只是不能忍受美国以政治条件进行要挟。斯大林在1946年1月23日接见即将离任的哈里曼时明确表示，苏联准备与美国开始关于贷款问题的谈判，但是不会接受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访苏（1945年9月）回国时提出的条件，并宣称，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那些“侮辱性的”条件。^②

除了政治要求，美国拖延解决贷款问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促使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虽然派代表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也签署了协议书，但是直到194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最后期限，苏联都没有宣布参加这一组织。^③美国最初的想法是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这没有苏联的参加自然不行。于是，美国决定对苏联放宽期限，并于1946年1月初通知驻苏使馆，美国已向苏联提出参加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邀请。国务院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不再争取贷款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苏联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当然很难向苏联提供重建贷款”。^④此外，如上所述，斯大林已经明确讲过，苏联希望先在原则上确定贷款问题，再讨论细节和其他问题，美国则反复要求苏方提供库存清单等材料，并在2月21日提出，美国要求在贷款谈判中同时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希望苏联政府早日答复。^⑤

1946年3月15日，苏联在复照中提出，同意在贷款谈判中与美国讨论

① “Certain Factors...”, Nov.14, 1945 Harriman Papers. Italics added. 转引自 Paterson, “The Abortive American Loan”, p.84.

② “Transcrip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talin and Harriman, January 25, 1946”, *APRF*, f.45, op.1, d.378, ll.88-97. 转引自 V.O. Pechatnov, “Averell Harriman’s Mission to Moscow”, *The Harriman Review*, No.14, July 2003, pp.45-46. 佩恰托夫所引谈话记录把斯大林接见哈里曼的时间写成1月25日，显然是把提交文件的时间误作谈话时间了。关于这次谈话还可参见[美]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591-592、593-594页。

③ 关于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问题，也在笔者的系列研究计划之中，这里不再赘述。

④ “Memorandum by Collado, February 4, 1946”, *FRUS*, 1946, Vol.6, Washington D.C.: GPO, 1969, pp.823-824.

⑤ “Secretary of State to Harriman, December 18, 1945”, *FRUS*, 1945, Vol.5, pp.1051-1052; “Thorpe to Rudenko, January 4, 1946”, *FRUS*, 1946, Vol.6, pp.818-819;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9, 1946”, *FRUS*, 1946, Vol.6, p.820; “Secretary of State to Orekhov, February 21, 1946”, *FRUS*, 1946, Vol.6, pp.828-829.

如下问题：（1）美国给予苏联长期政府贷款的数额和条件；（2）签署苏美贸易和通航条约；（3）落实美国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和就业协议第七条的办法；（4）签署结束租借和清算的协议。苏联政府认为，将任何其他问题与信用贷款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苏联愿意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①4月10日，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W. Smith）拜会副外长李维诺夫（М. Литвинов）时提到，苏联会得到贷款，但需要“某种条件”。^②4月18日美国在照会中答复，同意先讨论苏联提出的贷款和租借问题，但同时还必须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经济问题。谈判应于5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照会还表示，美国对苏联派观察员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示欢迎，并希望苏联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加入该机构。^③然而，会谈尚未开始，甚至还没有接到苏联的答复，在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将准备贷给苏联的10亿美元挪为他用的问题，理由是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已经一年多多了，这次是否会有结果是令人怀疑的，尤其是苏联不可能在贸易政策、东欧和中国东北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④此后不久，美国新闻报道中便传出美国政府可能不再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消息，当诺维科夫询问时，美方解释说，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确实告罄，但总统正在要求国会再为银行批准12.5亿美元的额度。^⑤

苏联不想放弃这次机会，5月17日诺维科夫通知美国，苏联政府准备开始贷款等问题谈判，至于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经济问题，也准备在谈判期间初步交换意见。^⑥然而，此时苏联内部出了问题。据米高扬回忆，苏联5月17日的照会既未经斯大林审阅，也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

① “Novikov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15, 1946”, *FRUS*, 1946, Vol.6, pp.829-830; Микоян А.И. Так было. С.495.

② 李维诺夫与史密斯会谈记录，1946年4月10日。АВПРФ. ф.06. оп.8. п.3. д.31. л.12-15//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нау.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4. С.195-197.

③ “Вупнес to Novikov, April 18, 1946”, *FRUS*, 1946, Vol.6, pp.834-37; Микоян А.И. Так было. С.495.

④ “Minutes of the 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April 26, 1946”, *FRUS*, 1946, Vol.1, pp.1430-1431.

⑤ “Acheson(Durbrow) Memcon, May 14, 1946”, *FRUS*, 1946, Vol.6, pp.838-839.

⑥ “Novikov to Acheson, May 17, 1946”, *FRUS*, 1946, Vol.6, pp.841-842.

是由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批准的。^①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其错误在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②5月23日，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根据5月1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起草了关于贷款谈判的指示，主要内容如下：（1）首先声明苏联代表团授权谈判的只是苏联照会中提到的4个问题，把美国照会中提到的“其他问题”作为贷款谈判的条件会被视为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因此这些问题应该在贷款额度和条件以及租借清算达成协议之后进行讨论；（2）关于10亿美元的贷款，苏联政府接受美国的提议（但贷款年息须降为2%）；（3）努力与美国签署租借结束和清算协议；（4）批准苏美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草案；（5）在促进国际贸易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但这种合作的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相矛盾；（6）上述协议和条约顺利签署后，可以听取美方对其他问题的陈述，并告知将进行研究；（7）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并签署了贷款协议、租借清算协议，代表团应该表示，苏联愿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成员，也愿意成为联合国粮食组织的成员。^③

上述态度强硬、用词尖锐的文件显然是为苏联代表团进行贷款谈判准备的，但是，尽管斯大林认为苏联那个照会已经做出了无法容忍的重大让步，美国却并未接受苏方5月17日的建议。6月13日诺维科夫收到一份照会，美国在照会中仍然坚持先前提出的同时进行“其他问题”的谈判，并再次重申，希望苏联就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问题表达意见，而这将有助于顺利完成对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讨论。^④对此，7月9日，米高扬向斯大林提交了答复草稿，其内容与以前的文件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调整了一下讨论问题的顺序。^⑤但是，似乎苏联并没有向美国提交这个答复照会。7月18日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答复有关“是否根本就不存在提前为

① Микоян А.И. Так было. С.496-497.

② Павлов М.Ю. Анастас Микоя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на фоне советской эпохи.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0. С.228-229.

③ 米高扬、维辛斯基等给斯大林的报告，1946年5月23日。РГАСПИ. ф.84. оп.1. д.28. л.67-177.

④ “Byrnes to Novikov, June 13, 1946”, *FRUS*, 1946, Vol.6, pp.844-846.

⑤ 米高扬给斯大林的报告。РГАСПИ. ф.84. оп.1. д.29. л.61-63.

苏联申请贷款的计划”这一问题时，杜鲁门痛快而简捷地答道：“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①7月下旬《纽约时报》连续公开报道：美国没有承诺向苏联贷款；关于对苏贷款问题的讨论，从未超过“初步阶段”。^②

以后，虽然苏联还对贷款抱有一线希望^③，但美苏之间再也没有就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正式的贷款谈判也从来没有举行。^④

四、几点结论和思考

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7月宣布马歇尔计划前，以租借贷款和信用贷款两种方式，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苏联是最早提出贷款要求的，但最后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剩余租借物资贷款。相比之下，英国1945年9月开始与美国讨论贷款问题，谈判（也很艰苦）的结果，得到了37.5亿美元的贷款，利息2%（如果算上5年的付息宽限期，实际为1.63%），此外作为租借“收尾”计划追加的贷款，还有6.5亿美元。^⑤得到美国贷款（美元）的欧洲国家还有法国（19亿）、意大利（5.13亿）、波兰（2.251亿）、丹麦（2.72亿）和希腊（1.61亿）。^⑥除希腊外，贷款额度都比苏联多。即使远在亚洲的中国，得到的美国贷款也比苏联多得多：至1947年6月30日，中国

① “Editorial Note”, *FRUS*, 1946, Vol.6, pp.839-840.

② *New York Times*, July 22, 25, 1946.

③ 是年10月7日，苏联接受了2780万美元的瑞典贷款（实际利息2.37%）。РГАСПИ. ф.84. оп.1. д.141. л.45// Липкин М.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Европе. С.134. 有学者认为，莫斯科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希望“最终能够得到美国的贷款”。见 *Кен О., Рупасов А., Самуэльсон Л. Швеция в политике Москвы*. С.344. 此外，在1947年4月莫斯科会议期间，尽管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争论已经陷入僵局，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时，还反复提到贷款问题。见斯大林与马歇尔会谈记录，1947年4月15日。АВПРФ. ф.06. оп.9. п.71. д.1104. л.29-39//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нау.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406-413.

④ 此后美苏之间进行了漫长的租借清算谈判，但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⑤ [美]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决定性的一年（1945）》，第429页；[美]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符荆捷、陈盈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78-283页。

⑥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5, p.90.

政府仅得到的租借贷款就有约 7.8 亿美元，还有 1 亿多信用贷款。^①事情怎么会是如此结局？从本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

第一，罗斯福主政美国时期，美苏双方都对战后的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充满热情和希望，尽管苏联有些疑虑，但还是积极响应美国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希望在保证苏联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获取经济实惠。如果不是罗斯福突然去世，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便会提上议事日程，并很有可能得到顺利解决。

第二，为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宏大目标，取得美国提供的长期大额信用贷款是苏联最重要的外部资源。对这一点，克里姆林宫和各级官员都有共识。但是，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期待美国战后爆发经济危机，以此为自已创造最佳贷款条件，导致苏联不愿主动也未能及时正式提出合理的贷款要求。这也是雅尔塔会议未能讨论美苏贷款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罗斯福不愿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如果斯大林主动提出，罗斯福也不太可能回避。

第三，美国对外贷款的法律障碍是一个问题，但它不是针对苏联一个国家的，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美国的法律问题解决或规避后，其他国家都得到了贷款，唯独苏联除外。所以，法律限制不是苏联未能得到贷款的原因。

第四，具有右翼倾向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战后美国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蔓延、对苏联某些政治举措（主要是波兰和东欧问题）日益不满，这些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美国政府愈来愈倾向于把经济援助（主要是贷款）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杠杆，而主张“政经分离”的苏联政府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在这方面，苏联的立场在客观上具有合理性，否则美国主张的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① 据苏联当时的统计和核算，战后至 1948 年，美国给中国政府的各种援助总计超过 43 亿美元，其中租借贷款 7.776 亿美元，进出口银行贷款 0.828 亿美元，国会特别贷款 0.180 亿美元。АВПРФ. ф.434. оп.3. д.45. п.21. л.19-23//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2: 1949-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С.456-458. 中译文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1 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 年，第 246-248 页。

第五，苏联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就是没有看到战后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不愿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现实，更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而这种体制不经过逐渐的调整和改革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事实上，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后，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六，贷款问题对于苏联战后重建的重要性，必然导致贷款流产后果的严重性。在最后的谈判和交涉中，美国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而苏联则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形成僵局。如果把战后苏联经济走向封闭看作一个历史过程，那么美国对苏贷款流产就是美苏经济关系恶化、苏联与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此看来，经济摩擦和纠葛是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Abstract】 When both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hoped to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after the war, the Soviet Union raised the issue of loans for its post-war reconstruction. As the Soviet Union expected more favorable loan terms while the U.S. intended to use economic assistance as a diplomatic tool, the Soviet Union did not raise the issue of loans at the Yalta conference, thus missing the best opportunity in history. After Truman came to power, the U.S. ideological prejudices and the Soviet Union's cognitive deviation of its own economic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led to their long-term negotiations and the ultimate failure of the loan issue. The loan failure became the first domino which drove the Soviet Union apart from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The Origins of the U.S.-Soviet Cold War, the U.S.-Soviet Economic Cold War, the U.S.-Soviet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 которой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адеялись и развивали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днял вопрос о займах для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На Ялти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анный вопрос не был поднят, так как СССР ожидал более выгодных условий кредитования, а США намеревались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помощь в качеств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румент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лучш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ыла упущена. После прихода к власти Трумэн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едубеждения США и отклонения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свое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ивели к долгосрочным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займах, и не дал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результата. Неудача в вопросах кредитования стала первой костяшкой домино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сток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崔珩)

美国与中苏联盟（1950-1965年）

艾伦·林奇*

【内容提要】战后 195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失败。美国对中国相继采取接触政策（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楔子”）、极限施压政策、核武压力等，目的都在于分裂中苏同盟。然而，在中苏同盟实际破裂之后，美国方面却没有及时、正确地认识到，这就有了后来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使得其对待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区别对待）和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坚决遏制），截然不同。美国的冷战思维在亚洲地区高度程式化，并日益固化为其国内政治中的“冷战公理”，虽明显充满偏见，但无人能加以挑战，因为代价太高。尼克松-基辛格政府抓住越战失利的机会，加上二人对美国国内局势的掌控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才得以短暂实施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不过“冷战公理”的根系仍在。

【关键词】中美苏关系 中苏同盟 美国外交 亚洲冷战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6-0061
(30)

引言：美国对华政策的地缘政治背景 (1900-1948年)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美国

* 艾伦·林奇（Allen C. Lynch），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的东亚政策遭遇了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失败。自 19 世纪中期、特别是 1900 年美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东亚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利用殖民中国的列强彼此之间矛盾造成的紧张局势，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服务。^①在这一点，具有标志性象征意义的杰出代表，就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他为结束日俄战争，调停双方于 1905 年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the Treaty of Portsmouth）。罗斯福成功地促使双方接受和平条约，但是这个条约承认日本陆军和海军对于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满洲的支配地位，也保留了沙俄对于中国东北的影响力，避免了圣彼得堡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和受辱。财政上濒临破产的日本曾秘密请求罗斯福帮助结束这场战争，而他成功巧妙地利用了双方的弱点（对俄罗斯来说，是军事上的；对日本来说，是财政上的），以此防止日本在该地区实现霸权。^②同样，1918 年至 1920 年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派遣 1 万名美国士兵到西伯利亚的主要动机，就是监控日本驻扎在那里的 10 万军队和防止日本殖民这一地区。列宁本人意识到美日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并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回旋机会（被西方和日本占领的地区一直延伸到托木斯克 [Tomsk] 以西和哈尔滨以南）。^③实际上，美国在中国和整个东北亚地区所推行的政策，就是长期以来英国对欧洲大陆实行的力量制衡外交政策：支持弱者对抗强者，以确保自己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1931 年美国反对日本侵占中国满洲，以及 1937 年反对日本对更大中华地区的侵略扩张战争，都是出于同样的考量：任何外国势力想统治中国，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都将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商业和军事利益。

与此相关的是，尽管后来有说法称美国对中国存有特殊友谊，支持中国领土完整，但在关键时刻，为了安抚其盟国，美国明显罔顾中国的诸多利益。

①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2, pp.246-261.

② John Lewis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second edition, 1990, pp.32-41.

③ Donald E. Davis, Eugene P. Trani, *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Russi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2002, pp.145-146; David S. Foglesong, *America's Secret War against Bolshevism. U.S.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2, pp.143-187; Betty Miller Unterberger, *America's Siberia Expedi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6.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以拥护民族自决而闻名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殖民地移交给日本管辖（从而无意中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兴起）。1943年，尽管废除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期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前任西奥多总统的堂弟）迫使其盟友国民党主席蒋介石接受一系列屈辱让步，来诱使斯大林尽快展开作战。主要有：

1. 保留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2. 中国大连港的国际化，“苏联在这个港口的首要利益得到保护，亚瑟港（旅顺港）作为苏联海军基地的租约也得到恢复”；
3.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连通大连），由苏中合资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最高利益……”；
4. 罗斯福同意“听从斯大林元帅的建议，将采取措施促使蒋介石接受上述条件”；
5. 最后，“苏联表示愿意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缔结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用其武装力量帮助中国摆脱日本的枷锁”。^①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是根据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而制定的，这些大国包括沙皇俄国和苏联——都对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帝国主义图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两个方面，包括贸易（可以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罗斯福家族从广东贸易中获利）和移民（即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排斥中国移民）。但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控制以及最终日本对中国的侵占，意味着美国官员要通过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叠加影响，来间接地算计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为了使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美国领导人试图排除任何一方单一权力在整个中国或部分地区建立单独霸权。1946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曾试图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斡旋，其在讲话中表达了美国外交的这一关键原则。当时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绝对权力（预期与苏联结盟）将意味着美国无法实现其“进入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即，要为美国在

^① “Crimea(Yalta) Conference, 1945: Entry of the Soviet Union into War against Japan (February 11, 1945)”, <https://www.loc.gov>law>help>us-treaties>bevans>m-ust000003-1022>

东北亚大陆的影响力保留地缘政治条件。^①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次年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崩盘。这样，美国面临着一个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盟，这个联盟可能将华盛顿从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赶出去，并威胁到美国在周边地区的利益。对于这个似乎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中苏同盟，华盛顿会有何回应？

美国对中苏结盟前景的回应

（1948-1950年）

如果说在1945年初，美国、苏联以及中国领导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还在根据战时的迫切需要来进行决策，那么在1946-1948年期间，鉴于冷战出乎意料地迅速爆发，美苏马上各自制定对华政策。^②斯大林的苏联采取的是双重政策：在与中国国民党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同时，悄悄地支持中国共产党。这基于如下两个初步假设：（1）莫斯科从华盛顿获得有利可图的关系可以维持数年，直至战后时期（例如，获得战后重建的大笔贷款，并与德国谈判赔款）；（2）担心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获胜的前景，可能引发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后来在韩国和越南都发生了这种情况）。

战后初期，中共也担心美国对国民党由间接支持升级为直接支持。到了1947年中期，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宣布和苏联动员抵制这项计划，冷战大幕拉开。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1月，斯大林仍呼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和谈，这反映了其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掌权持谨慎立场和怀疑态度；为此，斯大林后来向胜利的毛泽东致歉。^③面对直接帮助国民党、参与中国内战的

① Niu Jun,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Melvyn P. Leffler and Ode Arne Westad, eds., Vol.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27.

② Ibid., pp.223-230.

③ Niu Jun,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p.232; Lorenz M. Lue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With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8-31; 另参见 Данилов А. А, 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60-64. 他们的这些描述基于当时的俄罗斯档案。

高昂代价，杜鲁门政府却步了，同时认为西欧和日本实现工业化，是赢得冷战的关键；美国选民（和经济）不会容忍中国内战的美国化，包括派遣数十万美军支持一个著名的腐败政府，而且这个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和行政执行力都令人怀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表了《中国白皮书》。这是一份百科全书式的报告，阐明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程度，旨在为美国时任政府辩护，使其免受“失去”中国的指控（但是未能成功），像“谁弄丢了中国？”这样的问责，成为共和党在1950年和1952年的选举中反对民主党的有号召力的口号。

就本文而言，对白皮书的主要兴趣，在于它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置于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考虑之中，并具体到中苏关系的背景之下。白皮书承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代表了美国利益的重大失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预见到了1950年2月《中苏条约》的签订，他在向杜鲁门总统转交白皮书的信中这样写道：

美国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任何外国力量或势力统治的政策，现在遭遇严重困难。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宣布他们服从一个外国势力[引自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外交政策]^①。过去的50年里，和在沙皇的统治下一样，苏联不遗余力地努力扩大其在远东的控制力。美国未来的政策，将取决于中国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个共产主义政权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是符合苏联的利益，以及他们在了解真相之后对外国统治做出何种反应。^②

美国“楔子”分裂战略起源 ——如何打破中苏同盟（1949-1950年）

诚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暂时削弱了美国的东亚大陆政策。然而，杜鲁门政府内的美国政策制定者辩解说，在更长的时期内（当然

① He Di,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44-1949”, in Harry Harding,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 SR Books, 1989, p.45.

②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xvi.

也不确定)，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不必由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性决定，可以摆脱意识形态上的束缚。早在 1947 年 11 月，苏联-南斯拉夫决裂之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 在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信中就指出，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如果中国国民党垮台，中国共产党会“在国际事务中依然容易受到苏联的指导或控制。”^①

1949 年 3 月，杜鲁门总统呼吁采取一项政策，“……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利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以及斯大林主义和中国在共产主义体系内外部之间的任何裂痕。”杜鲁门政府认为，向共产主义中国提供经济刺激，而不是孤立(强化中国对苏联的依赖程度)的政策，最适合利用甚至引发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凯南的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帝国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坚持盛气凌人地控制其盟友的做法，将引发中国的回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执政，因此无须(不像在东欧)依靠苏联的支持实现继续掌权。^②

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独立(不依靠其他力量)的革命锐气依然可见^③，因此在 1950 年 6 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试图为其接触政策奠定基础，以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尽管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的同一个月(1949 年 10 月)，艾奇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从长远来看，民族主义力量比共产主义更强大。莫斯科和北京迟早会发生冲突，“因为莫斯科的基本目标与中国的基本目标相抵触”。^④杜鲁门政府随后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声明，旨在为某种中美接触打开大门，为中苏分歧的出现争取时间。1950 年 1 月，美国发表的声明包括美国不会在中国台湾保卫国民党，以及艾奇逊将中国台湾(和朝鲜)排除在美国重要的防御利益之外。艾奇逊特别告诫说，不要做任何会使“使中国人民(对俄罗斯人)的义愤、愤怒和仇恨转向我们美国人的事”，

① John Lewis Gaddis, “The American “Wedge” Strategy, 1949-1955”, in Harding & Ming, op. cit., p.159.

② Ibid., p.160.

③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38-48.

④ Gaddis, op. cit., p.161.

对俄罗斯人的义愤和愤怒必须激发起来。^①1950年4月，在《中苏条约》签署后，艾奇逊告诉前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E. Dewey），美国仍有意“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楔子’”。^②

杜鲁门政府的决策者在关注中苏紧张局势出现时，考虑的是更长远的议题。事实上，艾奇逊承认，正如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分裂所表明的，共产主义扩展到其他国家，并不等于增加了苏联的影响力。但是一些事件，特别是1950年2月中苏同盟的建立、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麦卡锡主义所产生的国内政治刺激、以及中美军队从1950年底开始直接交火，所有这些都超出了杜鲁门政府最初通过接触政策培养中苏分歧的设想。^③

除此之外，鉴于美国有支持国民党的记录（在其白皮书中有详细过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想与美国和解，即使这意味着其要向苏联让步并依靠苏联。甚至在中国对朝鲜直接出兵之前，当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就被北京视为美国再次干预中国内战。此外，鉴于中苏同盟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为阻止美国对中国自身的攻击所发挥的无可置疑的作用，美国早期关于鼓励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爆发紧张局势的预判，被证明是没有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无论存在何种长期的紧张程度，都将被为生存而斗争的目标所压倒；因此，在1950-1953年期间，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反对美国。^④

艾森豪威尔结束中苏同盟的策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最大压力

与公众的印象相反的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戏剧性地、

① Gaddis, op. cit., p.161; 另参见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7-18.

② Gaddis, op. cit., p.163.

③ 关于杜鲁门政府（1945-1950）对华政策的权威阐述可参见 Melvyn P. Leffler,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81-88, 291-298, 333-341.

④ Данилов А.А., 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С.65-80.

反复地阐述巨无霸式的中苏集团，以及美国与这些“无神论”共产主义斗争的神圣使命^①；而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却认真设想如何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楔子”战略。然而，与前任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以最大压力而非接触的政策，将使这两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分崩离析。

杜勒斯在其 1949 年的著作中强调，苏联共产主义的弱点，在于它坚持俄罗斯社会主义经验的普世性。由于对亚洲记忆深刻，杜勒斯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国际共产主义团结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美国的战略应该着眼于“在苏联共产主义控制的区域内，利用潜在的猜忌、敌对和不满，从而使他们从向外输出革命，转向面对内部问题。”^②杜勒斯主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并认为“使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分离的最好方法，是对共产主义中国保持压力：只要它与苏联保持伙伴关系，其道路就十分艰难曲折。”

艾森豪威尔国家安全委员会早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裂，不可能由美国的政策造成；相反，普遍认为苏联自身行动更有可能引发二者之间的分裂。此外，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抗苏联的监护，一个反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完全有可能对美国保持敌对状态，甚至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构成比和苏联结盟更大的威胁(事实上，1960 年至 1968 年的情况就是如此，至少对于美国政策制定者如何界定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方面是这样)。^③尽管如此，从 1953 年开始，美国领导人就确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采取施压而非诱导的政策，将推动双方固有的紧张关系。

1953 年 3 月，斯大林的去世也使美国外交政策官员相信，利用中苏紧张状态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因为毛泽东将抵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马

① 参见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另参见 Nancy Bernkopf Tucker, *The China Threat: Memorie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5-40, 182-183. 塔克认为，杜勒斯(以及艾森豪威尔)关于共产主义威胁方面的很多公开言论，之所以倾向于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极端主义一翼，实际上是为了缓冲美国国内右翼对于政府政策的压力。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赞扬了杜勒斯，他指出，尽管杜勒斯经常言辞激烈，但他总是在战争的边缘停下来，因此，赫鲁晓夫说，我们应该哀悼他的去世。Nikita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p.397-398.

② Gaddis, op. cit., pp.167-168.

③ Ibid., pp.168, 181.

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等人所取代。1953 年底，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66/1 号决议》（NSC166/1），该决议体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考虑。美国政策的目的是，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对实力，（1）通过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形成围堵；（2）削弱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3）“损害中苏关系”。

随着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在利益、观点或行动时机上不可避免的分歧激化；随着中国人在要求苏联提供援助或支持时，双方往往会纠缠不清；或者，随着中国作为远东地区国际共产主义的替代者角色，变得过于独立和自力更生——俄罗斯人将受到强大的诱惑，走向对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控制的方向。如果有一天，俄罗斯人觉得有必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争夺在中国体制内的主导地位，那么中苏同盟将面临严重危险。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仅是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中国人。^①

相应地，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实施这种压力。艾森豪威尔掌权后，白宫改变了对美国舰队在台湾海峡的指令：它现在不是被用来防止中国国民党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的美国政府还拒绝遣返中国（和朝鲜）战俘，甚至不惜延迟签署停战协定。美国中情局还在西藏进行秘密行动以颠覆中国的影响力，并在缅甸-中国边境进行军事行动。^②1950 年，美国开始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到了 1954 年，美国为法国的这场战争提供了 80% 的资金。在日内瓦印支和平会议（1954 年 5 月-7 月）上，时任国务卿杜勒斯尖酸刻薄地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这种故意的粗鲁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策的核心假设：孤立和压力会迫使中国依赖苏联的安全保障，而莫斯科，即便愿意，最终也会犹豫要不要给中国提供这些保障。1954 年 8 月，中国开始炮轰金门岛和马祖岛，美国故意将危机升级，以对中苏同盟施加压力。到 1954 年底，美国与台湾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1955 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台湾问题决议”（Formosa Resolution），含蓄地将美国的安全保障延

① Gaddis, op. cit., pp.170-171.

②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3, Vol.5, Issue 3, pp. 54-79; Robert H. Taylor, “Foreign and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the KMT Intervention in Burma”, *Data Paper #93*,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July 1973.

伸至金门、马祖以及台湾本土。^①同样，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对中国奉行“边缘政策”。艾森豪威尔暗示，为了台湾，可能会使用核武器。他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国的战争也意味着与苏联的战争。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不会允许“苏联帮助中国与我们作战，而我们却不加介入”。他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核对抗中，如果苏联未能履行其在联盟条约中的承诺，那么“苏联帝国（苏联集团）将很快瓦解”。^②

中苏同盟的现实 (1950-1955年)

艾森豪威尔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当时中苏同盟是颇为现实的，而且具有多面性。^③对于该同盟的威慑作用，从杜鲁门总统试图确定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利益性质中就可以看出。在派遣大量美国地面部队之前，杜鲁门政府正式与苏联政府接触，试探其对战争的立场。在收到苏联关于莫斯科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答复后，美国政府断定莫斯科不会直接干预冲突，然后决定向朝鲜派遣大量军队。^④尽管中国在朝鲜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但美国不愿攻击中国本身，这无疑是受到了《中苏条约》的影响。其他一些证据也证明了这个同盟的现实性特征：（1）在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的葬礼（1953年3月）上，苏联新领导层同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迅速结束已经僵持了两年的朝鲜战争；同年7月签署了停战协定。（2）1954年5-7月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苏联和中国在会议上密切协调

① Zhang Baijia, “Chinese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37-1945”, in Harding & Ming, op. cit., 1992, p.28.

② Ibid., p.172. 1955年1月，杜勒斯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机密声明中说，“苏联的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那么暴力，可以推断，……他们的意图是牵制中国共产党。例如，他们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进行任何正式、明确的表态。” Chang, op. cit., pp.129-130.

③ 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签署同盟条约前夕相关谈话记录，参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Scholars, Winter 1995/1996, pp.3-9. 另参见 Luethi, op. cit., pp.31-41.

④ Swain et al., op. cit., pp.154-155.

各自的立场。^①（3）尽管对 1954 年中国炮击近海岛屿持保留态度，但苏联公开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4）同样在 1954 年，赫鲁晓夫履行了斯大林在 1950 年条约中做出的承诺，将苏联在满洲的资产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包括所有的苏中合资公司、中东铁路、以及在旅顺港的苏联海军基地。（5）在 1955 年 7 月的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敦促艾森豪威尔正视共产党治理中国的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6）1956 年 11 月，毛泽东坚定并公开支持赫鲁晓夫派 20 万苏联军队到匈牙利的决定。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了一项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亦即历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所说的“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转让”。^②这相当于苏联国民收入的 7%，或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相对水平的三倍（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到 1956 年 8 月，“苏联向中国输出他们生产的大部分新工业设备，而这是以牺牲他们自己的经济计划为代价的。”^③在此期间，得益于苏联的帮助，中国已经能够部署大约 1800 架喷气式战斗机。^④苏联的援助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科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包括中国核能工业几乎全部的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向中国提供一枚核弹样本的承诺。^⑤1953 年 5 月达成的协议中，有 91 个项目与国防有关。1953 年至 1956 年间，约有 1 万名中国学生在苏联学习，另有 1.7 万名学生在中国由苏联教师授课。到 1960 年，已有 8000 多名苏联专家常驻中国，向中国传授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莫斯科还帮助北京建设了 116 个成套设备的工业工厂，88 个工厂，部分设备来自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⑥

① 有关“中国和苏联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合作的重要详细文件，包括他们成功地向越盟施压，要求其接受越南在 17 度线的临时分治”，可参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6*,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Fall 2007/Winter 2008, pp.12-103; 也参见 Zubok, op. cit., pp.110-111.

②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Norton, 2003, p.337.

③ Zubok, p.111.

④ Tucker, op. cit.,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2059.

⑤ Zubok, op. cit., p.111.

⑥ Shu Guang Zhang,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1954-1962”, in *Cambridge History*, op. cit., p.355; Chen Jian, op. cit., pp.61-63.有关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计划的许多细节和范围，请参见 Борисов О.Б, Колосков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72. С.142-152, 177-183.

无论如何，特别是考虑到苏联刚刚从战后十年的大规模重建中走出来，这个社会里的消费者渴望过上舒适生活，所以苏联的所作所为是共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具有约束力的有力例证。如果苏联愿意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祭坛上牺牲国家主要的经济利益，那么美国的压力能迫使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出现“楔子”吗，更不用说分裂，这又有多少合理性呢？

中-苏-美关系中的核因素

中苏分裂，或者我称之为“冷战中的冷战”，有多重原因：毛泽东拒绝接受赫鲁晓夫为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人^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在世界事务中维护真正的独立；两国彼此根深蒂固的文化甚至种族偏见^②；还有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的怠慢做出的鲁莽反应。然而，这些因素在一个常数因子内操作：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努力在国际上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在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而美国（及其盟友一起）在其主导的国际环境中，致力于挫败这些目标。这很大程度上包括了美国的核能力。在 20 世纪整个 50 年代里，美国有能力用核武器攻击苏联或中国的任何目标。尽管赫鲁晓夫虚张声势，但苏联没有可靠的手段攻击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层在斯大林去世后，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可能：即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共产主义中国，其领袖毛泽东坚持要求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至少平等的地位，而且可能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首先是台湾问题——把苏联拖入与美

① 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拉琴科写道：“毛泽东的革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最终目的是要结束中国‘百年的屈辱’，使中国成为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强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两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大国不可能有平等地位的盟友。”Sergey Radchenko, “The Sino-Soviet Split”, in *Cambridge History*, op. cit., Vol. II, p.372.

② Shu Guang Zhang, op. cit., p.375. 这位中国学者写道：“1954 年至 1962 年间，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日益艰难，这表明，打击共同敌人的共同利益，不足以维持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联盟。中苏两国未能克服其受文化束缚的民族中心主义所产生的观念和误解。”上文中的拉琴科说，“微妙的种族主义是（苏联）政策形成的一个因素。中国人对于俄罗斯咄咄逼人、傲慢自大的刻板印象，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苏联的实际行动加以证实；但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印象让中国人难以清晰理解苏联的动机和政策。”

国的核对抗之中。

尽管苏联在 1954-1955 年和 1958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勇敢地公开表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但事实上苏联领导人已经开始重新评估《中苏条约》对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具体影响。早在 1953 年冬，杜勒斯在柏林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后指出，苏联领导人显得“担心中国共产党可能发动新的侵略”。^①一年后，莫洛托夫似乎暗示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他对美国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说，“中国永远是中国，她永远不会是欧洲人。”^②事实上，自 1917 年以来，苏联领导人感受到了其全球意识形态抱负与国家间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第二个主要共产主义国家的成立，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苏联在同时追求革命目标和外交目标方面，更加难以平衡。如果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戴高乐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会为了巴黎而牺牲纽约吗？”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联和中国领导人都开始提出类似的问题：对莫斯科来说，问题是，毛泽东会不会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就为中国的具体利益，把苏联拖入与美国的核对峙之中？对北京来说，这个问题是：如果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华盛顿发生军事冲突，是否能够相信莫斯科会以核武器支持这个国家？

1956 年 2 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没有事先咨询或通知毛泽东的情况下谴责斯大林），赫鲁晓夫公开挑战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适用于国际事务。他宣称，核时代的世界大战并非“注定不可避免”。此外，现在有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甚至可能是与议会民主相容的道路。实际上，核武器对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同样构成威胁，需要重新思考战争与革命的关系。如果核武器并不是按阶级原则（the class principle）来使用的话，那么所有国家（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安排它们自己的国际关系，以防止一场世界核战，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核武器破坏了世界大战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迎来了俄国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国际体系，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看到的，将不是共产主义

① Gaddis, in Harding & Ming, op. cit., p.172.

② Ibid., footnote 96, p.182.

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道毁灭。中苏同盟能否经受住核武器给国际共产主义团结带来的新压力？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核战争问题上与赫鲁晓夫意见相左，但毛泽东的想法应该被认真对待。尽管毛泽东经常对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官员说，核战争和美国力量（纸老虎）微不足道，但他并不否认核武器对国际共产主义构成了一种新的、质的威胁这一事实：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于台湾海峡两岸危机的宣传和管控，反映出对不挑起美国核攻击格外谨慎的态度。^①毛泽东相当担心核武器的威慑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因为该国的国家和革命目标尚未完成。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盟友（苏联）在同美国发生核战争的前景面前畏缩不前，那么中国——没有自己的核武器——如何收复台湾、防御美国在边境上的威胁（越南、韩国），或在东南亚和整个第三世界推进中国的革命目标呢？

1954-1955 年和 1958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验证了对这一关切的测试。毛泽东发动这些危机的真正用意，并不是我们在此讨论的核心问题。^②炮击国民党占领的金门岛和马祖岛（1954 年 9 月开始）的时机，显然与早期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 年 2 月）对蒋介石的“约束放松”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 1954 年夏天美国与台湾就《共同防御条约》进行磋商有关。^③1958 年事件，导致从 1957 年 12 月起美国和中国大使级会谈的中断。1955 年夏天第一次海峡危机结束后，美国和中国的大使级会谈一直在日内瓦举行；1958 年的炮击，似乎是由美、英对黎巴嫩和约旦的短暂占领引发的。在每一个案例中，毛泽东都在进行试探，以确定美国对台湾实际军事承诺的程度，推进他自己的“边缘政策”以检验华盛顿的容忍限度，以及含蓄地验证，与美国对抗时，苏联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中国。^④陈兼就此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毛泽东也试图动员中国社会继续其革命，这意

① Niu Jun, “Chinese Decision-Making in Three Military 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Swaine et al., op. cit., pp.293-326.

②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op. cit., pp.208-231; 主要的中文资料、档案，节选自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的《回忆录》，他在 1958 年海峡危机期间直接参与决策。也可参见 Chen Jian, op. cit., pp.163-204.

③ Niu Jun, op. cit., pp.300-301.

④ Niu Jun, op. cit., p.305.

味着类似的国内和国际动机造成了这些危机。^①

作为回应，美国政府也诉诸边缘政策，暗示（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通过在地区部署武力）在发生冲突时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内部记录显示，虽然美国试图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但它已完全准备好在战争到来时使用核武器（尽管有中苏同盟条约）。^②如果毛泽东怀疑美国会为两个军事上无关紧要的岛屿冒战争的风险（这两个岛屿距离中国大陆只有几英里，但距离台湾本土有 100 英里），那么美国人则怀疑苏联会因为同样的利害关系而冒着与美国开战的风险（尤其是因为莫斯科没有打击美国的核能力）。艾森豪威尔明白这一点，并告诉他的新闻秘书哈格蒂（James C. Hagerty），莫斯科和北京很可能在金门、马祖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艾森豪威尔说：“我有一种感觉，中国共产党人是自己行动的；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相当令其不安的。”^③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打算在一个有可能分裂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对这两个国家施加最大的压力：威胁，包括使用核武器，瞄准中国，也针对苏联。

艾森豪威尔关于苏联对毛泽东的挑衅感到不安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实上，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政策感到震惊。^④表面上，苏联履行了 1950 年条约规定的义务，在与华盛顿发生战争和 1958 年危机两次事件中，每一次都公开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向艾森豪威尔政府传递了一个粗鲁的信息，内中充满了“诬告，辱骂，以及不可原谅的威胁，以至于它被要求召回大使。”^⑤但表象具有欺骗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发动第二次海峡危机的动机之一，是破坏他所认为的赫鲁晓夫要单独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努力。正如陈兼所描述的那样，毛泽东不仅打算挑战台北和华盛顿，还打算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⑥首先，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 23 日发动了

① Chen Jian, op. cit., pp.163, 167-169, 175.

② William I. Hitchcock, *The Age of Eisenhow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1950'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8, pp.206-209, 400-404.

③ Gaddis, op. cit., p.172.

④ Chen Jian, op. cit., p.163; Luethi, op. cit., pp.103-104.

⑤ Robert L. Suettinger, "U.S. 'Management' of Taiwan Strait 'Crises'", in Swain et al., op. cit., p.271. 赫鲁晓夫在确定毛泽东无意在近海岛屿问题上直接对抗美国之后，才发出这一信息的。

⑥ Chen Jian, op. cit., p.178.

对近海岛屿的炮击，事先没有给莫斯科任何预警。^①9月初，在杜勒斯威胁要发动战争保卫这些岛屿之后，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与毛泽东对峙。作为对于葛罗米柯警告毛泽东不要激怒美国的回应，毛泽东宣称，如果美国人用核武器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会向内陆撤退，也把美国人一起拉到内陆，然后苏联人“用你所有的一切去攻击美国人”。^②目瞪口呆的葛罗米柯当场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如果再经受一次这样的考验，中苏同盟将难以为继。

即使在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苏联公开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美国，赫鲁晓夫也在寻找一种可以缓和与华盛顿紧张关系的手段，以服务于他的国内经济目的及其核时代和平共处的愿景。事实上，让赫鲁晓夫对缓和政策抱有希望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是为了增加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而鼓励其缓和政策。美国试图分裂莫斯科和北京，而不是相反。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核压力，以及向莫斯科示好，这些无疑都加速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却迟迟没能全面了解即将到来的这场分裂的内涵。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惰性（所获信息遭到了强烈质疑）；部分原因是随着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紧张关系的证据越来越多，许多人做出了反应，并将这种分裂纳入了既有的冷战模式之中。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而言，独立于莫斯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构成更大的威胁；而莫斯科是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的一个因素，但北京不愿受制于莫斯科。^③

谁是第一

事实上，自1956年初以来，中苏关系在多个方面不断恶化：意识形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热情与苏联的谨慎）；经济（当赫鲁晓夫试图超越斯大林高度集权 and 高度军事化的经济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了大跃进）；战略上（中国真的能指望莫斯科的核保证吗？）以及个人（谁是共产党的头号

① Chen Jian, *op. cit.*, p.178.

② Suettinger, *op. cit.*, p.270; Taubman, *op. cit.*, p.392.

③ Tucker, *op. cit.*,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3487-3520.

领导人?)^①

1956年2月下旬，赫鲁晓夫在一次秘密演讲中，谴责斯大林屠杀了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人和外国共产党人，这也许是这个同盟解体的第一个重要线索。^②在赫鲁晓夫戏剧性地退出斯大林路线之前，毛泽东和任何其他中国官员都没有被咨询过，甚至也没有被告知。1955年，当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和解时，毛泽东较早前持有严正的保留意见；而这次，他抨击了赫鲁晓夫。^③

到了1959年，中苏两国关系破裂。7月，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了对毛泽东至关重要的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在1959年8月爆发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在这场涉及其名义上的共产主义盟友与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冲突中，苏联采取中立政策。^④同年8月20日，苏联正式取消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计划，拆除了一枚已经完全组装好的核弹（曾准备交付给中国）。^⑤苏共向中共发表一份官方声明，解释了这一政策背后的逻辑：它可能会破坏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努力。公报说，“如果这一武器转让发生，西方得知此事，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就有可能受到危害。”^⑥最后，赫鲁晓夫计划在9月下旬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定假日重合。这次访问没有共产党

① Suettinger, op. cit., p.274; Radchenko, op. cit., pp.349-372 and Tucker, op. cit., pp.103-120. 一个早期的例子强调了中国对苏联不正当影响的敏感性，那就是“高岗事件”：高岗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东北党领导人，1954年被毛泽东指控成立“反党联盟”后自杀，周恩来指责其在东北建立“独立王国”和“在与苏联关系中混淆是非”。Frederick C. Teiwe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New York: M.E. Sharpe, 1990, pp.127-128; Barbara Barnouin, Yu Changgen, *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p.166.

② 有关大量中苏文件，参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op. cit., pp.148-185；另参见 Chen Jian, op. cit., pp.64-68; Luethi, op. cit., pp.47-53. 关于赫鲁晓夫对双方分裂的描述，参见 Khrushchev, op. cit., pp.461-479;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secret speech, see pp.560-618.该文本由美国国务院于1956年6月4日发布。

③ BBC, *Messengers from Moscow* (1995), part 2, "East", 37:00-39:55. 基于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官），和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届党代会的代表团，以及苏联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卡皮察（Mikhail Kapitsa）的证词。另参见 Shu Guang Zhang, op. cit., p.360.

④ Luethi, op. cit., pp.142-146.

⑤ Zubok, op. cit., p.137.

⑥ Aleksandr Fursenko,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New York: Norton, 2006, p. 328.

兄弟般的盛况，只持续了3天，而且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喊话比赛”。

赫鲁晓夫也有他羞辱毛泽东的方式：这次访问是在对美国进行了13天的访问之后进行的^①，这位苏联领导人滔滔不绝地对毛泽东说，美国人多么富有，需要避免激怒美国，尤其是在近海岛屿问题上。因为毛泽东没有事先就炮击问题征求他的意见，赫鲁晓夫特别生气：“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②毛泽东则当面回应赫鲁晓夫为“时间服务器（time server）”^③（指没有主见的人——译者注）。

到了1960年初，中国共产党公开谴责赫鲁晓夫机会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认为这是对列宁主义原则的背叛。6月下旬，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发言攻击中共。^④三周后，苏联突然从中国撤走了所有的科学技术专家，取消了12项援助协议和大约200个科学技术领域的联合项目。^⑤数千名技术顾问要么被立即撤回，要么在抵达中国之前合同就被取消了。同年8月，莫斯科通知北京，它已经接受了美国的提议，就一项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最终于1963年8月签署）。在北京方面看来，这是一项构建苏美核共管的措施。^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由苏联策划、执行和了结的，没有与北京进行任何磋商或通知。作为回应，北京在危机期间对印度的边境骚扰给予坚决回击，攻入印度北部并撤了出来。1962年11月，苏联宣布在重新开始的中印边界冲突中保持中立。最后，到了1964年，毛泽东公开质疑苏联远东领土的合法性，他特别指出19世纪50年代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这些领土，而西方

① Luethi, op. cit., pp.146-150; Олег Гриневский. Тысяча и один день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8. С.20-22, 30-47, 82-102. 访问期间，赫鲁晓夫试图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美国总统坚持其政府的政策，即不采取任何措施缓和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实质性讨论。Chang, op. cit., pp.209-211.

② Chang, op. cit., p.393.

③ Shu Guang Zhang, op. cit., p.368.

④ Shu Guang Zhang, op. cit., p.370. 60年代初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其深度和广度可见一斑。参见 Борисов О.Б, Колосков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92-320.

⑤ Ibid., pp.370-371; Zubok, op. cit., p.137.

⑥ Shu Guang Zhang, op. cit., pp.370-371. 鉴于肯尼迪政府试图利用与莫斯科达成的核军备控制协议来约束中国的核发展，上述结论是正确的。

列强在 1943 年否决了这些条约。

因此，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自 1949 年以来的东亚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与东亚有关是另一个问题）：莫斯科与北京已经戏剧性地分道扬镳。1950 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约翰·吉廷（John Gitting）有获得研究苏联和中国第一手资料的优势，在 1968 年提出关于造成这种分裂的主要原因，与最近的学术研究一致。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这种分裂定制基调——首要的是毛泽东——决心把中国建成一个在国内外真正的主权国家。然后，吉廷写道：

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对苏联的永久经济和军事依附，以及在外交上的依赖；要么寻求缩短其当时与大国地位之间的差距，而这将不可避免地扩大与苏联的政治差距。这个决定（后一种选择）可能从未有人怀疑过。^①

三十年后，陈兼也是凭借能接触到中国和苏联档案资料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了如下观点：“毛泽东所要挑战的是苏联领导人的道德勇气和意识形态价值观，从而让他们显得气势低下。”^②

美国的政策也在发挥分裂中苏的功用——阻挠中国，并主动向莫斯科提供缓和的机会——大大加剧了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加速双方分裂的到来。然而，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即将上任的肯尼迪政府，都未能对越来越多的这种分裂迹象做出合理回应，以便适时重新调整美国的冷战政策。^③

美国对中苏分裂的回应 ——升级越南局势（1961-1965 年）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苏分裂的回应，都不是重新评估自身的政

① As cited in Gaddis, op. cit., p.175.

② Chen Jian, op. cit., p.204.

③ Miroslav Nincic, *Anatomy of Hostility. The U.S.-Soviet Rivalry in Perspectiv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 pp.146-181.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政治家们为低估共产主义的威胁，付出了比高估共产主义威胁要多得多的（特别是国内选举方面的）代价。

策。毛泽东认为，中国面临着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系统性的敌意，准确地说，这是由于中国以改变后殖民世界为己任，以及中国本身的革命热情造成的。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和不可预测；但没有越来越明显的分裂迹象，使自己有机会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发挥平衡力量的作用（尼克松后来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在整个 60 年代充满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最终在 1966 年开始“文革”的过程中达到顶峰；致使莫斯科和华盛顿都相信，遏制一个表面上鲁莽、甚至有些非理性的毛泽东也许是不可能的。两个超级大国都开始认真制定应急计划，对中国在罗布泊的核设施进行预防性空袭。1963 年，肯尼迪政府官员曾多次尝试——不成功的——请求苏联要么支持美国、要么加入美苏联合军事行动，打击中国的核设施。^①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在中苏边境地区部署核武器，加强军备；到了 1975 年，那里的苏联军队增加了两倍，达到约 50 万人。随着 1968 年 8 月苏联入侵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到 1969 年为保卫社会主义（莫斯科所定义的）而直接实施海外干预的苏联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台，中国在中苏边境地区冲突中多次回击苏联军队。显然，这是为了向莫斯科传递一个讯息：不能像对待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那样来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此时，苏联人开始试探华盛顿对假设苏联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态度。^②（随后发生了尼克松-毛泽东缓和政策，超出本文范围。）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分裂日趋公开化，美国则继续保持甚至加大对中国的压力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1965 年初美国实行越南内战美国化的政策。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为遏制中国的海外革命野心，这一点至关重要；此一政策的基调是肯尼迪政府设定的。1960 年 12 月，在肯尼迪就职前夕，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 81 个世界共产党组织，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声明，除其他事项外，呼吁共产党支持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战争。即将就任的肯尼迪政府，把上述行为认定为中苏军事同盟意在通过正在进行的去殖民化运动，实现在世界各地都诞生像古巴那样的国家，从而在第三世界孤立华盛顿，挑战和削弱美国影响力。肯尼迪决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创建绿

① Chang, op. cit., pp.240-245.

②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p.185-186.

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开展反叛乱行动，这是对莫斯科会议和中苏政策解读的直接副产品；他还决定向南越大量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到 1963 年 11 月其被暗杀为止，约有 1.7 万名）。实际上，《莫斯科宣言》只不过是赫鲁晓夫不顾一切地捍卫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霸主地位的装饰品，使其免受北京方面（以及国内对手）对苏联“修正主义”、背叛列宁主义原则的无情攻击，以及避免让人觉得他是出于对核战争的恐惧，而要讨好美国人，等等，有着诸多考量。^①总之，1960 年 12 月的莫斯科会议，再加上就在肯尼迪就职前两天，赫鲁晓夫发表的强硬讲话，重申共产党支持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战争，实际上都是苏联和中国之间隔阂进一步加深的证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方面做出了相反的理解。在肯尼迪就职演说中，他承诺美国将付出任何代价，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发动冷战。肯尼迪的这番话实际上等于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这张不封顶的支票接着导致了越南内战的美国化，而此时正是中苏同盟瓦解的时刻。

为什么美国人在面对越来越多中苏之间冷战的证据时，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这一切未曾发生过呢？^②这是因为直到 1962 年 1 月，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高层才开始有系统地关注中苏分裂。一年之后的 1963 年 1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陷入了“新危机……出于众多现实因素，这种分裂已经发生了……，苏联和中国现在是两个独立的大国，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利益冲突。”^③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认为，这种裂痕可能会加深：

任何一方都不能将条约义务视为今后算计的重要因素之一；每一方都认识到，在引发核战争危机的可能性中，例如在台湾海峡，任何一方面临重大军事风险时都不能指望其“盟友”，除非这个“盟友”感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和苏联将越来越多地把对方视为敌对

① Michael Beschloss, *The Crisis Years. Kennedy and Khrushchev, 1960-1963*, Edward Burlingame Books, 1991, pp.42-43, 60-61, 63-65.

② 早在 1960 年 1 月，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就致电华盛顿，称中苏之间的摩擦影响深远，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预料到会彻底决裂。Michael Beschloss, op. cit., p.43.

③ Ibid., p.235.

对手和竞争大国。^①

那么，正当中苏分裂表明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多中心主义日益增长的时候，为什么华盛顿决定在中国南部边境(越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战争？这可能为华盛顿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吗？为什么美国在欧洲支持铁托而在亚洲却不支持共产主义呢？铁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实际上，他在国内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者；华盛顿在1948年就开始了这种区分，使得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实际上成为美国的盟友。1956年以后，美国在东欧实行了一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根据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和(或)外交政策与苏联相关政策的分歧程度，来展开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简而言之，为什么美国在欧洲支持共产主义，而在亚洲却反对共产主义？

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最强大的外交政策游说团体是“中国游说团”。以百万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为例，这是一个保守派共和党人在政府内外的联合组织，其中包括有影响力的媒体组织，尤其是亨利·卢斯的《时间·生命》帝国，还有以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1941-1942年，他在中国昆明指挥飞虎队)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为首的退休军事官员游说团。这个“中国游说团”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力支持台湾作为其努力的重点；但在欧洲事务方面，没有类似的团体可以与之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个游说团与反共煽动家、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一道，大肆利用“谁弄丢了中国”这一议题，甚至当时的美国政客们都小心翼翼，避免与其直接对抗。就连艾森豪威尔在对付麦卡锡时也是非常小心谨慎(即使他讨厌麦卡锡)：1952年，他和麦卡锡一起竞选；直到1954年春天，他才与麦卡锡正面交锋。

1954年，该游说团体在麦卡锡的政治灭亡中幸存下来。南希·塔克(Nancy Tucker)重点研究过这个游说机构，分析其在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极端的立场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②到1971年末，

① Michael Beschloss, op. cit., pp.235-236.

② Tucker, op. cit., pp.41-54.

理查德·尼克松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保密进行，为的就是避免游说人士事先知道，引发他们的愤怒。尼克松担心，公众对基辛格-周恩来会谈的知晓，将会引发美国国内右翼过早地动员起来反对其对华政策，结果将导致会谈半途而废。在私人谈话中，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都认为，20世纪50年代早期“谁弄丢了中国”的辩论与他们的越南政策具有相关性：二人都担心，如果在其任期内南越被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越共控制的话，对他们的总统任期将十分不利^①；因此，“我不会失去越南”成为口号。约翰逊在1963年底就任总统后不久曾私下表示：“我不会成为一个看着东南亚步中国后尘的人。”^②因此，亚洲冷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已经制度化。从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审视美国与东亚的关系——甚至要把美国国会1959年通过的所谓的“被奴役国家决议案”（Congress' Captive Nations Resolution）也考虑进去——与美国对共产主义东欧的政策的不同。美国可以尝试建立通向共产主义欧洲的桥梁，但不能同样对待亚洲的共产主义。^③

绝大部分的原因很可能在于：美国主要官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自由派和保守派——对冷战的看法相当趋同。在冷战初期，如果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权衡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必要性时经常表现出灵活性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冷战思维已经变得高度程式化，往往强调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关系的意识形态化。

即使是那些公开反对1965年越南战争最终美国化的政策制定者——如美国国务院的乔治·鲍尔（George Ball）和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也接受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形成的浓厚冷战共识，并承认其强大的影响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参与了约翰逊的政策进程，他们认为（回想起来，他们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通过美国化战争来维持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使是他们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南越的生存对美国的外交至关重要，内中没有人主张美国应该把南越交给

① Fredrik Logevall, “The Indochina Wars and the Cold War, 1945-197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p. cit., vol. II, pp.293-294.

② Chang, op. cit., p.254.

③ 有关国内因素对美国越南政策影响的有力论证可参见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Amb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59-299.

共产党（除了即将上任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他私下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被忽视了）。自始至终，美国的政策辩论都是关于如何遏制越南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就这个事件本身是否值得付出代价进行讨论。^①实际上，怀疑论者向约翰逊提出的所有建议都被驳回；即使约翰逊并不相信局势升级会带来明确和永久的胜利，但也拒绝其他的政策选项。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美国有关越南的整个政策制定过程，是各种“公理”实施的过程。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当美国为在东南亚承担如此沉重负担所付出的代价变得如此之高昂时，也断送了约翰逊的总统任期（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不断升级风险来挽救总统任期）。但这些未经检验的“公理”更加纯粹化（虽然是有争议的）。这些“理念”使美国政府忽视了中苏同盟的结束对美国在东亚地缘政治利益的影响。那么，这些“冷战公理”是什么呢？

1. 冷战是美国及其盟国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多个层面上的全球斗争，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即，一方得利，另一方损失。^②

2. “慕尼黑”类推：任何地方如果不能抵制住敌对阵营的野心，就会导致其在各地实施进攻性尝试。^③

3. 多米诺骨牌效应：任何一个国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特别是在东南亚，都会导致整个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④

4. 公信力：无论在地缘政治上多么边缘化，如果不能保护美国在任何地方的支持者，那么就会破坏包括北约、欧洲和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盟友对美国的信心。^⑤

① Leslie Gelb and Richard Betts, *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pp.353-364.

② Arthur Schlesinger, Jr., “Some Lessons from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1992, Vol. 16, No.1, pp.47-53.

③ Jeffrey Record, “Perils of Reasoning by Historical Analogy: Munich, Vietnam, and American Use of Force Since 1945”, Occasional Paper No.4(Alabama: Air War College, Maxwell Air Force Base), March 1998,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425519.pdf>

④ 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将领在 1964 年 9 月所说的那样，如果越南共产党在南越取得胜利，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国家让步，并将共产主义中国视为该地区正在崛起的力量。Chang, *op. cit.*, p.256.

⑤ 1965 年 3 月，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McNaughton)向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申辩美国军事行动升级的理由中，有 70%与维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盟友中的可信度有关。参见 Robert McNamara, “Th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Vol.3, pp.694-702.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对美国的威胁更大，涉及美国在整个亚洲和后殖民世界的利益。^①

6. 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僵局，以及欧洲和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僵化，像越南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在成为冷战主战场。因此，越南战争具有引领冷战走向的象征意义。^②

7. 古巴导弹危机似乎已经证明，美国知道如何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管控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危机，并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和核力量掌控“升级渠道”（ladder of escalation），避免与共产主义大国发生彻底的核战争；美国官员从朝鲜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他们知道如何限制反共战争，以避免美国人的生命和财富的过度消耗。^③

8. “西方文明”的命运岌岌可危。由于美国自恃是特别道德高尚的西方文明的代表，因此，对那些据称从一开始就不尊重受此类文明限制的对手，采取通常被认为超出道德范畴的手段，绝非不道德。^④

尽管越南战争的合理性很值得质疑——越南地理位置偏僻，经济也无足轻重（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复苏），而且还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纠缠不清的混合物（就如在南斯拉夫内部一样）——但这些“公理”整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冷战世界观，以及美国决策者把南越视为华盛顿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冷战竞争的重大利益关切，等等，诸多因素驱使这场冲突继续下去。正如弗里德里克·罗格瓦尔 (Fredrik Logevall) 所写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意愿和能力的试验场。即使中苏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并严重影响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冷战期间的战略平衡，但是美国方面仍然

① Tucker, op. cit.,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3520.

② Beschloss, op. cit.

③ George C. Herring, *LBJ and Vietn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pp.1-24.

④ 与此同时，尽管有关这一主题基于档案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大堆，但就这些方面而言，我想不出比戴维·哈尔伯斯坦 (David Halberstam) 在 1972 年出版的《最优秀、最聪明》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更好的资料来源。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同事马歇尔·布里蒙特 (Marshall Brent) 2000 年 11 月 9 日在弗吉尼亚大学做的一次演讲。

为了维持“可信度”声誉，把战争继续下去。^①

如果赫鲁晓夫试图在 1962 年秋天的冷战中(通过古巴导弹危机)从一个弱势地位取胜^②，那么可以认为美国试图在 1965 年的越南冷战中从一个强势地位取胜。毕竟，如果华盛顿能够保卫并维持一个离中国如此之近、离美国如此之远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存在，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又有什么希望在任何地方挑战美国的力量呢？罗格瓦尔指出：“如果华盛顿立场坚定，努力确保一个非共产主义的西贡政府的存在，它可能会向莫斯科和北京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间接侵略(原文如此)不会成功。”^③

令人难以置信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到 1964 年中苏同盟已经支离破碎，但两国——出于自身原因——都试图控制河内。1965 年战争的美国化，诱导莫斯科和北京卷入一场激烈的竞争，即看看谁能更好地保卫共产主义的北越对抗美帝国主义。尽管这种援助河内的并行努力并没有改善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④——的确，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但它确实产生了让美国人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效果。这就是将地缘政治考量屈服于意识形态化所导致的代价。在这方面，冷战对美国、苏联和中国三方，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结语

半个多世纪以来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了促进自身的商业和安全利益，美国奉行的外交政策是在对东亚地缘政治算计的基础上，操纵和利用一系列国家(日本、俄罗斯、英国、德国等)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利益冲突。然而，在超过 20 年(1949–1972 年)的时间里，美国在外交上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法律合法性。杜勒斯等美国官员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公开言论，暗示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共产主义威胁背景，以及苏联

① Logevall, *op. cit.*, p.297.

② 正如他 1962 年 1 月 8 日对主席团做了“新月形” (Meniscus) 演讲所预示的那样。Fursenko & Naftali, *op. cit.*, pp.5-6, 410-416, 438-492.

③ Fursenko & Naftali, *op. cit.*, p.297.

④ Luethi, *op. cit.*, pp.313-331.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目标方面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1961年1月，即将上任的肯尼迪总统发表的就职演说，其中大部分的冷战比喻，被编织成一个充满激情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号召，要求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打击对自由的威胁：敌人是共产主义；没有迹象表明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出现多中心主义的趋势，共产主义大国之间（不仅是中国和俄罗斯，还有中国和越南）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是如此，都会让位于意识形态的联盟。肯尼迪政府马上着手采取措施，到1965年将越南内战美国化，主要是为了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蔓延。

在实践中，美国的政策总是比这更复杂。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前，杜鲁门政府就已经开始思考（尽管北京与莫斯科关系密切），经济接触和地缘政治克制的政策，如何能使美国推进其在中国的利益。大量的内部文件显示，杜鲁门政府的主要官员相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发展彼此的外交政策，地缘政治利益最终会压倒意识形态考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同意最后一点，尽管他们不同意前任设想的方法。在这种观点看来，美国对中国施加最大压力，迫使中国进一步依赖苏联，最终将暴露出苏联与北京联系的局限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加上同年11月中国出兵，使得杜鲁门政府显然不可能按照其“楔子”战略采取行动。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尽管同盟内部存在诸多问题）对美国攻击中国确实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威慑作用。但在1953年7月停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实施自己强硬的“楔子”战略。在1954-1955年和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的核威胁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莫斯科不愿意冒着与华盛顿就特定的中国利益（即台湾）而发生核对抗的风险。尤其是华盛顿认为，在这两次海峡危机中，北京追求的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的、而不是联盟的政策。来自美国、中国和苏联的档案证据表明，中苏分裂的根源在于北京和莫斯科双方关系的内部驱动因素，但是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的核压力政策也有一定作用；同时华盛顿为莫斯科提供单独的缓和和机会，强化对北京施加压力，以加速中苏同盟分裂。

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对中苏同盟政策的核心目标已经实现：莫斯科和北京在经济上分道扬镳（苏联顾问于1960年撤出）；外交上

冷淡(1959年和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苏联保持中立;1961年缔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政治上相互指责(1961—1962年中苏相互谴责对方为意识形态异端);地缘政治上竞争(1964年,中国质疑苏联侵占中国领土)。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情报和外交专家已经充分意识到,苏联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是多重的且互不退让。然而,正如1961—1965年间越南内战逐步美国化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分裂并没有与美国政策本身融为一体。为何如此?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这种微妙的地缘政治推论,从未进入公众政治舞台。直接的原因就是,在苏联和中国之间进行区别对待,所造成的美国国内政治成本,非常之高。^①事实证明,发动冷战的公开言论(同时针对苏联和中国),在调动预算和选举资本方面非常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言论使得几届政府几乎无法重新审视冷战中的“公理”原则。这些原则,实际上已经融入到了太多的美国政治机构、政治文化甚至流行文化之中。^②很多的机构和官员都是靠这些“公理”发展起来的;太多的人因为发起挑战而受挫,尤其是国务院中那些经验丰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要么被清洗,要么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辞职。从1949年到1972年,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中国游说团及其盟友的阴影下苦苦挣扎。这些人的口号是:“谁失去了中国?”结果,即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清楚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紧张局势,但美国国内政治的要求,却阻止了他们制定更现实、更合适的政策。美国遏制政策的教父——乔治·凯南,从冷战初期就察觉到了这一趋势。但即使是凯南这样的人,也低估了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一点在美国对中苏分裂的犹豫不决的反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越南战争这个意想不到的重大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局势的效果:“冷战公理”受到挑战。加上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深

① 即使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东欧(1948年之后的南斯拉夫,1956年之后在其他地方)一直诉诸分化政策,国内因素仍然可以胜过地缘政治考量:1963年肯尼迪被迫停止向南斯拉夫军售,原因在于来自中西部克罗地亚族压力团体的压力。Josip Mocnik, *United States-Yugoslav Relations, 1961-80: the Twilight of Tito's Era*....Ph.D. Dissertation, Dept of History,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May 2008, pp.49-60.

② Stephen Whitfield,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刻洞察力和掌控力，从而（秘密）实施了现实主义政策，并最终利用中苏紧张局势为美国利益服务。

（翻译 杨辉）

【Abstract】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1950 was a historic and decisive failure of the U.S. East Asian policy. The U.S. has successively adopted engagement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a policy of maximum pressure and implied nuclear threats and so on, aiming to driving the communist superpowers apart. However, after the Sino-Soviet split,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realize it in time or correctly, which led to the escalation in Vietnam.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of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he USSR and PRC were simply too high. The U.S. domestic incentives make its treatment of communism in Europe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s) and in Asia (firm containment) totally different. The U.S. Cold War thinking had become highly stylized in Asia, often amounting to the ideologization of U.S. rel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world. Although it was obviously full of prejudices, yet no one could challenge it as the costs were too high. The Nixon-Kissinger administration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f defeat in Vietnam. Thanks to their control over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tery of U.S. foreign policies, they were able to conduct a policy of realism towards China. Nevertheless, the root of those Cold War axioms still exists.

【Key Words】 Sino-U.S.-Soviet Relations, Sino-Soviet Alliance, U.S. Diplomacy, Cold War in Asia

【Аннотац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подписанный в 1950 г., стал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и решительным провалом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СШ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роводили политику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Китаем (вбивая «клин» в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Пекином и Москвой), политику экстремаль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и ядер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 это всё было направлено на раскол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Однако после фактического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США не смогли вовремя и правильно это осознать, что обострило войну во Вьетнаме. Логик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делала трактовку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Европе (различ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и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Азии (решительное сдерживание) разн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менталитет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был очень стилизованным в 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 всё более укреплялся как «аксиом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хотя он был явно полон предрассудков, никто не мог его оспаривать, т.к. цена этому была слишком высок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иксона-Киссинджера воспользовалос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оражения во Вьетнамской войне,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их контролем над внутренней ситуацией в США и их превосходным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навыками, они смогли в течение корот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времени осуществить реалистич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Китая; одна корни «аксиом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се ещё существуют.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альянс, дипломатия США, азиатск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责任编辑 崔珩)

“冷战”与“解冻”：双重背景下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调整（1953-1964年）

俞紫梅*

【内容提要】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对外科学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发生了变化。以1958年成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为界，在此之前，受国内“解冻”思潮的影响，苏共中央放松了对学者国际交流的限制，重新开启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交往，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初，在国际“冷战”局势持续发展的影响下，苏共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加强了对科学文化交流的管理，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对抗与交锋的趋势。60年代初，随着苏美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以及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撤销，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关系再次陷入混乱与僵局。

【关键词】苏联文化政策 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 解冻 苏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771.2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6-0091(19)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953至1964年间，苏联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先后有6人获得诺贝尔奖。^①这些成就既得益于“冷战”背景下苏联对于科技的大量投入，也得益于自上而下的“解冻”思潮；而“解冻”不仅体现在苏联国内的文化氛围中，也反映在其对外科学文化政策上。

* 俞紫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① 1956年，Н.Н·谢苗诺夫获诺贝尔化学奖；1958年，Б.Л·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П.А·切连科夫、И.Е·塔姆、И.М·弗兰克获物理学奖；1962年，Л.Д·朗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显而易见，在苏联这样一个被意识形态层层包裹的国家里，国际交流政策的制定、学者们工作出访（甚至私人出访）的审查、国际学者访苏的审批等，都是由苏联权力机构完成的，是苏共文化管理方法和意识形态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核心职能之一。国内外学者以往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赫鲁晓夫时期国内文化政策的研究；二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冷战”背景下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鲜有从整体上探讨苏共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①因此，研究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及其调整，对于评价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苏联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分析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联历史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苏共中央机构及苏联科学院解密档案为依据，回顾 1953 年以前的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重点分析苏联在 1958 年前后科学文化策略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评述。

赫鲁晓夫执政前的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政权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同国外的科学技术及文化交流。然而由于当时政权尚不稳固，欧美发达国家均对苏联采取封锁和围堵政策，无法正常地开展对外科学文化交流活动。图书交流是当时条件下获取国外先进科技信息的唯一渠道。

列宁在 1917 年 11 月《对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该图书馆“应当立即同彼得格勒和外省的所有共同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交换书

^① 国内外的相关论著主要有：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9; Тихонова О.Н.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твор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и вла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Человек в русской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борник VI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енза: РИО ПГСХА, 2015. С. 67-70;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Карл Аймермахер. Партий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ультурой и формы её 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и (1953-1964),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ЦК КПСС 1958-1964.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5-22; 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李华：“赫鲁晓夫与苏联‘解冻文学’思潮”，《南京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第 42-51 页；杨海云：《赫鲁晓夫时期文化“解冻”研究——文学艺术知识分子命运》，博士论文，2010 年。

籍，同时也同国外的（芬兰、瑞典等国）图书馆交换书籍”。^①紧接着，在1918年7月第一届人民教育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问题的全国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图书交换规定》，^②确立了图书交换的基本原则与工作程序。1921年6月14日，在列宁的亲自倡议下成立了外国文献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唯一的跨部门机构，专门负责获取和传播外国文献，主席由苏联著名的数学家施密特（О.Ю. Шмидт）担任。截至1921年底，委员会通过交换，从美英德等国共获得了740箱外国图书。至此，图书交换初具规模。1922年苏联成立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学者的国际交往逐渐被纳入联共高层的考虑之中。从2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的出访和来访必须要获得最高权力机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认可，苏联人民委员会^③具有建议权。委员会的建议获得政治局批准以后，具体的决议交由外交人民委员部^④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称“格别乌”）^⑤落实。前者负责管理涉外交流的具体事项，后者主要负责解决交流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问题。1925年9月，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⑥、佩列文（Painleve）^⑦等一批外国学者，获邀来苏参加庆祝俄罗斯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的相关活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А.И. Рыков）在递交给政治局的报告中写道：“国外（各界人士）对此次活动抱有极大的兴趣，外国媒体一定会对庆典活动进行详细的报道。院士的致辞和发言需经我们同意，所有的庆祝方案需经我们批准……（此次活动）将对我们非常有利。”^⑧由此看来，苏联的对外科学文化交流活动，从最开始就与政治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一特点也适用于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时期。联共在20年代对学者出国的审批，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

② Абрамов К.И. В.И. Ленин о научных библиотеках. М. 1960. С.21.

③ 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④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⑤ 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ОГПУ

⑥ 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1850-1937）：捷克哲学家、政治家，1919-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⑦ 佩列文（1863-1933）：法国数学家、国务活动家，192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

⑧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22-1952. сост. Есаков В.Д. М.: РССПЭН, 2000. С.36.

主要是出于提升国家声誉的考虑，所以仅仅支持了一小部分当时最具威望的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例如苏联著名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Н.И. Вавилов）、苏联生物地质化学的奠基人维尔纳茨基（В.И. Вернадский）、苏联物理学之父约费（А.Ф. Иоффе）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想要获得出国交流的机会是非常困难的。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国际交流中握有举足轻重的权力，20年代是李可夫，30年代初期是莫洛托夫。1934年以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在年初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一些斯大林曾经的政敌，如季诺维也夫（Г.Е. Зиновьев）、加米涅夫（Г.Б. Каменев）、布哈林（Н.И. Бухарин）和李可夫等，纷纷“公开道歉”，向斯大林致以溢美之词。七大上首次宣布，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已经不复存在了，就此确立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他的影响也开始渗透到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934年春天，国际学术交流的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①政治局于5月7日通过了《关于到海外出差》的决议，规定任何人民委员会、中央以及地方机关代表和代表团，未经联共（布）中央出境委员会^②的允许不得出国。该委员会由日丹诺夫（А.А. Жданов）任主席，成员包括梅日劳克（В.И. Межлаук）、叶若夫（Н.И. Ежов）、阿格拉诺夫（Я.С. Агранов）和波斯克里贝舍夫（А.Н. Поскребышев）。随着基洛夫（С.М. Киров）遇害，日丹诺夫被调往列宁格勒，委员会主席就由后来的内务部长叶若夫担任。1937年4月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再次做出决议，规定人民委员个人的出境申请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③准许，再由出境委员会核实，最后交由政治局审批。一再收紧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出国政策的做法，严重影响到了科学文化的对外交流。1935年，当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卡皮查（П.Л. Капица）获悉自己被禁止出国时，他在信中向自己的导师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写道：“我仍然感觉自己处于半囚禁的状态，我不能出国，不能看看这世界，不能参观实验室。这是很大的损失。这无疑最终会导致我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22-1952. сост. Есаков В.Д. С.15.

② Комиссия ЦК ВКП(б) по выездам за границу

③ Нарком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受限。”^①苏联科学院解密档案显示，在 1936 年科学院提交给政治局的 12 份出国申请中，仅有 1 份“赴奥斯陆参加国际数学大会”的申请获得了讨论，但由于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而未能通过。就这样，从 3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科学文化的国际交流逐渐停滞了。

二战期间，出于政治的需要，苏联放松了对科学文化人士的控制，并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②，以犹委会名义派遣苏联著名演员、导演米霍埃尔斯（С.М. Михоэлс）与诗人费费尔（И.С. Фефер）前往美国、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各地争取援助。^③两位艺术家为战时苏联争取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持，并且有效地配合了苏联政府的对外宣传。犹委会的盟国之行是成功的。然而，战争时期，无论是苏联政府还是斯大林本人，都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科学文化的交流上，这种状态直到战争结束才出现了转变的可能。

1945 年 5 月 5 日，斯大林亲自批准邀请 155 位外国学者和 54 名国外机构代表，来苏参加科学院建立 220 周年庆祝仪式。这是战后初期苏联国际影响力急剧提升的情况下，联共高层想要同各国开展科学文化合作的尝试，但不久之后爆发的“冷战”，导致了科学文化交流事业被迫急剧转向。1947 年 6 月 10 日斯大林签发的《关于苏联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选举》的决议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变化。决议的第一条写道：“驳回苏联科学院关于推选美国化学家兰格缪尔、英国化学家罗宾森、布莱凯特、生物化学家科尔林、无线电物理学家爱普顿和墨西哥物理学家瓦拉尔特建议。因为，近年来我们的学者没有一人入选美国或者英国的科学机构，以及相应的科学院。”^④除了学者的国籍之外，联共在决定院士名单时，还重点考察了他们对苏联的态度。

① Ronald Z. Sagdeev, Susan Eisenhower, ed., *The Making of a Soviet Scientist: My Adventures in Nuclear Fusion and Space from Stalin to Star War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4, p.87.

②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③ 1943 年 6 月至 12 月，由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组成的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团，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英国的 46 个城市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访问。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动员西方犹太人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为苏联获取原子弹科研情报。具体研究参见宋永成：“二战期间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团的盟国之行评析”，《世界历史》，2012 年第 1 期，第 15-30 页。

④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22-1952. сост. Есаков В.Д. С.348.

在6月7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提交给日丹诺夫的报告写道：“建议选举波兰杰出的语言学家、波兰科学院主席卡齐米日·尼采来代替列尔-斯普拉维斯基。列尔-斯普拉维斯基在斯拉夫学领域与苏维埃学派的观点存在分歧，例如，他认为斯拉夫民族的源头在波兰。”最后经日丹诺夫与莫洛托夫商议，外籍院士的名单确定为：拉曼（印度）；约里奥·居里、伊伦·居里（法国）；艾尔伯特·圣乔其（匈牙利）；齐德尼克·涅耶德莱（捷克斯洛伐克）；西奥多·巴甫洛夫（保加利亚）；康斯坦丁·巴尔霍（罗马尼亚）；卡齐米日·尼采（波兰）。该决议的内容，清晰地勾勒出了战后苏联科学文化交流的版图：严格限制同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学术交流，同时广泛地开展同中东欧地区，以及亚洲的科学文化合作。这其中，法国被视为例外，这是由于联共高层认为，在科学研究方面，法国遭到了美英的排斥，因此苏联与法国学者的交流获得了额外的支持。上述的策略仅限于一般性的学术交流，在涉密部分，苏联拒绝同任何国家进行合作。在决定是否派遣学者参加1951年国际海洋气象学会议时，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А.Я. Вышинский）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苏联科学院认为不应参会。会议大纲中涉及的大部分问题，都属于苏联科研中的保密内容，我国学者的发言不可能显示出苏联在这方面的高水平。此外，水文气象学者的研究涉及绝密，因此不适宜出国。”^①科学院与维辛斯基的建议获得了莫洛托夫、贝利亚等人的支持，苏联学者最终失去了这次与同行交流的机会。

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斯科贝尔琴（Д.В. Скобельцын）曾说过：“冷战的形式，以及对科技间谍的担忧，导致在某些最为前沿的科学领域，保密措施越来越严格。很多前沿的科学成果都无法公开发表，这不仅影响了国际交往，而且也不利于国内学者间的交流，更不利于培养年轻的专家，实现学术的传承。”^②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仅仅维持着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个别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交流，而这只是出于政治联盟的考虑，至于务实的学术合作，在无限制地保守国家机密的强制措施下几乎被禁止了。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22-1952. сост. Есаков В.Д. С.505.

② РГАНИ. Ф.5. Оп.17. Ед. хр.548. Л.6-7 (письмо Д.В. Скобельцына о вреде засекречива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работ в области ядерной физики).

苏联同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扩大

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А.Н. Несмеянов）在 20 世纪 50 年代接受《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记者采访时曾说道：“学者交流和创作的友谊促进了和平事业。然而，和平并不仅仅是苏联和民主国家学者的目标，它也是地球上所有进步学者的共同关切。我们从来不会拒绝与任何一个追求和平进步的国家共同进行科学合作。确切地说，我们欢迎那些真诚希望同苏联学者建立现实合作、共同促进和平事业的人。”^①涅斯梅亚诺夫的话未必使人全然相信，但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科学文化对外交流事业全面恢复的时期，也是苏联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苏联在航空航天以及核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与此同时，苏联加入了近百个国际性学术组织，其数量是原来的五倍还要多（见表 1）。^②迅速扩大的国际交流规模，需要一套完整的学者出入境管理规范与之配套。1958 年以前，这通常需要由学者所在单位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申请被送至宣传鼓动部^③、中小学大学与科学部^④、国防工业部^⑤等苏共中央职能部门，以及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各部门。经由他们研究、审核、修改后，提交至苏共中央主席团^⑥或苏共中央书记处等待最后的审批。苏联在 1956 年前后，迎来了学者出入境活动的高峰，苏共中央主席团与书记处的审批工作骤然增多。1958 年以后，苏共中央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主管学者出入境工作。意识形态委员会分担了主席团与书记处的部分职能，由此苏联的对外科学文化交流事业呈现出新的图景。

表 1 苏联参与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数量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数量	18	42	61	72	82	89	90	95	100	108

① Несмеянов А.Н. А.Н. Несмеянов-организатор науки. М., Наука, 1996, с. 17.

② РГАНИ. Ф. 5. Оп. 35. Ед. хр. 208.

③ Отдел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

④ Отдел науки, вузов и школ

⑤ Отдел оборо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⑥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苏联同西方国家科学文化交流的缓和始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被视为苏联愿意同西方建立联系的一个讯号。1956 年 3 月 2 日，在苏共二十大结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苏联科学院大会就做出了《关于苏联科学院调整国际科学交往和出差措施》的决议，其中第一条提出：“仔细研究国外科学机构和个别学者在各领域的先进经验，是科学院各机构及个人所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①同年 9 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广泛的人员交换计划，鼓励美国同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开展艺术、教育、体育、法律、医疗以及商务领域的人员交流活动。在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首脑的共同倡议下，苏联在 1956、1957 年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签订了科学文化交流协议，然而同倡议发起的另一方美国却迟迟未能达成一致。尽管如此，自 1956 年起，苏联同美国的科学文化交流仍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并且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众多的西方国家中，苏联同美国的交流最具代表性，也最为重要，它对苏联后来科学文化乃至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6 年 3 月 23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做出了《关于邀请外国物理学家访苏》的决议，同意苏联科学院邀请包括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弗·艾·洛（F.E. Lowe）在内的 5 位国际知名理论物理学者来苏作短期的授课。同年 4 月，维克斯列尔（В.И. Векслер）、马尔科夫（М.А. Марков）与西林（В.П. Силин）三位苏联学者获邀访美，参加在罗彻斯特大学举办的第六届高能物理年会。^②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隔离之后，苏联迫切需要建立同美国的联系，以尽快地获取最前沿的科技信息，这也是苏共中央支持学者互访的主要原因之一。同年 6 月，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布列霍夫斯基（Л.М. Бреховский）等 5 人赴美参加第二届国际声学大会。在中小学、大学、科学部部长基里林（В.А. Кириллин）递交的申请报告中，特别提出此

① РГАНИ. Ф.5. Оп. 35. Ед. хр.22.

② 苏联科学院与中型机械制造部最初商议的赴美学者名单共包括 7 人，分别是梅谢里亚科夫（М.Г. Мещеряков）、维克斯列尔（В.И. Векслер）、马尔科夫（М.А. Марков）、德热列波夫（В.П. Джелепов）、西林（В.П. Силин）、法因别尔克（В.Я. Файнберг）和阿伯里科索夫（А.А. Абрикосов）。但是参会计划遭到了克格勃的干涉，克格勃尤其反对梅谢里亚科夫赴美，原因是他的研究涉及苏联核武器秘密。因此，最后获准出国的只有维克斯列尔、马尔科夫和西林三位学者。

次会议“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苏联学者又收到了美方的“特别邀请”，因此希望苏共中央能够批准参会。^①同年8月，孔德拉季耶夫（В.Н. Кондратьев）等4位学者经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赴美参加了第六届燃烧问题国际研讨会。同样地，基里林在申请报告中写道：“苏联学者以前从未参与过燃烧问题国际研讨会的工作，他们对此次会议抱有很大的兴趣。”^②同年11月，弗拉索夫（Н.А. Власов）与莫斯托维（В.И. Мостовый）两位学者获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赴美参加了中子物理学术会议。在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扎维尼亚金（А.П. Завенягин）、核能研究所所长库尔恰托夫（И.В. Курчатов）与涅斯梅亚诺夫联合提交的申请报告中写道：“由于此次会议的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与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应当派遣我国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物理学家前往参会。”^③1956年苏美学者的频繁交流互访，尤其是苏联学者的多次访美活动，是始料未及的。很多出访申请事先没来得及列入当年的外事活动计划，更有赶在出访前几日才将报告提交至苏共中央的。尽管如此，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家们比30年代的前辈们幸运得多，虽然不是所有人的出访申请都获得了批准，但经过苏共中央讨论的赴美学术活动，几乎都获得了支持。

为了进一步扩大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文化交流，获取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信息，同时向全世界展示苏联科技的硬实力，苏共方面不仅放松了对科研人员国际交流的限制，而且开放了许多科研机构，这其中不乏宇航基地与核设施等涉及苏联重要机密的科研场所。1957年5月10日，在基里林提交给苏共中央的汇报中写道：“……外国学者已经有机会参观苏联边境地区的天文台了（格鲁吉亚阿巴斯图曼天文台）。外国人以后参观这些天文台的限制不存在了。”^④而在另一份1957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的《关于外国学者参观核能研究院与组织苏联同外国物理学家会谈》的决议中指出，允许“参加全苏核物理大会的外国学者（美国、英国、加拿大、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52-1958. сост. Афиани В.Ю., М.: РССПЭН, 2010. С.511.

② Там же. С.544.

③ Там же. С.610.

④ Там же. С.761.

丹麦、瑞典)参观核能研究院”^①，参观的设施具体包括试验反应堆“BBP”、“MP”与回旋加速器MC等。

在“冷战”背景下，东西方的科技竞赛、军备竞赛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激烈的较量之中。此时，不单单是苏联渴望加强同美方的联系，美国也迫切需要建立同苏联科学家的联系，以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手”。1956-1957年负责美国南极开发项目的乔治·杜菲克(George Dufek)将军曾在汇报中写道：“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想法缠绕着我，让我感到不安，那就是俄国人在南极(研究方面)超越了我们。我们之间有通信，并且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计划和进展。但我们对俄罗斯人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恶劣的天气所制造出来的每一点障碍、每一次拖延进展都会让我感到不安。”^②不仅如此，在南极问题上，美国人相信苏联人比他们更有经验。杜菲克将军继续写道：“在有极端气候作业经验的人数和极地作业船只方面，我们都落后于俄国。北方航道是俄国的经济要道，它就像一个训练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俄国人的经验，促进了俄国极地技术的发展。”^③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美国曾多次主动邀请苏联参与南极考察，而有关南极的研究对于当时的苏联和美国来说都属于机密。1956年7月，趁第二届北极大会之机，美国代表提出了美苏气象学家互访南极气象站的建议。苏方也认为这不失为一个机会。涅斯梅亚诺夫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交换气象学家将对苏联学者格外有利。因为在‘小美洲’站中央气象局将汇集所有南半球的气象观测材料，并且将负责向所有国家的南极考察队提供气象信息和天气预报。”^④随后苏共中央批准，苏联气象学家拉斯塔古耶夫(В.И. Расторгуев)可以访问“小美洲”南极站，同时美国气象学家戈登·卡特莱特(Gordon Cartwright)访问苏联的“和平”站。1957年6月，在两位气象学家的互访交流尚未结束之际，苏美两国南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52-1958. сост. Афиани В.Ю. С.859.

② Трешников А.Ф.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нтарктиды.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转引自 09.08.2018. https://collectedpapers.com.ua/ru/history_of_antarctica/stvorenniya-amerikanskix-vnutrishnokonntinentalnix-ta-beregovix-stancij

③ Там же.

④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52-1958. сост. Афиани В.Ю. С.634.

极科考人员进行了一次无线电通话，美方再次提出希望能够派更多的科学家访问“和平”站，并愿意与苏方就冰川研究等问题进行更深入与务实的讨论和合作。美方的建议最终获得了苏共高层的支持。时隔两个月，苏联科学家又一次获美方邀请，参加1958年2月将在华盛顿举办的南极海洋冰川研究大会。美国科学院主席德特莱夫·布朗克（Detlev Bronk）在给涅斯梅亚诺夫的信中，热情地邀请了10位苏联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但最终只有4位获准参会，而美方最期待的苏联北方航道总局局长布尔哈诺夫（В.Ф. Бурханов）在1958年1月已经被限制赴美了。

1956年前后，苏共突然放松了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管理，使得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迅速扩大，这与当时影响苏联社会上下的“解冻”思潮是分不开的。“解冻”不仅影响了苏联国内的文化氛围，也影响着苏共高层对外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它使苏联在经历了长久的隔绝之后，重新建立了同海外的联系，获取了宝贵的科技信息；另一方面，苏共高层也通过“解冻”传递出了一个讯号，那就是苏共的领导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属于赫鲁晓夫的时代；再者，在科技文化交流中，苏联赢得了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向全世界证明了与美国对等的地位。可谓“三全其美”。然而，交流是双方面的，苏联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渗透和挑战。赫鲁晓夫曾在后来这样回忆50年代的苏美交流：“美国人希望开展更广泛的游客、科学家、学生交流……他们的很多建议明显是要让我们打开边界，来增加人员的流动。”^①苏联著名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阿尔巴托夫（Г.И. Арбагов）也曾质疑美国的动机：“美国一个隐含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对我们社会制度的‘侵蚀’……我感到这是美国政策的一条基本路线，并且它扭曲了所有有益的建议……”^②虽然苏美的人员交流协定几经曲折，终于在1958年1月27日正式签订，但此时的苏共高层已经在重新部署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政策了。

① Nikita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409.

② James Voorhees, “A History of the Dartmouth Conferen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9, chapter 3. 转引自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6.

“意识形态委员会”与苏共对科学文化交流的控制

日益频繁的出国审批，以及伴随着同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争端，占用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与书记处大量的精力。因此，亟待设立新的机构，帮助权力的最高层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意识形态委员会应运而生。^①1958年1月3日，经赫鲁晓夫与米高扬提议，成立了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问题、文化、国际党际关系委员会（简称“意识形态委员会”）。^②主席由被称为苏联“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М.А. Суслов）担任，成员包括波斯佩洛夫（П.Н. Поспелов）、穆西季诺夫（Н.А. Мухитдинов）、库西涅（О.В. Куусинен）和福尔采娃（Е.А. Фурцева）。他们五人皆为苏共中央书记，除波斯佩洛夫外，其余四人同时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虽然波斯佩洛夫本人并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但考虑到他在制定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地位便不言自明了。^③委员会人员配置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因此，其又被称为苏共的“智库中心”和“真正的政治审查者”。^④自成立起，其任务之一便是对“苏联专家、文化和科学活动家等各类人物出国旅行考察和外国各类人物和专家来苏访问事宜实施管理，决定是否允许苏联人出国和外国人入境等各类事项，以及审批苏联专家、科学文化人士的出国事宜，国外知名人士、专家的来苏事宜”。^⑤意识形态

①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曾经先后两次成立意识形态委员会。第一次是1958年1月成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问题、文化、国际党际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1961年3月被撤销；第二次是1962年11月成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延续前一机构的职能，但不具有决策权，该机构一直存在到1966年5月。

②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ам иде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артийным связям. 国内有关该机构的研究资料较少，机构名称是笔者从俄文直译的，并在确定之前参照了周尚文先生的译法，他翻译为“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党际联络专门委员会”，详见周尚文：《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权衡之下，笔者确定了现在的译法。

③ 关于波斯佩洛夫在编写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的作用，参见徐元宫：“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若干问题考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1期，第24-39页。

④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21.

⑤ 意识形态委员会的任务还包括：研究国际宣传中出现的问题，关注报刊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并实施对苏联情报局和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政治方针的监督，实施对面向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和更广泛问题的监督，包括对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状况、事态和事件的监督等。

态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苏共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重大转向。虽然国际交流的规模并没有缩小，但实际上，委员会所管理的已经不单是国家间科学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更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与交锋，这种较量集中体现在苏美核武器问题上。

1957年12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与候补成员们的办公桌上收到了一份来自克格勃主席谢洛夫（И.А. Серов）的报告。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苏联学者关于召开国际禁止核武器大会的建议，以及此事在美国公众与政府间引发的截然不同的反响。美国的《I.F.斯通周刊》（*I.F. Stone's Weekly*）、《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①、《纽约先驱者报》（*Herald*）、《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与《国家卫报》（*National Guardian*）等，先后刊登了苏联学者《在此紧急关头……科学家不能袖手旁观》的文章，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主编拉比诺维奇博士发表评论支持苏联学者的建议；《纽约先驱者报》以《苏联的友谊之手》为题转载了整篇文章；美国著名金融家塞勒斯·伊顿（Cyrus S. Eaton）撰文表示，支持苏联学者的建议，希望在加拿大或者印度召开国际反核武器大会，并吸收中国代表参加。然而与美国社会形成的积极反响不同，“美国国会对此建议持否定态度，因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媒体很明显根据政府的要求不再刊登和转载苏联学者的倡议了。”^②谢洛夫认为，美国发生的情况对苏联是有利的，既有利于苏联掌握核军备竞赛态势下话语的主动权，同时又有利于提升苏联的国际形象，因此应当尽全力促成会议的举办。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А.А. Громыко）在分析了谢洛夫的报告之后，于1958年2月4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召集亚太地区学者举办会议的可行性报告》。报告中指出：“美国和英国（在亚太地区）进行紧张的核试验。而亚洲国家既不是核武器生产国，也不是试验国，却成了主要的受害国，因此在这里召开会议可能会受到友好的支持。”^③会议计划邀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苏联、美国和英

① 《原子科学家公报》创刊于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发之后，经由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倡议出版，用以向公众传播有关核战争危害和破坏的知识。

②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52-1958. сост. Афиани В.Ю. С.904.

③ Там же. С.902.

国参加，“而如果美英学者拒绝加入，那么会议仍将举行。”^①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表达对美国在该地区实施核武器试验的不满，并且号召各国学者共同抵制核试验”。^②葛罗米柯特别提出：“苏联科学院可就让日本科学委员会作为会议的召集方一事与对方进行深入探讨。如果日方答应，那么可以提出向日方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如果日方拒绝，科学院应当另谋他境，并尽快开展相关工作。”^③意识形态委员会根据上述两份报告，于1958年2月12日通过了《关于召开亚太地区学者反核武器试验会议的决议》，委托苏联科学院、苏联医学科学院与外交部调研各国学者的态度，并以此为据提交会议方案。国际反核武器会议最终于1958年9月14日召开，尽管苏联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但是会议的地点已经改在维也纳，而不是苏共所设想的亚太地区了。

类似的较量，在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支持下还在逐步展开。1958年3月，国际比较法学委员会主席罗兹马林致电苏联科学院，邀请4位苏联法学家参加将于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学国际联合会会议，会上将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问题。科学院接到邀请后，在向苏共中央汇报时写道：“此次会议的建议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们提出的。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些国家的代表们会攻击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甚至提出破坏法治、个人崇拜和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问题。”^④据此，他们认为：“必须派代表团参会，且代表团应由法学家与司法工作者共同组成，其中法学家应覆盖该学科各个领域。”^⑤最终，经意识形态委员会批准，苏联派出了由8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华沙参会，比最初获邀人数多了一倍。1958年9月，苏共中央收到了基里林关于第11届国际历史学大会（1960年）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会议的召开背景：在1960年正式会议召开之前，将分别于1958、1959年召开两次筹备年会，美国已经争取到了1958年年会的主办权。因此，苏联应当竭力争取在莫斯科举办下一届年会。基里林写道：“在苏联举办历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52-1958. С.902.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С.903.

④ Там же. С.1020.

⑤ Там же.

史学国际委员会年会，可以解决与第 11 届国际历史学大会筹备和计划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邀请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史学家的问题。他们（的参与）将对美国造成不利的环境……”^①意识形态委员会批准了基里林的建议，并在财政上给予了额外支持，14 名获邀参会的外国专家往返苏联的国际旅费，以及他们在苏联期间的一切费用都由苏方承担。

实际上，意识形态委员会所支持的交流活动，并不是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偶然交锋。这是 1958 年以后，苏联以停止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扩散为由，向美英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攻势之一。几乎在同一时间，俄罗斯著名的《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连续刊登了“加强各民族间的和平”、“在新年枫树旁”、“与和平思想在一起”、“善意的新体现”，以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Н.А. Булганин）的“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信息表达了苏联政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缓解国际紧张局势、追求和平的愿望。^②但是通过意识形态委员会的决议与相关部门的报告分析，在当时，“和平”与其说是苏共高层的美好愿景，不如说是他们手中的一张“外交牌”，是在国际冷战背景下，苏联因意识形态饱受西方诟病过后，制定一系列反击措施的依据。而意识形态委员会恰逢此时成立，主导了这一系列交锋。

意识形态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加强苏联文化、包括文化交流的管理。因此，委员会不仅策划了苏联同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文化交锋，同时为更多学者争取到了海外交流的机会。经过苏共中央中小学、大学、科学部、苏联高等教育部、苏联科学院和高校的申请后，意识形态委员会于 1958 年 4 月 11 日和 22 日分别通过了《关于苏联学者代表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及《苏联学者以游客身份参加海外学术会议》的决议，为当年苏联高等院校和科学院系统增加了 464 人次的海外交流机会。^③基里林在 4 月 18 日的申请中写道：“按照惯例，很多国家会派遣 50-200 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52-1958. сост. Афиани В.Ю. С.1075.

② “加强各民族间的和平”、“在新年枫树旁”、“与和平思想在一起”、“善意的新体现”发表在 1958 年《消息报》第 1 期；“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表于 1958 年 1 月 10 日。

③ 具体的名额分配是苏联高校 264 人次，苏联科学院 200 人次。

会议。与此同时，1958年科学院没有足够的经费派出与苏联的国际学术地位相符的代表团人数……因此，除了小规模的非正式代表团之外，应当允许学者以游客身份参加大型的海外学术会议。”^①基里林进一步提出了详细的解决办法：“苏联国际旅行社（ВАО «Интурист»）总经理安库季诺夫（В.М. Анкундинов）已经答应本年度向苏联科学院提供200-250个旅游签证，并相应增加外国游客的入境数量，这样就不再需要国家的额外拨款了。”但是，“旅游签证的费用需要学者自己承担”。^②在综合考虑了基里林与苏联科学院的申请之后，意识形态委员会做出决议：“同意苏联科学院的建议……保留学者以游客身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正常的工资和休假权利……游客学者的数量规定在200人次以内。”^③1958年，在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支持下，苏联科学院成功参加的会议有：第12届国际鸟类大会（6月5-15日，赫尔辛基）、第15届国际动物大会（7月16-23日，伦敦）、国际高分子化合物会议（7月21-24日，诺丁汉）、第7届国际微生物大会（8月4-9日，斯德哥尔摩）、第10届国际遗传学会议（8月20-27日，蒙特利尔）等，共九次国际学术会议。

然而，在此之后，苏共明显放慢了科学文化交流的脚步。在“冷战”持续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学术交流的目的逐渐让位于意识形态斗争。随着1961年3月意识形态委员会被撤销，苏联科学文化对外交流工作再次陷入了混乱与僵局。

思考与结语

赫鲁晓夫时期被称为“解冻”时代，也同时开启了苏联同西方关系的破冰之旅，这其中自然包括科学文化交流。在此期间，苏联有数以万计的科研工作者前往世界各地学习交流，同时许多优秀的外国学者也获邀前来苏联访学授课。他们为苏联收获了最前沿的科技知识，客观上促进了苏联的科技进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в решениях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1922-1991. 1952-1958. сост. Афиани В.Ю. С.937.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С.936.

步，也让“铁幕”另一侧的人民由此认识和了解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的政策无疑是成功的。但回顾这段历史，苏共当年对科学文化交流的管理仍然暗含着潜在的危机，许多做法值得反思。

第一，苏共对科技文化交流的管理始终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哪怕像苏联科学院这样庞大的、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外事部门，所有的出访来访事务都需要经过苏共中央的审批。学术交流的意义被大打折扣，出国有时沦为了官僚间平衡利益的砝码。能够出国的学者通常在国内也身居要职，他们往往年事已高，而真正从事一线科研的人员，却很难在他们富有创造力的年纪有机会去国外学习交流。曾长期供职于苏联科学院的科尔涅耶夫（С.Г. Корнеев）在谈到此问题时曾平静地说：“他们太年轻了，不足以在国外代表他们的国家。”^①此外，学术交流始终处于苏联克格勃的严密监督之下，很多优秀的学者，即便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支持，但由于克格勃的阻挠也长期无法获得出访的机会。类似的做法打击了学者的热情，长此以往并不利于学术交流的发展。

第二，意识形态委员会在管理苏联科学文化交流工作时缺乏创新意识，一味地将自身陷于一个又一个的具体事务之中，几乎从来没有对科学文化交流工作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更别说从总体上对未来的交流工作进行规划了。委员会是苏共中央意志的体现，经由它的部署，苏联确实在1958年以后展开了同西方国家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然而从解密档案看，此时的委员会更像是苏共中央手中的一枚橡皮图章。关于学者出入境的决议通常仅有寥寥数字，且大多属于对各部门建议的附和之言，至于建设性的意见，更是极其罕见了。

第三，科学文化的交流是外交的一部分，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因此赫鲁晓夫对外科学文化政策深受国内“解冻”与国际“冷战”的双重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同西方国家科学文化交流的短暂繁荣，是赫鲁晓夫对内实施文化政策调整与对外实行“三和路线”的积极成果。然而即便是在这一阶段，苏共对学者出入境的管理仍然是非常严格的，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

^①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7.

态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50 年代后期，苏共加强了对外科技文化交流的管理，意识形态斗争随之愈演愈烈。到 60 年代初期，伴随着苏美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以及 U-2 飞机、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曾经繁荣一时的苏联对外科技文化交流重新归于沉寂，而它的再次繁荣需要等到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了。

【Abstract】 Foreig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olicies under Stalin changed during Khrushchev's reig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 Central Committee on Ideolog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Party Relations in 1958, influenced by domestic “thaw” trends, the CPSU loosened restrictions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scholars and restarted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S.,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early 1958, under continuous influences of the “Cold War”, the CPSU establishe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Ideolog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Party Relations, strengthening its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 Soviet Union started to confront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early 1960s, with the end of the Soviet-U.S. “honeymoon” an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Committe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western countries once again fell into chaos and deadlock.

【Key Words】 Soviet Cultural Policy, Soviet Foreig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olicy, Thaw, Soviet-U.S.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претерпела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Хрущёва. До создани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ЦК КПСС в 1958 году, в связи с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ой «оттепели», ЦК КПСС ослабил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обменам учёными, возобновил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с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во главе с США и добился прорыв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в начале 1958 г. в условиях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КПСС учредил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ую комиссию, усилила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учными 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обмe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проявилась тенденция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начале 1960-х годов, с окончанием «медового месяца»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развалом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научны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вновь оказались в хаосе и тупик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оттепель,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政治思潮研究

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 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

郭丽双**

【内容提要】俄罗斯文明定位的不确定性，是千百年来困扰其身份认同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难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再次面临这一难题并重新抉择。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在俄罗斯多元化思潮的激荡中脱颖而出，其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在文明论和地缘政治学层面上，较合理地回答了俄罗斯文明定位不确定性的难题；并在深厚哲学建构的基础上，提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构想。以重塑俄罗斯文化共同体的方式重塑俄罗斯文明，对俄罗斯本国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建构性力量，但它一旦超越国界就容易引起国家间或区域间的冲突。

【关键词】新欧亚主义 俄罗斯文明定位 俄罗斯文化共同体 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D851.2;D837.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6-0110(33)

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新在哪里？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在其中的贡献是，它以多元文明论反抗西方的普世价值论，以欧亚文明论重塑俄罗斯的国家定位；于哲学和地缘政治学之基整合建构出“第四政治理论”、“新俄罗斯”、“第三类世界秩序”等政治理论，反抗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旧秩序；以重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反启蒙与新文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当代启示”（项目批准号：18AZX017）的阶段性成果。笔者由衷地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专业性极强的修改意见，这对本文的进一步完善非常重要。

** 郭丽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化共同体来重塑俄罗斯的欧亚文明定位、国家发展定位，试图重塑世界的文明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根据俄罗斯政界在国家认同和国家文明定位方面的表态，我们可以确定，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在学理层面和政治实践层面使俄罗斯摆脱了几百年来“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东西方文明循环争论的困局，它完成了从自身欧亚文明独特性出发，为反抗西方价值体系、探寻本国独特发展道路、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而进行文明论奠基的时代使命。

当前，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提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构想，成为俄罗斯学界和政界的热点。它与当下俄罗斯面临的重新选择紧密相关，它为在东西摇摆中的俄罗斯文明定位找到了自己的根基，从学理层面较合理地解决了俄罗斯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尴尬。俄罗斯文明定位的不确定性，是千百年来困扰俄罗斯身份认同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难题。“双头鹰”民族在东方与西方的两极张力间摇摆，是东西方两种精神在俄罗斯灵魂中的斗争，它使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间断性和跳跃性。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А. Бердяев）曾在《俄罗斯的命运》中揭示了俄罗斯文明的这种复杂矛盾性：俄罗斯的自我身份认同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碰撞中生成，其理想型的文明定位是代表全人类，其拯救全世界的弥赛亚使命也源于此。^①俄罗斯的历史事件多次践行了这一使命：彼得大帝西化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向欧洲扩张、苏联向其他国家输出社会主义模式等。这种代表全人类的文明定位，使俄罗斯在理论和现实中都遭到惨痛的重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独立初期经历了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我们是谁”“向何处去”的“俄国斯芬克斯之谜”再现。^②急剧的社会转型呼唤新的精神价值基础，俄罗斯的社会思想陷入错综复杂的多元化思潮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解决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传统争论？俄罗斯的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何在？正是在回应这些关键性问题中，欧亚主义骤然复兴。在继承古典欧亚主义提出的俄罗斯欧亚文明论之基础上，新欧亚主义完成了哲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Шевчук, 2000. С.4-5.

② 郭丽双、汪力平：“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文明论建构及其当代意义”，《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学、地缘政治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的整合性建构，由纯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进而走向政治实践，开启了该学派的新阶段。^①它以俄罗斯文明的欧亚性之独特价值和多极文明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反抗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旧秩序；以重建文化共同体来重塑俄罗斯的欧亚文明定位、国家发展定位，进而试图重塑世界的文明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

一、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

20世纪末以来，在国家体制变换和改革失败后，俄罗斯社会各界开始了理性反思。“俄罗斯向何处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的主张引发了强烈关注，古典欧亚主义被唤醒，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成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普京自第三次出任总统以来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等，都与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它不仅成为俄罗斯经济战略、外交政策、政治联盟的理论依据，而且是俄罗斯文明定位、国家身份认同的哲学基础。

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首先是从学术界以欧亚文明论立场批判西方文明普世论开始的，它由欧亚主义思潮逐渐发展成熟为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当代欧亚主义哲学家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ёв）、帕纳林（А.С. Панарин）、俄侨哲学家留克斯（Л. Люкс）尖锐地批判了西化派的主张。^②他们指出，自由主义西化派的观点是乌托邦，因为俄罗斯有自己的文明特点，永远不会变成欧洲国家。^③自由主义西化派脱离俄罗斯现实，造成俄罗斯严重的对立和

① 新欧亚主义相较于古典欧亚主义的“创新”之处，请参考本文的姊妹篇“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文明论建构及其当代意义”，此处不再赘述。

② Люкс Л.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 сб. статей. пер. с нем. М., 1993. <http://lib.co.ua/philosophy/lyxl/rossijamegduzapadomivostokom.jsp>

③ 张建华：“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学习与探索》，2006年3月15日。

矛盾。从 1991 年起，俄罗斯哲学领域著名的杂志《哲学问题》，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古典欧亚主义的学术论文。^①

古典欧亚主义的复兴、新欧亚主义的再造、“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的成立、新欧亚主义思潮的传播与发展，都与俄罗斯当代的一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直接相联。此人就是原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任“国际欧亚主义运动”领导人杜金(А.Г. Дугин)。杜金从 1991 年起担任莫斯科《要素》杂志主编，他对新欧亚主义思潮的理论建构与传播，对“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的成立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97 年，杜金出版了《地缘政治学基础》一书，标志着新欧亚主义再造的完成，同时开创了地缘政治学在学术领域的先河，使其成为当今俄罗斯的显学。目前，地缘政治学已成为俄罗斯政治学的教学课程，该书也是俄罗斯政治学的教材。众多的出版与研讨活动，使“欧亚主义”一词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在俄罗斯掀起了新欧亚主义思潮。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成立了古米廖夫基金会，俄罗斯科学院设立了“欧亚研究中心”；在莫斯科成立了“欧亚主义”出版社，《欧亚主义》杂志也得以创刊。^②在此影响之下，俄罗斯民众开始认识到欧亚主义的当代意义，将其视为拯救俄罗斯于危难的民族精神。著名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Н. Михалков)满怀激情地对欧亚主义充满期盼：“俄罗斯永远是欧亚国家，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道路的话，我想这就是自己的发展道路——欧亚主义的道路”。^③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逐步从确立走向发展成熟，其代表性文献包括：《地缘政治学基础》(2000)、《全球化的诱惑》(2003)、《铁幕的真相》(2007)、《第四政治理论》(2009)、《21 世纪俄罗斯：今天的日程》(2013)、《相对于俄罗斯的新俄罗斯：新起点还是毁灭?》(2015)、

① 肖金波：“俄罗斯欧亚主义发展史的启示与反思”，《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张建华：“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

③ Мы--Евразия. Беседа с Никитой Михалковым ведет поэт Эдмунд Иодков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1992. No.70. https://lj.rossia.org/users/bruno_westev/2049.html

《俄罗斯：重新面临道路的选择》（2015）和《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2017）等。^①

在俄罗斯新旧历史转换和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作为古典欧亚主义在当代的重生，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新欧亚主义思潮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3年。这一时期探讨的主题是俄罗斯文明类型的归属问题，其主张体现在与其他学派代表的论战中。这场争论主要是在当时俄罗斯社会三位著名的思想家——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ёв）、利哈乔夫（Д.С. Лихачёв）和索尔仁尼琴（А.И. Солженицын）之间展开。古米廖夫主张，俄罗斯属于欧亚文明，其文明特征与游牧民族紧密关联。而利哈乔夫认为，从文化起源来看，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具有同源性，所以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东方，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化的重要部分，“回归欧洲”从来就是俄罗斯各个时代的强音。利哈乔夫驳斥古米廖夫的观点道：如果俄罗斯文化被确定为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那么，按照这种主张势必推论出俄罗斯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而实际上俄罗斯文化对欧洲文化做出过独特的贡献，它不应该被视为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②对于以上争论，索尔仁尼琴发表演说指出，不应该把俄罗斯简单地划归到欧洲或者亚洲国家，因为从高加索到中亚的穆斯林共同组成了俄罗斯国家的人民，俄罗斯的各民族与东斯拉夫民族一起构成一个整体。^③俄罗斯只有回归传统才能不被西方所同化，才能有自己的未来。这一阶段的争论虽然没有达到一方说服另一方的结果，但是在俄罗斯文

① Панарин А.С. Искушение глобализмом. 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03; Панарин А.С. Правда железного занавес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07; 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0; <https://www.e-reading.club/book.php?book=20827>;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б.: Амфора, 2009; <http://konservatizm.org/konservatizm/theory/140309014819.xhtml>; Дугин А.Г. Новороссия---крах или взл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5. №.9. <http://dlib.eastview.com/browse/doc/45325859>; Ковалев Ю.А. XXI век. Россия. Расписание на сегодня. М.: РИОР, 2013. https://iphras.ru/uplfile/root/image/institut/admin/Kovalev_2013.pdf;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 №.6. С.201-209; Ковалев Ю.А. Нов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вопросы идеологии. 2017; https://iphras.ru/uplfile/root/image/institut/admin/Kovalev_doklad_19_04_2017.pdf

② 胡键：“普京之治论析”，《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③ Асанбеков М.К.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деи. <http://easttime.ru/analitics/tsentralnaya-aziya/sovremennyyi-etap-razvitiya-evraziiskoi-idei/7184>

明归属的问题上，不再只是拘泥于几百年来俄罗斯属于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的争论。俄罗斯属于独特的欧亚文明这一观点，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广泛关注，古典欧亚主义创立的欧亚文明论，在隔离于故土之外几十年后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①

新欧亚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 1994 年到 1999 年。这一时期探讨的主题是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1993 年叶利钦总统炮击俄罗斯联邦最高委员会的“十月事件”，引起了学术界对 1991 年俄罗斯历史道路选择正确性的质疑。很多新欧亚主义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俄罗斯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努力使新欧亚主义独特的学术思想，转变为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特殊方式的有力阐释。这一时期形成了新欧亚主义一个创造性的思想——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学说，它提出了在地缘政治博弈进程中的一系列政治学知识。自此，新欧亚主义理论家分化成“文明论”和“地缘政治论”两个不同的研究路向。前者以人类文明的形成、分类、发展与前景为着眼点，揭示了俄罗斯文明形成的过程、文明内涵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将其界定为欧亚文明；后者则从地理学、民族学和政治学融合的视角出发，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研究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政治行为，揭示了俄罗斯跨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现实，认为决定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必定是复归俄罗斯历史中鼎盛时期的欧亚帝国模式。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新欧亚主义逐渐将两个不同的研究路向相结合：在地缘政治基础上，重塑俄罗斯文明。

新欧亚主义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从 2000 年开始直到现在。新欧亚主义思潮按照政治立场的不同，分化为左派、右派和中派。先后出现了“欧亚党”、“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等以新欧亚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政治实践方面，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成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组织的思想基础。^②新世纪以来，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新欧亚主义都成为关注度最热的焦点。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俄

① 古典欧亚主义者大多是十月革命后“哲学船事件”中，被苏维埃俄国列入反动文人行列而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由于苏联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古典欧亚主义学说被隔离于苏联民众视野几十年，只有古米廖夫在本土默默无闻地进行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

② Антон К.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Путина 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приложения». 30.12.2015. <http://eurasian-movement.ru/archives/1126>

罗斯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方面，该思潮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立场。

新欧亚主义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俄罗斯自然历史学院教授伊格纳托夫（И. Игнатов），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巴什基尔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瓦希托夫（Р.Р. Вахитов），俄罗斯科学院科学与政策分析中心教授卡拉-穆尔扎（С. Кара-Мурза）和俄罗斯国立电影大学教授捷列金（С.М. Телегин）等人。他们的著述和活动大多刊登在《东方》和《红色欧亚》文集中，同时发表在“俄罗斯局势”和“奥伊泽杜林”的网站上。新欧亚主义左派的基本主张是：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制、多党制和议会制，认为资本主义是病态的、邪恶的社会秩序，贪婪、消费本能、人们之间的仇恨支配着它；主张所有非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抗处于“全球资本主义”顶端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主张宗教和共产主义相结合，该派的代表们大多数信教，认为各种“宗教”组织都是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宗教世界观及其二者在社会中的角色相容相通。^①

新欧亚主义右派的代表人物，有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帕纳林（А.С. Панарин）、《我们的同时代》杂志主编科日诺夫（В.В. Кожин）和乌克兰国家地理协会会长帕先科（В.М. Пашенко）等人。现任“国际欧亚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杜金（А.Г. Дугин），他原本是新欧亚主义右派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其“第四政治理论”曾经是新欧亚主义右派立场的典型代表作。但在乌克兰危机前后，杜金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更倾向于激进的左派，主张诉诸武力解决乌克兰危机，并主张以此作为重建“俄罗斯世界”的开端。相比之下，帕纳林、科日诺夫等，则始终是持欧亚文明论坚定右派立场的代表。该派的主要观点是：主张欧亚文明论，认为俄罗斯的欧亚大陆地理空间这一自然条件，是欧亚各民族相互融合、创造欧亚文明的客观先决条件；欧亚文明是人类文明中独特的一种，是东西方交汇的结果，它不隶属于东方文明或者西方文明；主张文明多极论，认为人类任何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的文明都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不应该以人类进步论和文明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考察

^① Вахитов Р. Кто такие евразийцы?//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Левых Евразийцев. Уфа, июль 2003. http://redeurasia.narod.ru/krasnaya_evrazia/index.html

人类各个文明的发展，而是应该以尊重每一种文明类型的思维方式，考察当时当地某一特殊文明样态；主张俄罗斯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政权，认为恢复强大的国家权力，是防止俄罗斯这个国家灭亡的唯一途径，因为俄罗斯的历史证明，任何削弱国家权力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该国解体；俄罗斯历史的自然延续是俄罗斯人民命运的发展延续，1812年俄法战争、1917年十月革命、1945年战胜德国法西斯等，都证明了俄罗斯历史的核心是强有力的国家；^①主张爱国主义是俄罗斯人民意识结构中最高的精神价值原则，它不应被理解为对俄罗斯前社会主义(君主制时期俄罗斯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热爱，而应被理解为对俄罗斯国家的绝对忠诚。^②

新欧亚主义中派(温和派)代表人物，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教授科瓦列夫(Ю.А. Ковалев)。他批判杜金以“全球使命”、“俄罗斯世界”等错误观念将新欧亚主义由保守引向激进，挑起俄、乌冲突。他指出，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确实存在客观的矛盾，当前世界明显分化为三个强大的趋势：美国“强迫引用民主”的活动在增强；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活动有所增加；杜金“俄罗斯世界”的思想将变成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中心轴”。科瓦列夫认为，悲剧在于三个趋势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因此相互间都不能被说服，无法达成共识。杜金主张通过战争解决这一矛盾是错误的，因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价值观上的冲突，武力无法解决价值认同问题。科瓦列夫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方法，是建构三方都认同的新价值秩序，能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古米廖夫的大欧亚主义与索洛维约夫的世界意识，二者结合构成的第三类世界秩序，将是矛盾三方达到价值共识的基础。^③

由上可知，新欧亚主义左、中、右三派的不同在于：左派试图将新欧亚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从宗教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是在此岸世界中最好的实践方案；中派主张将斯拉夫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相结合，认为这是解读俄罗

① Кожин В.В.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0. <https://ru.b-ok.org/book/3292663/a153b8>

② Кожин В.В. О рус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Избр. ст. о наиболее акту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2002. http://www.hrono.ru/biograf/bio_k/kozhinov_vv.php

③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 №.6. С.201-209.

斯文明密码的唯一途径；右派则主张将保守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相结合，认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是俄罗斯保存国家不毁灭的必要前提。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试图重塑俄罗斯文明，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对俄罗斯的侵蚀，主张只有新欧亚主义才能重振俄罗斯的英雄威。以上左、中、右三派划分的依据，是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和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立场，这是俄罗斯和中亚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这显然带有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划分依据的色彩。目前俄罗斯思想界对于该思潮的研究和派别划分，还没有达成理性的共识，是否能够达成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划分的依据，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研究的要点。另外，左派将宗教和社会主义相结合，这是看似矛盾的结合，但是在俄罗斯这个富有浓厚东正教传统价值观的国家，有许多学者从宗教的天国在现世的实现，来解读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无神论的代名词，俄共也在积极与东正教会展开各种合作。

二、新欧亚主义的反抗与重塑

反抗与重塑，是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从理论贯穿到实践的主题。它在深厚的哲学建构基础上，提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想。新世纪以来，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成为俄罗斯学界和政界的热点，它不仅是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和俄罗斯融入欧洲受阻的应激性反应，而且较好地回答了俄罗斯迫切需要明确的文明定位和国家发展模式等问题。

“在人们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之前，仅仅知道当下所处的世界存在很多问题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知道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的。”^① 反抗与重塑这一主题，在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不同时期、不同代表人物思想中，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但总体上都是以欧亚文明论为基本立场：俄罗斯的文明定位是欧亚文明，是不隶属于东方文明、也不隶属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文明样式。它在古典欧亚主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用现代地缘政治学、人

^① 罗骞、刘礼：“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类学等新方法,批判和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重塑俄罗斯欧亚文明的独特性。其基本观点是:在文明观上,主张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俄罗斯欧亚文明的独特性,以文明多元论反抗西方普世论;强调本土主义的价值,俄罗斯文明是世界多文明体系的一极,其独立的文化价值在于欧亚性的精神文化。在政治观上,主张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通过加强国家作用的方式,将民主、法制与强大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对内实现团结和维护社会秩序,对外则巩固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和扩展地缘政治空间,实现其帝国梦想。在价值观上,主张“新欧亚的民族主义”,高举反抗美国价值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理论旗帜,或基于文明多元论或基于第三类的世界秩序,构造地缘政治基础上的超民族认同,构造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欧亚价值体系。^①在宗教观上,主张回到原初而古老的宗教信仰,各种不同的古老宗教(正统的东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都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中人“在”的这一本真状态内在相连;在人的原初内在生命中形成相容共通的价值观,让人们从内在精神出发去信仰各种古老宗教;在纯粹的精神信仰中找回人的原初本质,找回现代哲学对人形而上存在的遗忘,找回人类存在的哲学本体论和神学根基。

当前,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重塑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主要体现在帕纳林、杜金和科瓦列夫等哲学家的理论建构中。

(一) 帕纳林的俄罗斯文明欧亚独特性

作为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文明论的杰出代表,帕纳林曾尖锐地指出,俄罗斯的欧亚性与西方在文明类型和地缘政治上的对峙将导致全球危机。在《神秘的铁幕》(2006年)一书中,他预言道,“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俄罗斯将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将来要把标志着俄罗斯独特文明的两大元素“陆地和海洋”合而为一。^②

1. 俄罗斯文明的欧亚独特性是民族、宗教、政治、文化融合的产物

①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

② Панарин А.С. Тайна железного занавеса. М., 2006. С.243.

帕纳林在文明共性的基础上考察了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强调俄罗斯文明可以作为世界文明中的一个样态而存在。“在东西方民族政治和历史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欧亚人民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宗教包容性”^①，它们造就了俄罗斯文明的欧亚独特性。帕纳林批判了全盘效仿西方的西化派观点——俄罗斯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注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帕纳林的观点是，“在构建俄罗斯社会时，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抽象的一般原理，而应是俄罗斯的具体特点，民族的幸福与繁荣”。^②因此，俄罗斯的发展，只有依靠自己几个世纪以来与游牧民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独特欧亚传统和价值观，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2. 通过传统的内在精神信仰重塑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文明基础

帕纳林明确地提出了俄罗斯传统的欧亚主义使命——作为先锋带领弱者反对强者。东正教的救世主义和整个俄罗斯历史，都在践行这一使命。帕纳林认为，社会动荡的根源是精神危机，摆脱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促使人们从内在精神出发去信仰正统的东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③同时他进一步发展了古米廖夫“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的思想，主张俄罗斯以新欧亚主义的政治定位和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应对西方世界的挑战，以回归彼得一世之前俄罗斯的原型，找回已失去的东斯拉夫和图兰成分的统一，重塑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文明基础。^④

（二）杜金的“新俄罗斯”构想与“第四政治理论”

杜金^⑤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代表，被

① Лушников О.В.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де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6. http://lib.udsu.ru/a_ref/09_11_001.pdf

② [俄] 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③ Панарин А.С. Тайна железного занавеса. М., 2006. С.243.

④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⑤ 杜金是最著名，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西方世界批评他是俄罗斯对外扩张政策的理论来源，而在俄罗斯国内对他的学术成果和政治实践也存在争议。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思想自身发展也存在变化，本文概括介绍了他的这三个理论，其中存在不同的理论倾向。“第四政治理论”是杜金向保守主义靠拢的一种理论尝试，而欧洲大陆主义方案、“新俄罗斯”思想则明显带有激进的左派倾向。所以笔者认为，

外媒称作“普京大脑”，并被列为与伊斯兰恐怖组织领导人齐名的人物。^①原因就在于，他的欧洲大陆主义方案、“新俄罗斯”构想、“第四政治理论”等哲学思想，在重塑俄罗斯文明、反抗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欧洲大陆主义方案

杜金把古米廖夫的欧亚大陆发展空间的理论范围和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欧洲，他认为，欧洲对于欧亚主义“大空间”具有地缘政治的完整性和战略重要性，其中乌克兰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乌克兰和俄罗斯联盟，是重建俄罗斯欧亚帝国的主要保证”^②。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杜金在乌克兰危机中极力主张东乌克兰必须加入俄罗斯，称乌克兰从历史、地缘政治、文化认同等方面，都与俄罗斯的命运休戚相关；如果俄罗斯失去了东乌克兰，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根基和历史血脉。因此，他被欧美媒体称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的鼓吹者。同时，杜金依据独特地理和历史决定独特民族、独特文明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理论，将俄罗斯欧亚文明体发展为俄罗斯-伊斯兰大陆联盟。主张联合伊斯兰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一起反抗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③

2. “第四政治理论”

“第四政治理论”是杜金基于传统价值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从哲学到政治、从理论到实践的政治哲学新构想；是一种从哲学到政治的反抗，是新欧亚主义的一个新理论基点。该理论主张以古希腊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和宗教神学探寻为思想资源，力图为人类找回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以此重塑人类神圣的精神价值，反抗现代工具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过度物化对人的奴役。首先，在哲学上以“此在”反抗现代性对人的奴役，找回被人们遗忘了的“在”的意义，实现价值翻转，反抗现代性的旧价值；然后，在政治学上

杜金在新欧亚主义内部派别的分化中不能作为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其近几年的思想更能代表新欧亚主义左派的理论倾向。

① 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文化纵横》，2015年第5期。

② Дугин А.Г. Новороссия---крах или взл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5. №.9. С. 244-248. <http://dlib.eastview.com/browse/doc/45325859>

③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建构新的理论范式、新的意识形态，有力地在政治实践中反抗国际旧秩序。它不仅为多元文明达成价值共识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人反抗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旧秩序、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政治旧秩序，开启了回归传统论的方向。

杜金认为，现代性导致人类精神维度的扁平化和信仰的迷失，使人类陷于错误意识形态的统治中。传统及其代表的价值在现代性来临之际被推翻，于是“上帝死了”、“世界祛魅”、“神圣终结”，现代性的精神在于用人取代了神、用哲学和科学取代了宗教，用理性和科技的建构力量取代了启示和信仰的位置。现代性精神孕育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杜金汲取了法国哲学家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反对自由主义》一书中的思想，构建自己的政治学说。伯努瓦批判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种意识形态，呼吁人类应该寻找第四种意识形态。杜金结合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和2008年以后俄罗斯保守主义声望不断提高的现实，针对20世纪三大主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出“第四政治理论”。该理论理顺了其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夯实了其构建保守主义的新欧亚主义基础，补充了最初的“保守主义革命”和“第三道路”理论。他最开始提出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本身是多个异质文明的组合体，是多极文明论的应用，这就需要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价值认同的思想作为支撑。但他并未能给出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的主导观念，因为俄国东正教的精神传统无法涵盖“帝国联盟”多元文明体系，不能给出统摄不同文明体、不同宗教观的价值认同，这一点成了杜金地缘政治思想逻辑上的缺口。^①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为完成以上多元文明达成价值共识的艰巨任务，从哲学的源头和未来两个向度上探寻思想资源。

第一个方向，是求索于现代社会之前的古老神学文化、传统价值观、非理性主义的崇拜仪式和传说。向传统以及前现代汲取思想灵感，以此反抗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过度物化的价值趋向，“神学正在回归，并成为

① 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

‘第四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杜金认为，现代性终结了传统和宗教、等级和家庭这些对人至关重要的传统价值，所以对现代性的反抗就必须回归传统及其所代表的神圣价值，这意味着宗教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第四政治理论”乃是要找回现代哲学对人的形而上存在的遗忘，找回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而一旦人在形而上层面找回自己，就必然意味着一个全新等级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家庭、民族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空间，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一种帝国秩序的回归。^②杜金认为，只有将宗教和神学等非理性的精神作为“第四政治理论”的新基点，在人内在生命没有任何限制的深度和信仰的高度上，才能自然地形成相同的价值观，“第四政治理论”也不再是强制性的。“以前神学阶段的那些非理性的宗教仪式和传奇的时刻，向人们显现的所有古老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对于已经被现代观所扭曲的人类来说，更有精神价值和内在说服力，就因为它是古老的价值；古老意味着是良好，而且越古老就越好。”^③

另一个方向，是求索于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存在主义哲学。杜金赞赏现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理论主张——被异化的人（被抛的存在者）通过追问“在者”之“在”，找回自己丢失了的生命意义。他选取了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作为“第四政治理论”的主体。杜金认为，“此在”作为兼容性概念，将是“第四政治理论”包容与整合多种异质文明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来自不同文明体的“此在”，从传统宗教观和哲学观中根据不同的文化语境，从哲学层面找回人存在的原初意义，达到不同文明体在原子上的价值共识。杜金明确指出了这种新意识形态的三条主要原则：社会正义、国家主权和传统价值。他也认识到，即使能唤醒各个文明体的传统价值，要统合这些异质文明的世界观也并非易事；但在共同反抗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它们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联合，达到基本的价值共识。

综上所述，“第四政治理论”是以新欧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作为代替20世纪三大主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

①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2009. <http://konservatism.org/konservativizm/theory/140309014819.xhtml>

② 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

③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第四意识形态；它以“此在”为主体，在不同文明体中追寻各自丢失的传统价值，最大限度地团结不同文明的价值，共同反抗自由主义。用杜金自己的话表述就是，“请人们反思21世纪的今天和人类的存在方式。希望全体人类共同努力，用自己唤醒传统价值的行动，在21世纪共同构建新的生命形式、新的意识形态：‘第四政治理论’。”^①该理论是欧亚主义观念的延续，同时也是其向“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靠拢的转向。^②但它在俄罗斯国内与主流的保守主义——“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纲领之间，既有相类似的原则，也存在重大差别，本质上并不相同。^③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主张以俄罗斯传统价值作为俄罗斯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区别在于，前者主张在俄罗斯欧亚文明论的基础上重塑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从哲学到经济、政治全方位地积极反抗西方的价值定位，改变国际旧秩序；后者作为俄罗斯初期自由主义激进改革失败的应激性反应，主张在其自身现代化过程中完成传统的再造，反对激进主义的变革和斗争，主张以传统斯拉夫主义为内核，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实现稳定和改良的发展道路，维护现存制度。

3. “新俄罗斯”思想

世界比较文明论先驱丹尼列夫斯基^④，在批判文明进化论基础上提出的多元文明论和俄罗斯文明独特论，深深地影响了新欧亚主义：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如果能够在历史中完成自身的精神发展，便形成一种文明类型；^⑤全世界的十种文明类型各有自己的文明特点和价值，是世界历史舞台上不可或缺或文明的类型形式；^⑥它们之间具有异质性，不能被孰优孰劣的进化论方式取代；^⑦俄罗斯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也不同于亚洲文明，它是一个独特

①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② 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

③ 荆宗杰：“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第四政治理论’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

④ 丹尼列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世界文明史的先驱，是“后期斯拉夫主义者”和“乡土派”的代表。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是其比较文明论的代表作，比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早50年。

⑤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Ю.А. Белова/ Отв. ред. О. Платонов.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С.5.

⑥ Там же. С.6.

⑦ Там же. С.7.

的文明类型。“俄罗斯人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创立完整的斯拉夫文明，要么完全失去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文化类型，而成为另一个文明的民族性材料。”^①必须保护俄罗斯文明的特性，不被欧洲文明同化。据此，杜金从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和多元文明论出发，并综合古米廖夫追求的“新的俄罗斯思想”和欧亚大陆空间理论，发展出多元文明世界的新理念和重构“新俄罗斯”的思想，以此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每一种独立的文明类型都享有政治独立的权力，全世界存在多种不同的文明类型，那么政治就必定是多极政治格局，这样才是真正合理的世界秩序。^②

杜金主张按新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定位，和俄罗斯欧亚性的文明定位，在俄罗斯文明的范围内重建“新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基础上重塑俄罗斯文明，以跨区域的俄罗斯文化范围界定，重建“新俄罗斯”的空间范围。^③在杜金看来，对俄罗斯地缘空间中的性质界定和欧亚性的文明定位，是重建新俄罗斯的前提；只有宣示俄罗斯的历史、文明和主权，真正意义上的新俄罗斯才有可能。他认为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是俄罗斯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是俄罗斯政府面对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挑战的被动回应；如果失去乌克兰，俄罗斯的大欧亚空间将无的放矢，因此必须明确新俄罗斯的概念。

什么是新俄罗斯^④？杜金分别从地缘政治、文明类型和国际现实利益斗争三个方面作了具体界定。

从地缘政治方面看，乌克兰和俄罗斯联盟，这是重建俄罗斯作为欧亚帝国的主要保证，也是当代俄罗斯人的历史责任，也是俄罗斯的敌人——美国、北约和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威胁。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和其后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乌克兰不愿与俄罗斯结成联盟，这将使俄罗斯丧失恢复“欧亚大空间”的可能性，由此出现了克里米亚和新俄罗斯的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原来的世界超级强国衰落为第三世界国家，由原来传统地缘政治空间的中心变为苏联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从苏联主导社会主义世界的经历看，还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8.

②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③ 同上。

④ “新俄罗斯”是杜金在俄、乌冲突前后用来指称那些发动抗议、试图脱乌入俄的地区和城市，如从顿涅茨克到哈尔科夫、敖德萨地区，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

是从俄罗斯弥赛亚宗教政治传统看，俄罗斯都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重建新俄罗斯的思想，强烈地表达了俄罗斯力图重返强国、重返中心主导地位的追求：“我们是谁？世界强国？一个区域？或次区域？克里米亚事件表明了俄罗斯对世界区域地位的不满。”^①重建新俄罗斯可以使俄罗斯重返失去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

杜金认为，从文明类型方面看，新俄罗斯意味着——觉醒，重塑一个新俄罗斯的世界。新俄罗斯（从敖德萨到哈尔科夫的地区）是俄罗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部分使俄罗斯变得更加完整。界定新俄罗斯的文明标准不是种族，而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新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民族起源、宗教、自我意识等方面的俄罗斯认同——都是伟大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她（敖德萨到哈尔科夫等地的俄罗斯认同）俄罗斯将不可想象。“2000万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在思想文化上都是俄罗斯人。很显然，远不只是种族方面的大人（旧称）的存在代表着俄罗斯本身，而且俄罗斯文明范围内的所有人都代表着俄罗斯。”^②这里，可以看到杜金重塑“新俄罗斯”的主张，有通过共同文化扩大俄罗斯文明认同的倾向。文化认同超越国家认同，容易引起国家间或地区的矛盾冲突。苏联时期说俄语的许多加盟共和国，现在都是独立的国家，尤其是近几年纷纷开始改变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文字，向“去俄化”发展。对俄罗斯来讲，这是保护“保守价值观”和“保护同胞权利”的愿望，但是对于其他独立自主的国家来讲，则意味着挑战国家身份认同的威胁。

在杜金的理念中，从国际现实利益斗争方面看，“新俄罗斯”是俄罗斯与欧美主导的国际旧秩序的斗争，俄、乌冲突事件成为谁来控制莫斯科的试验：是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俄罗斯政府，还是受大西洋势力影响的“第六纵队”（用来讽刺俄罗斯内部的亲西方势力）。这场较量的结果势均力敌，两种势力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政权，明斯克协议则是“第六纵队”的胜利。俄罗斯不会放弃，因为俄罗斯文明已经觉醒，“如果我们坚持立场，那么现行的世界秩序将崩溃，它将最终完成自己的历

① Дугин А.Г. Новороссия---крах или взл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5. №.9. С. 244-248. <http://dlib.eastview.com/browse/doc/45325859>

② Там же.

史使命而退场；这将是一场精神觉醒——冲断和结束‘文明查理’对世界的统治，并把欧亚保守主义革命扩展到欧洲和美国。”^①

综上所述，重建“新俄罗斯”，是新欧亚主义者怀着俄罗斯传统主义所固有的弥赛亚救世情怀，在多元文明世界的新理念基础上重塑俄罗斯文明，反抗国际旧秩序的维护者——欧美联盟，建立国际价值和政治新秩序的政治哲学构想。俄、乌冲突是这一构想的政治实践。其中潜藏的俄罗斯文明扩张论，是其致命的弱点。

以上杜金对俄罗斯文明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构想，没有停留于政治哲学的象牙塔中，而是通过政党组织和非政党组织向社会各阶层渗透，逐渐实现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力图成为俄罗斯政治哲学的主流。2003年，杜金把“欧亚党”改组为以古米廖夫命名的非政党社会组织“国际欧亚主义运动”，政治上支持普京，从反对党转变为支持派。这标志着新欧亚主义由纯学术理论走向政治实践。^②俄、乌冲突爆发后，鉴于各方压力和需要，杜金于2014年6月辞去莫斯科大学教授的职务，专门进行新欧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动员工作。“国际欧亚主义运动”向俄罗斯政治高层渗透新欧亚主义的主张，对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定位、政治、经济、外交等都发挥了直接影响。但在俄、乌冲突后，俄罗斯陷入被动局面，俄罗斯社会各界开始批判反思：杜金重建新俄罗斯世界的主张，是否会走向帝国主义的极端？

（三）科瓦列夫的“第三类世界秩序”论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教授科瓦列夫，是当前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温和派的代表^③，在批判杜金的激进主张中，逐渐明确了新欧亚主义的新观点。^④

1977年科瓦列夫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后，一直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长期从事俄罗斯文明论的研究。他在批判文明进化论的基础上，

① Дугин А.Г. Новороссия---крах или взл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② 张艳杰、于大春：“转型期俄罗斯民族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理论之契合”，《学术交流》，2011年第12期。

③ 笔者之所以将科瓦列夫作为新欧亚主义温和派的代表，是基于近年来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立足于中派立场的基调，同时也写信求教了我国著名的俄罗斯哲学专家安启念教授。

④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确证了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主张通过将俄罗斯传统哲学与地缘政治学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全方位地解决两种文明的矛盾，使俄罗斯摆脱千百年来的文明论困境。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以下的著述中：《21世纪俄罗斯：今天的日程》（2013）、《俄罗斯：回到未来》（2014）、《为了俄罗斯的战斗》（2014）、《乌克兰危机是形成第三类世界秩序的根据》（2014）、《欧洲是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俄罗斯VS. 欧洲呢？》（2014）、《俄罗斯：重新面临道路的选择》（2015）、《俄罗斯：寻找未来的方式》（2016）和《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2016）等。

1. 批判现代“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

科瓦列夫在批判当前俄罗斯“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争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古米廖夫“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的观点。他指出，在当前的俄罗斯只有通过新欧亚主义超越东西方争论，才能为俄罗斯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当前俄罗斯再次遭遇寻找国家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针锋相对的“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立场，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客观存在的固有矛盾；这两派分别以“俄罗斯的敌人”和“俄罗斯爱国者”两种方式解释了矛盾的一个向度，无法解决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现代的‘西化派’主张，‘俄罗斯是欧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俄罗斯是欧洲文明；‘斯拉夫派’则反击说，‘不，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成长’。现在很明显，这绝不只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分歧’，这种分裂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的前景。”^①俄罗斯只有选择新欧亚主义的立场才是正确的，才能超越俄罗斯素有的东西方文明的争论，找到俄罗斯正确的文明密码和国家发展方向。

现代“斯拉夫派”的基本观点是，俄罗斯不需要创造什么新的东西，只应该依赖于俄罗斯原有的核心价值观——东正教，一切问题都会在“超人因素”的影响之下被自动解决。所以，东正教应该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科瓦列夫认为，现代“斯拉夫派”的主张不符合俄罗斯当前的现实，包含着

^①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 №.6. С.201-209.

矛盾。首先，俄罗斯是个多宗教国家。在俄罗斯的永久居民里面有超过1800万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也很多。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地区，“俄罗斯”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很久前，这种紧张关系就被西方国家称为从高加索到中亚的“软肋”，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客观地说明，某些国家已经把俄罗斯视为穆斯林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利用这一点消解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同。如果把东正教当成国家意识形态，那么将会导致剩下的几千万人口成为“二等公民”的不良后果。其次，社会是否真的具有“东正教复兴”的基础，还是不能确证的问题。今天，俄罗斯人中的60%-80%“认为”他们是东正教徒，但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的虔诚信徒为数不多。据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分析，对于很大一部分自称东正教徒的俄罗斯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化自我认同而已，而入教只是表面现象。列瓦达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复活节前夕，俄罗斯72%的人口“保持正常的饮食”，而“完全尊重禁食”的只有3%。对于信徒数量“夸大数字”的做法毫无意义。最后，当前俄罗斯东正教仍然不能实现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有效对话，没有解决“信仰与理性”的矛盾，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比对方更有价值。^①这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有关天上面包和地上面包的矛盾。在没有解决好这一矛盾的前提下，如果按照斯拉夫派所主张的，俄罗斯完全“依靠东正教”，使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俄罗斯很快就会被人们从理智的现实世界中开除出去。因此，“斯拉夫派”以东正教复兴为根据战胜“西方派”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东正教是虔诚信徒生活中的道德和精神“动力源泉”，但它不可能成为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动力源泉”，东正教不能被视为俄罗斯复兴道路上的“万能工具包”。

俄罗斯现代“西化派”的立场是，俄罗斯是欧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要再谈“俄罗斯的特殊道路”，而应该在俄罗斯发展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思想。科瓦列夫指出，这样的主张听起来令人振奋，但是当我们清楚了解这些价值观在欧洲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后，就会发现它同样不符合俄罗斯当前道路的选择。从文明类型和历史上看，俄罗斯不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从社会现实

^① Ковалев Ю.А. XXI век. Россия. Расписание на сегодня. М.: РИОР, 2013. https://iphras.ru/uplfile/root/image/institut/admin/Kovalev_2013.pdf

看，西方的这些民主自由价值观本身，在西方世界已经矛盾丛生。欧洲人比较成功地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从“超人因素”控制效应中走出后，“市场民主”体制和整个国家运行系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价值和市场的僵局。俄罗斯“西化派”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错误地把已经耗尽创造潜力的发展方式推荐给俄罗斯，这绝对不是俄罗斯所期望的路径选择。

2. “第三类世界秩序”

科瓦列夫在批判以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激进派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类世界秩序理论。他认为俄罗斯选择新欧亚主义是正确的，但不是以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激进派主张，而应该是古米廖夫的大欧亚主义与索洛维约夫的世界意识，二者的结合，将构成俄罗斯特有的第三类世界秩序。杜金错译了俄罗斯文明密码，其激进主张挑起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科瓦列夫对新欧亚主义激进派的批判，引起俄罗斯政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由此于2016年在圣彼得堡召开了国际研讨会，探讨俄罗斯在困境中如何做出新的抉择。

科瓦列夫使用“综合”（синтез）理论，对西化派观点进行了批判分析。该理论是在19世纪后期由俄罗斯哲学家索洛维约夫（В.С. Соловьёв）提出的。索洛维约夫是现代意义上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神学的奠基人，他在理性思维的统摄下对俄罗斯哲学进行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改造，使俄罗斯哲学摆脱了文学抒情式和神学神秘式的表达。科瓦列夫着重分析了索洛维约夫思想并综合中世纪和近代对待神的两种错误观点，进而提出寻找现实生活的精神基础、建构精神世界完整性的主张。索洛维约夫的观点是，中世纪人们热衷于基督教，把上帝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有损于人的物质世界和人自身的价值；但是启蒙运动以后，又把人的位置摆得过高，甚至超过上帝，这也是不科学的；所以索洛维约夫提出神人类的概念，将二者综合，这是人和神乃至万物的大一统^①，是为人类现实的生活寻找到的完整的精神基础。科瓦列夫借用了索洛维约夫的这种批判反思，汲取批判对象中的积极因素，再进行综合。“综

^① 这个“综合”并非东西方的综合，并非亚洲和欧洲的综合，而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综合观念。科瓦列夫在此处是借鉴了索洛维约夫这种综合的思维方式。

合”理论是指各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因素，参与到类似于植物光合作用的综合活动中，而各因素的运行性质决定了世界秩序的类型。^①科瓦列夫运用该理论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种世界秩序。

科瓦列夫认为，第一种世界秩序的类型是2000年前开始在西欧出现的，在基督教基础上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形成，它通过基督教强制性的教义信条管控个人信仰来实现。第一类世界秩序的“核心”是，只有上帝才有真正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取决于他，地上的人的生活，其实只不过是给最后审判准备的素材。显然极权制度没有给人类自主性留有独立空间，这成为它自身发展的阻碍。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另类替代的复合体。启蒙运动的理念为：是否对上帝有信仰只取决于个人选择，因为上帝在实际生活中不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人必须一直靠自己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②

人类精神自主性的“独立”，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但因为不再虔诚地信仰教义的信条，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彻底变化了的情况下控制人们？如何形成新的有效机制？16世纪在欧洲开始出现市场民主国家，它们是根据理想模式在“制衡”制度的基础上而建成的，市场使人们非常有效地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带来高品质的商品和丰盈的服务。这样就出现了第二种类型的世界秩序：相互独立的立法权、政权和司法权，确保如工业团体、政党等政治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理想中）；确保民间社会独立于政府的权利，确保非国有媒体在完整社会系统中的特殊作用；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承认个人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具有绝对优先性的基础上，同时也确保了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庭上挑战行政机关和立法系统的权利，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个人都没有优于其他人的特权和优势；“市场的无形之手”（理想中）在平等生产者的公平竞争基础上有效地规范生产。^③在实践中，这的确产生了相当积极的成果。例如，“制衡”系统为民间社会创造了有效地控制政治权力的条件。但目前西方的这些机制产生了一系列自由、平等的悖论，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同时，与道德、自然和国家利益产生矛盾，导致资本、市场对人的剥削与奴役。

①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在对前两种世界秩序的利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上对以杜金为代表的
新欧亚主义激进派的批判，科瓦列夫提出了“第三类世界秩序”。他认为，
现代“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主张，都不适合当下俄罗斯对发展道路的
重新选择。那么是否有适合俄罗斯目前道路选择的方案呢？科瓦列夫给出了
肯定的答案，这种方案是存在的，就在索洛维约夫的“第三类世界秩序”与
古米廖夫的欧亚大陆方案的结合中。

索洛维约夫曾确信“第三类世界秩序”一定会出现，它会作为已经存在
的前两个世界秩序的综合。该综合的要素是：中世纪欧洲以物质世界为代价
而依赖于“天上”的世界（这里泛指各类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启蒙运动文
化以“天上”的世界为代价而激发人和物质世界的独立性。“第三种类的世界
秩序”是以上两类世界秩序的新的组合。索洛维约夫认为，俄罗斯文明是
开创“第三类世界秩序”最为适当的“工具”，它会在一个新水平上继续基
督已开创的工作。^①

科瓦列夫进一步指出，俄罗斯文明的密码应该是古米廖夫的大欧亚主义
与索洛维约夫的世界意识，二者的结合将构成俄罗斯特有的第三类世界秩
序。俄罗斯文明使命在索洛维约夫这一新秩序的机制中，包含着两个关键点：
首先，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10世纪）；其次，大俄罗斯的出现（13世纪末），
即俄罗斯超民族本身的出现。任何超民族（文明）都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人
类社会。俄罗斯的“文明代码”是独一无二的，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原则——
“天上的”总是优先于“大地的”，那么俄罗斯文明代码，就是索洛维约夫
“聚合性”统摄之下的古米廖夫大欧亚；二者不是外在的绑定，而是以俄
罗斯文明使命为内在精神的一体。

3. “大欧洲”理念

“第三类世界秩序”确立后，那么俄罗斯文明代码与大欧亚的追求，如
何在实践中实现综合呢？科瓦列夫的回答是：通过“大欧洲”的理念。他
将古米廖夫的大欧亚空间转换为“大欧洲”的理念，这不是俄罗斯文明范围
的继续扩大，而是“第三类世界秩序”的实践。

^① 此处转引自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科瓦列夫指出，当前世界明显分化为三个强大的趋势：美国在加强“推行民主”的活动；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反西方的活动在增加，穆斯林要求重返“祖先生活和信仰的方式”；重建“俄罗斯世界”的激进思想将变成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中心轴”。目前情况的悲剧在于，三个强大趋势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相互间都不能被说服，无法达成共识。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挑起一方为实现“自身价值”的新世界大战，造成人为的世界灾难。因此，我们的时代使命就是，呼吁人们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解决真理与意见（可能对，也可能错的观点）的纷争。

从价值观的分析看，美国民主扩张活动的增加，是基于“启蒙的文化”：只有个人选择确定相信或不相信上帝，在实际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自己；伊斯兰极端活动的增长，是基于“只有真主才有真正的价值，人的一切都依赖于他”的原则；欧亚主义激进派将俄罗斯文化扩展为“俄罗斯世界”，试图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心，它是基于一个全人类的使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以替代“西方价值观”。科瓦列夫基于“综合的逻辑”（其中心是俄罗斯的全人类使命），主张三方理论家应该通过对话来“调和”这三种互不认同的价值观。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大欧洲”方案。这是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欧洲）的想法。这个想法的实现，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域和文化共同体的创建。这样，属于不同族群的人，将会形成共同的超民族认同（如超欧洲人），以此消除领土冲突和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冲突。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在苏联时期，作为超民族共同体的“苏联人民”这个概念。对克里米亚的居民来说，“苏联人民”是他们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统一，因此半岛是否属于俄联邦已不重要。建立“大欧洲”的理念，不是机械地把“欧洲价值观”延长到太平洋，或把“俄罗斯文明”（东正教）扩展到大西洋。^①为消除俄罗斯和西欧彼此间在价值观方面的对立，只能通过把“大欧洲”作为综合区——第三类的世界秩序来实践，在政治外交中实施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项目。科瓦列夫认为，当前俄罗斯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在价值观综合的基础上，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概念奠基。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俄罗斯公民看

^①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到自己的精神价值，让任何生活在俄罗斯领土上的人，感觉到俄罗斯是“自己生存的保障”。

可见，科瓦列夫的“大欧洲”理念，是第三类的世界秩序在现实层面的实践方案，不仅仅是指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理概念，而且是文明重塑后的跨区域、跨国界的俄罗斯文化共同体。

苏联的命运表明，没有“意识形态框架”，文化共同体就不可能存在。但在当下的俄罗斯，要建立这种“框架”将面临的巨大障碍，就是原苏联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现代意识状态。苏联模式“意识形态框架”的毁灭，导致了原苏联共和国面临文明分裂的困境。在文化共同体的重塑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大众意识分裂为两个方向：“欧洲价值”的支持者，和保持俄罗斯传统价值的人。^①

丹尼列夫斯基是世界文明多极论的奠基者（但多年来被人们所遗忘），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将俄罗斯文明定位为独特的欧亚文明，它不从属于西方，也不从属于东方。杜金的“新俄罗斯”理念和科瓦列夫的“大欧洲”理念，是对这种多极文明论的两种发展。“大欧洲”理念主张的是跨区域、跨国界重塑俄罗斯文化共同体，意味着一个新地域和新文化社区的创建，形成超民族的认同。科瓦列夫指出，“形成真正的多极世界需要多个系统区域作为必要条件，俄罗斯建立欧亚中心区（МЦЕ）将面临严重的阻碍，领土冲突已经让俄罗斯痛苦不堪：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河沿岸、格鲁吉亚、千岛群岛。因为当前‘冲突’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真理性’，普遍都诉诸‘双重标准’和‘对历史的抽样性表述’，如果停留于此，历史将进入无解的死胡同。”^②这些问题涉及欧洲、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冲突，或者简化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这需要在超越异质文明之上找到一个基点，来解决共同面临的困境。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基点，是人类成功解决文明冲突的必要前提。如果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基于自己的价值观，返回自己文明的原初价值，重塑内在价值的道德生长点，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文明间的对话，将是

① Ковалев Ю.А. Нов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вопросы деологии. 2017. https://iphras.ru/uplfile/root/image/institut/admin/Kovalev_doklad_19_04_2017.pdf

② Там же.

解决文明冲突和领土争端的起点。即只有通过跨文明的对话才能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而跨文明的对话只有在超文明（宗教原初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三.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影响与评价

新世纪以来，欧亚主义从哲学理论变为政治思潮，并通过政治实践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俄罗斯政治高层和社会民众，欧亚经济联盟、俄乌冲突、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等举措，是新欧亚主义重塑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从哲学扩展到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实践。这在普京执政理念变化、近年来瓦尔代会议^①的主题内涵、国内外学者对其评价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新欧亚主义是否有成为俄罗斯主流政治哲学的倾向？这是极具争议性的论题。笔者从对当代俄罗斯五大社会思潮的研究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新保守主义思潮与新欧亚主义思潮的融合，将是俄罗斯社会思潮未来的主流方向。^②

从俄罗斯总统普京 20 年来的执政理念看，他对俄罗斯文明定位、国家身份认同、经济外交策略等问题，也曾在东西之间摇摆过，但是最后选择了欧亚主义的国家定位。从第一个任期里的国家定位——俄国是个欧洲国家；过渡到第二个任期——俄罗斯历来就是欧亚的桥梁，俄国是欧亚国家；到第三个任期的说法——欧亚文明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帝国的结束和苏联解体而停止存在。^③在 2013 年的“瓦尔代”俱乐部国际会议上，普京表示：“欧亚一体化，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有机会成为全球发展的一个独立中

① 瓦尔代会议（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是俄罗斯自 2004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的最高层次的国际政治学术会议，创立初衷是为普京“正名”。其宗旨是“形成一个国际专家平台，使外国学者有机会从俄罗斯精英代表那里得到有关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最权威、最可信的信息”，希望以此有效改变西方媒体和精英对普京出身安全机构、进而就认定其行事私密而专横的负面印象。普京每年参会并直接与各国专家学者互动交流，因此，“瓦尔代”常被外界贴上“普京的智库”标签，瓦尔代会议被认为是观察俄罗斯思想动向的特别窗口。

② 郭丽双：《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78-280 页。

③ Ковалева А.О.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Путь К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м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http://eurasiaforum.ru/content/295>

心，而不是欧洲或亚洲的边缘。”^①这被俄罗斯学者视为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学说，在普京执政理念中的突出体现。

从“欧亚”概念看，“欧亚”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哲学和地缘政治概念。一般意义上的“欧亚”概念界线不明晰，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指大欧亚——欧洲和亚洲；二是指“后苏联空间”；三是指“欧亚思想的基础”。在2015年之前，学者们对普京欧亚战略的解读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是排除西欧和东南亚、以欧亚中心区域为基础的原苏联空间。但从近几年欧亚经济联盟的推进看，普京的欧亚战略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②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创始人卡拉加诺夫(С. Караганов)2016年的发言佐证了这一点。他指出，普京总统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希望借此加强各方合作，“大欧亚地区涵盖区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伊朗、以色列和埃及。”^③正如我国年轻学者封帅副研究员所指出的：“欧亚空间，作为俄罗斯权力的区域映射，欧亚空间塑造了俄罗斯，也被俄罗斯所塑造。”^④笔者尝试延伸此“欧亚空间”的含义，它绝不仅仅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概念，它被赋予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的含义后，就变成了为政治权力斗争和重塑区域秩序，提供合法性话语基础的哲学概念、政治概念。

从近年来瓦尔代会议主题的延续和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国家政治诉求与本文“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的关联度。2013年瓦尔代会议的主题是“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2014年的主题是“世界秩序：新规则还是无规则？”；2015年的主题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跨越冲突的逻辑”；2016年的主题是：“未来始于今日：塑造明天的世界”；2017年的主题是“创造性破坏：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将

① Антон К.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Путина 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http://eurasian-movement.ru/archives/1126>

②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③ 胡晓光：“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中国’成热词”，《参考消息》，2016年10月28日。

④ 封帅：“世界历史中的欧亚空间：源起、建构与衰朽”，《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5期。

从现有冲突中产生？”；2018年的主题是“俄罗斯：二十一世纪的方案”；2019年的主题是“东方的黎明和全球政治秩序”。这些主题表明，俄罗斯近些年所关切的是，重塑国家身份认同和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而这个新认同和新秩序，都需要新的哲学价值基础。笔者认为，新欧亚主义正是能够从文明论和地缘政治学方面，为此提供理论支撑的哲学基础。对于2019年瓦尔代会议的主题，我国俄罗斯问题专家赵华胜教授发出疑问：“瓦尔代年会都是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或俄罗斯发展为主要议题，这次为何突然转向了东方”？^①追问后得出结论是，俄罗斯的国家定位是欧亚国家，是欧亚主义的定位。

新欧亚主义是不是欧亚经济联盟、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理论基础？这又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攻击自己对手一定要切中要害，也许从批评新欧亚主义的众多声音中，更能看清这一密切联系。俄罗斯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科诺别里（А. Кнобель）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前景和障碍”一文中，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的尼基京（А.И. Никитин）教授在“欧亚安全架构变化趋势”^②一文中，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系伊诺泽姆采夫（В.Л. Иноземцев）教授在“欧亚经济联盟：在空间中的损失”^③一文中，不约而同地批判了新欧亚主义者是后苏联一体化的激进支持者，是欧亚经济联盟理论和实践的推动者，是造成俄、乌冲突的思想推手。

新欧亚主义将引领俄罗斯向何处去？是战争？还是和平？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后，人们更加注重批判、反思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负面作用。它是否只是维护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尊严的应激性反应？是否有走向自身反面、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对此，俄罗斯和国外政界、学界有不同的评价。

从总体上看，俄罗斯、欧美、中亚政界和学界，对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度较高，主要聚焦于新欧亚主义意识形态、俄乌冲突和欧亚经济联盟等问题。相比之下，我国的关注和研究则略显薄弱，主要聚焦于丝绸之路经

① 赵华胜：“俄罗斯还需要秩序吗——瓦尔代会议侧记”，澎湃新闻网，2019年10月18日，<https://pit.ifeng.com/c/7qrpMuQDwBs>

② Никитин А.И. Тенденц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Евразии. 2015年“中国与欧亚：新机遇与新挑战”国际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③ Иноземцев.В.Л.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потерянные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4. №.6. С.71-82.

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等问题。

在俄罗斯政界层面，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采纳，集中体现在它对普京执政理念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在国家身份认同方面，自总统的第二任期开始，普京的思想有明显转变，以前他多次表示“俄国是个欧洲国家，我们信奉的是基督教。”^①而在他第二次担任总统后不久便发表了题为《俄国：新东方前景》一文，很明确地指出，俄国是欧亚国家，俄国是连接亚洲、欧洲和美洲之一体化的独特交接点。普京的第三任期以来，将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应用于经济和外交领域。2012年普京重登俄罗斯总统宝座的“王者归来”，被杜金称为“欧亚主义象征”。^②在2013年9月的“瓦尔代”俱乐部国际会议上，普京进一步明确了欧亚经济联盟的定位。

与政界不同的是，俄罗斯学界对新欧亚主义的评价较低。除新欧亚主义学派本身的自我肯定外，只有部分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主张将其与自己的学说相结合，探索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新道路。大部分学者对古典欧亚主义评价很高，但对新欧亚主义却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如，当代俄罗斯传统哲学代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霍鲁日(С.С. Хоружий)教授就尖锐地指出，新欧亚主义在当前俄罗斯政界影响很大，但是它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很多政界人士根本不理解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实质，只是为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增加一个噱头而已；该派的代表人物杜金正确地指出了当今人类复杂的文化都来自古代统一的文化传统，但是他无法给出这一传统是什么，因为在他的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中没有严肃、严格的学理论证。^③再如看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斯米尔诺夫(А.В. Смирнов)，在接受笔者提问时表达的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欧亚主义和十月革命都是超越俄罗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实践上的超越？回答：可以说欧亚主义和十月革命都是超越俄罗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

① 高懿洁：“中国专家看瓦尔代会议：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3年9月25日，http://sputniknews.cn/russia_china_relations/2013092543873083/

② 栗瑞雪：“列夫·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学说及其对当代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6期。

③ 霍鲁日：“展开人学的原则与概念：人的建构的三个类型”，2019年6月6日于北京师范大学讲座。

争论，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实践上的。这个问题不简单，认同你的观点，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部分地认同苏联实践了欧亚主义超越东西方道路的某些主张，但反对压制个人自由。第二个问题：新欧亚主义与古典欧亚主义相比，加入了地缘政治和民族因素，21世纪是古米廖夫的时代，但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尝试更加有力量，更加容易变为政治实践？回答：不同意新欧亚主义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哲学的主流。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的反应很敏感，对古典欧亚主义的继承性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客观评价。不要上了新欧亚主义的当，他们的观点很少能经得起批判，没有一个能与古典欧亚主义的创始人特鲁别茨科伊的观点相提并论。^①

欧美政界、学界极其重视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实践，尤其在俄、乌冲突后，重视新欧亚主义激进派对普京执政理念的影响。主要的基调是，认为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激进思想“成为今天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对俄罗斯政府的政治及外交政策的激进走向，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各国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法国《新观察家报》把杜金称为“普京时代的拉斯普京”，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称杜金是普京的“大脑”，土耳其媒体则称其为“俄罗斯的基辛格”。^②2014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杜金评为2014年度的全球思想者，并和叙利亚的恐怖主义组织(ISIS)领导人巴格达迪(AbuBakral-Baghdadi)、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圣战者约翰”(Jihadi John)等人并列^③；认为杜金一手策划了俄国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俄、乌冲突的理论根源。

我国政界、学界对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与俄罗斯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方面。其基本立场是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关系。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

① 斯米尔诺夫：“古典欧亚主义：俄罗斯‘全人类的’设计规划”，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系列讲座，2018年4月19日。

② 荆宗杰：“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第四政治理论’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

③ 转引自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文化纵横》，2015年10月。

俄两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和顶层设计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2016年6月，普京在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宣布，与中国正式启动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计划，我国在政界层面积极认可和回应。但就具体内容来说，还未涉及其实质性思想内涵的对接与合作。正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赵华胜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认知中的欧亚通常是指原苏联地区，中国还没有成型的欧亚观，更遑论大欧亚观。较少有人谈中国的欧亚政策，对大欧亚这一新概念也还没有官方明确表态。”^①但中国一直是欧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等。中国学界对新欧亚主义的研究和评价，主要集中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展开了深入而有效的研究。但中国哲学界对该学派的研究略显薄弱，即使俄罗斯学界高度评价的古典欧亚主义，在我国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还没有深入到其理论对当前俄罗斯政治和外交的影响。我国著名的俄罗斯哲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启念认为：俄罗斯哲学传统精神的内在实质，是关注俄罗斯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但是今天，这样的俄罗斯哲学死了”。^②我国著名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专家、俄罗斯联邦普希金奖章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百春则指出，对于当代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哲学，特别是杜金的哲学理论，我们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位学者对新欧亚主义文明论和地缘政治学建构都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我国学界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新欧亚主义从人类文明构成的大视野，探讨俄罗斯作为跨欧亚国家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地缘政治的欧亚空间、文明类型的欧亚独特性、俄罗斯东正教弥赛亚使命的现代延续等。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聚焦在“反抗”与“重塑”这两个关键词上。它提出的是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构

① 赵华胜：“大欧亚伙伴关系 | 中国的回应”，澎湃新闻，2017年12月15日。

② 安启念：“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和未来”，《求是学刊》，2017年第7期。

想。新欧亚主义之所以在当下俄罗斯备受关注并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其现实生命力就在于此。正如别尔嘉耶夫的评述，古典欧亚主义最值得称赞的是，以文化高于政治并主导政治的价值原则反抗欧洲文化和政治的垄断。^①古典欧亚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反抗欧洲文化和政治垄断的基因。新欧亚主义将其继承，并在地缘政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发展壮大，使其从哲学走向政治实践。因此，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实质，不是复兴俄国亚洲地区的独立文化价值，而是重塑俄罗斯文明定位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价值基础，以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重振俄罗斯明确方向和道路。即，为俄罗斯反抗西方价值体系、从自身文明性质出发，探寻本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进行文明论的奠基。

【Abstract】 The uncertainty of Russian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has been a puzzle for Russia's identi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hundreds of years. As soon as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Russia had to once again face this problem and make a new choice. The neo-Eurasian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stood out among Russia's various thoughts. Its strong vitality lies in that it rather reasonab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uncertainty in Russian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civilization theories and geopolitics.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it puts for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reshaping Russ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resisting the universality the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ol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To reshape Russian civilization by reconstructing Russian cultural community is constructive for Russia's own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nevertheless, once i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it is highly likely to cause conflicts between countries or regions.

【Key Words】 Neo-Eurasianism, Russian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Russian Cultural Community, Russian Diplom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① 郭丽双、汪力平：“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文明论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блемой, которая преследует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я вновь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д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и делает новый выбор. Неоевраз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ыделяется из множества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идейных теорий в России, её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она может разумно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опрос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и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на уровн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учений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на основе глубо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ыдвигает новую концепцию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универсализму запад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старом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ядку, а такж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нов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зменение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путём измен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общины является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й силой дл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но как только она выходит за предел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раниц, она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конфликты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или регионам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рус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的兴起 ——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的分析

周超*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和东欧转轨以来，中东欧政治发展的最终诉求，无论从中东欧国家申请入盟（EU）的举动，抑或是欧盟国家施加监督和管控基础之上的接纳来看，应当是自由民主制的建立和存续。但是在九十年代的“黄金岁月”之后，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尤其是曾经作为转型排头兵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民粹主义不仅崛起而且执政，成功进行了所谓“逆民主化”操作。与此同时，激进右翼势力在中东欧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对于二者的兴起，历来有两大解释要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学界对于二者的实际作用也各有分析，但是结合中东欧冷战后政治发展的实际，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力明显更为有效。本文力图分析和概括针对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兴起的西方主要研究视角，指出其贡献和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中东欧民粹主义 中东欧激进右翼 中东欧社会文化 中东欧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814.1;D08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6-0143(33)

* 周超，西安外国语大学波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中心博士生。

一、引言

对于分析民粹主义（Populism）以及激进右翼（Right-wing Extremism）来说，中东欧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板块。就中东欧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其主要特点就是自主发展历程被持续打断，地区主体民族持续受到压制，民族主义诉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进程极为曲折，时不时出现经济水平的实质性倒退。^①因此，中东欧的历史进程不仅是曲折的（zigzag）更是反复的（back and forth）。这样的历史进程使得中东欧的政治发展，自始至终处在外力和自身发展的持续互动之中，对于检视特定政治势力的兴衰，有着独特的意义。

应当说，在中东欧转轨之初，西方学界曾经普遍担忧中东欧可能的民粹主义势力和激进右翼势力的兴起。在西方学者眼中，最初的转轨前景是灰暗甚至黑暗的。^②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舍科维契（Bela Greskovits）指出，西方学者的这些担忧，都是基于和拉美国家转轨进程进行的错误类比。^③中东欧国家公共部门的储备比较丰厚，并不存在拉美国家的极端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故而没有必要采取民粹主义的经济策略。结合“灰暗观”学者和格雷舍科维契的观点，可以看出，这两派的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在经济角度。“灰暗观”学者认为，经济压力导致政治混乱，进而促成民粹势力上台；而格雷舍科维契则认为，中东欧国家有能力抵制转轨的经济代价，进而保证民主政体的存续。^④也就是说，民主能否得以存续，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可否受到压制，在这两派看来，都要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表现。

① 潘兴明：“关于中东欧地区特殊性的历史解读”，2018年6月19日，<https://xw.qq.com/cmsid/20181021G0HO2Y/20181021G0HO2Y00>

②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81-187; David Ost, “Labor and Societal Transi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1992, Vol.33, No.5-6, pp.48-51.

③ Bela Greskov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7-22.

④ 在格雷舍科维契的论述中，也提到了文化方面的原因（共产主义的遗产），但是纵观其整部著作的论述，经济相对富足赋予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依然是民主得以存续的第一位因素，参见 Bela Greskov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12-215.

美国学者普沃斯基提出过，民主制得以存续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经济上的富裕。^①当然，在涉及中东欧转轨的论述中，他也提到了另一个因素——距离。普沃斯基教授认为，离西欧民主国家相对较近（比之于原苏联成员国）的距离，使得中东欧国家更容易受到民主国家辐射的影响，这是他本人对中东欧转轨持乐观态度的唯一因素。^②但是时至2019年，中东欧国家，尤其是维谢格拉德集团，远比九十年代时更为富足，也依然靠近西欧民主国家如法国、德国，但是其内部的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却大大增强。在匈牙利，2010年胜选执政的青年民主联盟（FIDESZ）始终在逆转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2014年更公然提出建立“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修改媒体法，通过改变退休年龄的软强制措施，迫使自由派法官提前退休。这两国自2010年之后就与欧盟处于连绵不断的纷争之中，欧盟更是一度祭出“撒手锏”——中止波兰在欧盟委员会的表决权，来打击波兰执政党。^③匈、波两国的政治走向是如此受到欧盟的关注，以至于时任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提莫曼斯（Frans Timmermans）在离职之际依然警告两国当局，他本人将会持续关注两国政治的走向。^④而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虽说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的势头不似匈波两国这般强劲，但是ANO^⑤党在2017年捷克选举中的胜利，正式标志着长期以来由公民民主党（ODS）和社会民主党（CSSD）所代表的建制派势力的崩溃，同时，激进右翼政党SPD（直接民主党）的得票率也持续上升。在斯洛伐克，老牌民族-民粹主义政党斯洛伐克民族党（SNS）表现起伏不定，但是更为激进的新纳粹主义政党“我们的人民-斯洛伐克民族党”（L'SNS）迅速在斯洛伐克大选中崛起。显然，单纯的经济因素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① Adam Przeworski, “What makes Democracy end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6, Vol.7, No.1, pp.39-55.

②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199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90.

③ “What is Article 7, the EU’s ‘nuclear option’?”, *Politico*, 9.12.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raphic-what-is-article-7-the-eus-nuclear-option/>

④ Lili Bayer, “Timmermans to Warsaw and Budapest: Rule of law fight isn’t over”, 9.16.2019,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immermans-to-warsaw-and-budapest-rule-of-law-fight-isnt-over/>

⑤ 捷克语，意为：“公民不满意”。

就民粹主义以及激进势力的兴起而言，学界总体的解释分为两大类：经济因素解释说和文化因素解释说。经济因素解释说认为，社会收入差距的加大和社会贫困现象的蔓延，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众不满的积累，是民粹主义以及右翼激进势力兴起的根本原因。^①而文化因素论则认为，比之于经济因素方面的冲突，代与代之间在文化观念上的冲突，是民粹主义乃至激进右翼崛起的根本原因。率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因格勒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其一系列著作中，他提出，西方社会在战后经历了一次文化的变迁，从现代文化逐渐过渡到后现代文化。秉持后现代文化观的战后一代，远比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更为包容和开放，更加主张社会的多元化，这种趋势和潮流无疑对年长的一辈人造成了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压力。为了对抗这种压力带来的不安全感，较年长的一辈就从政治上行动起来，支持民粹主义政党以及激进右翼势力，产生了文化上的反弹。^②为了比较这两种观点各自的解释力，在有关英国脱欧的研究中，比帕·诺睿斯（Pippa Norris）教授利用经济数据和世界价值观调查^③所提供的文化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得出结论认为，对于英国脱欧这一民粹主义诉求的产生，经济因素并不具备解释力，文化因素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④

当然，无论是经济因素解释说还是文化因素论，其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民主政体。作为新兴民主国家的中东欧，面临着和西欧国家有着很大差异的情况。但是经济因素在解释效力上的乏力是很明显的，比如2005年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首次胜选上台之时，彼时波兰经济状况一片大好。按照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理论的解释，似乎原先的执政派应当继续胜选才是。考虑到中东欧政治和文化发展历程的曲折和复杂性，

① Thomas Piketty, *Capital*, Cambridge, MA: Bellnap Press, 2014; Jacob 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tthew J. Goodwin, Oliver Heath, “The 2016 Referendum, Brexit and the Left Behind? An aggregate-level analysis of the result”, *Political Quarterly*, 2016, Vol. 87, No.3, pp.323-332.

②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World Value Survey

④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 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2016-7-29,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Index.aspx>

再加上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政党在具体的选举表现上和经济数据状况的背离，文化因素似乎更适合于解释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的兴起。

实事求是地说，在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受到苏联强有力的压制。苏联解体之后，这种外来的强制力不复存在，民族主义诉求的勃发得到了充分的自由，作为其极端表现形式的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也自然获得了发展的丰厚土壤。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的兴起，是 1989 年以后中东欧政治发展的最明显特征。虽说在入盟的要求下^①，这些势力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低调（20 世纪 90 年代），但是伴随着最终入盟的实现以及欧盟压力的适当减缓，这些势力最终爆发出了自身的生命力，而且十分顽强。认识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的兴起，必须从中东欧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化遗产角度来深入剖析，才能够理解其成因。中东欧区域位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最终接入西欧的关键地区，可谓是“一带一路”贯通东西的枢纽。考虑到新千年以后，尤其是 2010 年以后中东欧具体的政治发展趋势，可以说，在较近的未来，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将会长期保持相对强势的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和分析这一现象。由于特殊的原因^②，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寂，现有的论述对于其社会文化遗产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不过，西方学界自始至终都在关注中东欧冷战后的政治发展，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进行的分析也很丰富。本文拟对西方学界的研究角度、结论以及关注点的变迁，做一个梳理和评价。虽说中国的中东欧研究绝不可能照搬西方学界的思路和观点，但是借鉴西方的成果，对中国的中东欧研究以及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都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作用。

在开始正文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做出界定。对于激进右翼（right-wing extremism）这一名词，西方学界诸多学者用不同的名词来称呼这一现象，比如极端右翼（radical right）^③，右翼极端主义（right-wing

① 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提出了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其中第一条就是存在运转良好的自由民主政体，这本身就构成了对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的外在压制，虽说这种压制的力道远不如当年的苏联。

② 朱晓中：“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③ Michael Minkenberg,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002, Vol. 16, Issue.2, pp.335-362.

radicalism)^①或是极右势力(far right)^②。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这几个名词都是同义词,本文对此也采取相同的立场。在笔者看来,极右政党作为一个政党类别(far right party family),是存在的。在这个总类别之下,还有两个子类别。一是激进右翼势力,意指秉承民族-种族之间存在生物学上的不平等^③的观念,并据此反对民主宪政国家的主要价值观,诸如多元主义、平等原则和民主程序。二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指在意识形态上融合了本土主义、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④的政党势力。有关民粹主义的定义,历来纷争不断。笔者在此将民粹主义定义为:由个人或集团所持有的一种本质上相对模糊的诉求,此种诉求旨在反抗当下精英统治的现实,要求实现民众的真正授权;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坚持认为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化的群体——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被精英所篡夺的权力必须回到人民手中。^⑤本土主义(Nativism)在此定义为:一种认为国家应当完全由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族群所占据的意识形态观念。^⑥威权主义则是指:一种认为社会应当严格按照等级秩序进行组织的观念,任何对权威的冒犯均应当受到严厉惩罚。^⑦本文的重点,是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对这两类政党的崛起加以分析和解释。

① Welchel Volker, „Rechtsradikalismus in Osteuropa-ein Phänomen sui generis?“, *Osteuropa*, 2002, Vol.52, No.5, pp.612-620.

② Vit Hlousek, Lubomir Kopecek, *Origin, Ideology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East-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Compared*, Farnham, Burlington: Ashgate Press, 2010.

③ Astrid Botticher, Miroslav Mares, *Extremismus. Theorien-Konzepte-Formen*, Munich: Oldenbourg Verlag, 2010.

④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Vol.39, Issue.4, pp.542-563; Ben Stanley,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y*, 2008, Vol.13, Issue.1, pp.95-110; Daniele Albertazzi, Duncan McDonnell,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er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1-14.

⑥ Cas Mudde, *Radical Right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8-19.

⑦ Cas Mudde, *Radical Right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pp.21-23.

二、基本研究现状：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 解释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2000年之前）

中东欧自转轨以来，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在新兴民主政体下的崛起。虽说自转轨以来，中东欧国家在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以最终加入欧盟为标志），但是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势力，自始至终和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建设如影随形。在转型的“排头兵”维谢格拉德集团，捷克出现过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共和主义-共和党人党（SPR-RSC），匈牙利在九十年代也出现了匈牙利社会与正义党（MIEP），二者都一度成功胜选进入议会。斯洛伐克甚至一度建立过民粹-威权主义政权莫切尔政府（Meciar Government）。同时，右翼激进主义暴力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主要针对本国少数民族、罗姆人（Roma，又称吉普赛人）以及政治反对派，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族也成为主要的对象。^①

这一时期对右翼激进主义的研究，主要在转型研究的框架内展开。这一框架下有三个主要分支：民主巩固研究^②、民族主义研究（主要针对剧变之后原苏东地区种族-民族关系的紧张趋势）^③和非民主政权的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共产党政权更迭之后出现的威权主义政权）。^④而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就是拜姆（Klaus Von Beyme）的作品。拜姆在研究中，提出了组织化的偏狭性（organized intolerance）这一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通过比较方法来研究各种右翼激进主义政党。同时，拜姆还将右翼激进主义的研究，和民粹主义思潮及运动在中东欧的扩散联系起来。^⑤

① Cas Mudde, *Racist Extrem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266-285.

② Klaus Von Beyme, „Parteien im Prozess der demokratischen Konsolidierung“, in Wolfgang Merkel(eds.), *Systemwechsel 3, Parteien im Transformation-sprozess*, 1997,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pp.22-56.

③ Jahn Egbert, *Nationalism in Late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2008, Vol.1, Baden-Baden: Nomos Verlag, pp.10-18.

④ Stanislav Balik, Michal Kubat, *Undemokratische Regime: Theoretische Verortung und Fallbeispiele*, Berlin: Verlag Barbara Budrich, 2015.

⑤ Klaus Von Beyme, „Rechtsextremismus in Osteuropa“, in Hans-Gerd Jaschke (eds.), *Rechtsextremismus.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Sonderheft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zeitschrif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6, pp.423-441.

有关激进右翼势力特点的讨论，在德国政治杂志《东欧》（*Osteuropa*）上继续展开。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中东欧极右势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不是剧变之后该地区经济-文化层面上进一步现代化的结果。^①其次就是中东欧的激进右翼以及民粹主义势力，其形成、发展和影响，究竟是类似于西欧的还是自成一类（*sui generis*）？^②也有学者针对中东欧右翼激进势力做了基于国别的案例研究。不过，就两大争论焦点而言，参与讨论的学者之间并未达成一致。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明克贝尔格（Michael Minkenberg）对影响中东欧极右势力兴起的诸种历史遗产做了分类尝试。他提出，影响中东欧极右势力的遗产主要包括：国家类型，境外领土的存在（由于大国历史安排造成的领土分割，比如针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是否存在强大的少数民族，政体冲突（主要政治势力在政体类型安排上无法达成一致），转型的代价，未改革的共产党后继党的存在（其前身是具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共产党），民族主义政党的存在，等等。明克贝尔格指出，中东欧极右势力的崛起，是诸种遗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产党执政前和执政时期的遗产，都起了作用。^③

荷兰学者凯斯·穆德（Cas Mudde）也对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现象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穆德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不仅仅关注参与竞选和在议会中进行活动的极右-民粹政党，议会政治之外的极右-民粹运动和次文化也都在他的关注之中。^④同时，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上，穆德把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进行研究。^⑤穆德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就政治能量来说，中东欧的激进右翼政党总体上是有

① Timm Beichelt, Michael Minkenberg, „Rechtsradikalismus in Transformationsgesellschaften, Entstehungsbedingungen und Erklärungsmodell“, *Osteuropa*, 2002, Vol.52, pp.248-263.

② Welchel Volker, „Rechtsradikalismus in Osteuropa-ein Phänomen sui generis?“, *Osteuropa*, 2002, Vol.52, pp.612-620.

③ Michael Minkenberg,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Cold Wa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tuttgart: Ibidem Verlag, 2010, pp.10-27.

④ Cas Mudde,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Eastern Europe“, *Patterns of Prejudice*, 2000, Vol.34, Issue.1, pp.5-26.

⑤ Cas Mudde, *Radical Right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限的，但是中东欧的种族主义暴力程度高于西欧。^①

也有学者从政党类别（party family）的角度来进行比较研究。赫洛赛克和科佩切科^②就指出，以二十世纪末为时间节点，比较中东欧极右政党和西欧极右政党的特点就能够发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遗产，对中东欧极右政党的影响更为显著和巨大，从这一点来说，中东欧极右政党远比它们的西欧同类来得更加“年长与传统”（older and more traditional）。

如前文所述，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的兴起，主要是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西欧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使西欧社会开始了从现代向后现代、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推动了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转化，社会价值观趋向于进一步多元和自由化。这个过程被西方学者称为“静悄悄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③但是这一转化过程，却使得当时西欧国家的年长世代感受到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压力；为了对抗这种压力，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起而成为年长世代对抗文化价值观念转化和全球化潮流的代言人。这一过程则被西欧学者称为“静悄悄的反革命”（silent counter-revolution）。^④这一理论视角被西方学者归纳为“现代化失意者理论”（modernization loser theory）^⑤，并用以解释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衰。但是如果企图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东欧，则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在历史进程时常被外部势力扭曲、逆转甚至打断的中东欧，根本没有经历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进程；从现代化进程的失意者角度切入，恐怕难以解释 1989 年以后中东欧激进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但是，如果从中东欧国家所继承的社会遗产角度入手，并将“现代化失意者理论”作适当的调适，还是能够对中东欧激进右翼民粹主义

① Cas Mudde, *Racist Extrem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266-283.

② Vit Hlousek, Lubomir Kopecek, *Origin, Ideology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East-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Compared*, Burlington: Ashgate Press, 2010, pp.214-216.

③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④ Piero Ignazi, “The Silent Counter Revolution. Hypotheses on the emergence of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2, Vol.22, Issue.1, pp.3-35.

⑤ Hans-Georg Betz, “The new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3, Vol.25, No.4, pp.412-428.

政党的兴起及其意识形态特点做出解释的。比如明克贝尔格^①就提出，尽管中东欧国家各自的历史轨迹和机会结构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综合而言，后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三重几乎同时进行的转型过程：从极权-威权政体转向自由民主政体，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向自由市场经济，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同时进行的三重转型过程，大大加强了中东欧国家民众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安全感。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特点之一，就是倾向于通过极度简单化的措施，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毫无疑问契合处于迷惘和彷徨状态的中东欧民众的心理状态。因此，中东欧民粹主义势力有着不容忽视的吸引力和动员能力。西欧极右民粹政党在坚持威权-民族主义立场的同时，往往在经济政策上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立场。^②而在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威权-民族主义立场，却往往和“左倾”经济立场（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强调社会福利体系的保障作用等）结合在一起。^③也就是说，中东欧极右民粹政党不仅主张保护经济转型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而且对秉持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精英也持敌对态度。

同时，截至 2015 年，中东欧国家并未面对大规模的移民压力（来自非欧洲国家和地区），这一特点对于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诉求有着重要影响。依据本文对极右民粹主义的定义，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排外性意识形态，注定其需要寻找敌人。移民群体的缺失，使得极右民粹势力将攻击焦点转向本国的少数民族（国境之内、主体民族之外）。^④同时，由于中东欧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国竞争和宰割之下，中东欧国家的领土构成经历了多次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不以中东欧国家本国主体民族的意志

① Michael Minkenberg,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sociali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Ob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Eastern Europe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002, Vol.16, Issue.2, pp.336-363.

② 近年来，西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也开始要求保留甚至扩大广泛性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综合而言，在经济立场上，西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立场比它们的中东欧同类更为自由化。参见 Sarah L. de Lange, “A New Winning Formula? The Programmatic appeal of the radical right”, *Party Politics*, 2007, Vol.13, Issue.4, pp.410-435.

③ Herbert Kitschelt,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 Politics*, 1995, Vol.1, Issue.4, pp.447-471.

④ Within the state but outside the nation, 参见 Cas Mudde, *Radical Right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为转移。这种历史进程的主要遗留问题，就是“位于外国的故土”（external homeland）和“失去的领土”（lost territories）。这种领土收复主义诉求所塑造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其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诉求和西欧的同类政党大不相同。西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诉求，是在面临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本国主体民族特有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存续，以及对本国福利体制的独占，其民族主义诉求主要是“防御性”的。而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则强调恢复本民族原有的疆土以及保持对本国少数民族的优势地位和压制，其民族主义诉求是“进攻性”的。^①因此，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比其西欧同类更具进攻和侵略性。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有捷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党人党（SPR-RSC）、斯洛伐克民族党（SNS）以及匈牙利的尤比克党（JOBBIK，意为“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这三个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所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本国的罗姆人群体。同时，尤比克党还一直攻击历史上的特里亚农条约（Trianon Treaty），因为这一条约令匈牙利失去了近半的原有领土，使得大量匈牙利族沦为他国的少数民族。而保加利亚的阿塔卡党（ATAKA，意为进攻）的主要针对目标，是本国的土耳其族裔。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大罗马尼亚党（The Great Romanian Party）。这些政党的诉求和立场，均是这种中东欧进攻性民族主义的明显表现。^②概而言之，历史遗产（共产主义和前共产主义阶段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光谱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首先，这些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往往不完全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同时力图保护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其次，历史上基于大国意志的领土调整、大规模外来移民群体的缺失以及本国少数民族的存在，这三个因素的混合，使得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民族主义诉求更具攻击性（与西欧的情况相比）。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东欧的民粹主义也不是单一的。因此，有必要

① Michael Minkenberg,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and Xenophobia in West and East: Trends, Patterns and Challenges”, in Ralf Melzer and Sabastian Serafin (eds.), *Right Wing Extremism in Europe. Country Analyses, Counter-Strategies and Labor-Market Oriented Exit Strategies*, Berlin: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13.

② Andrea L. Pirr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fferent Context and Issues of the Prophet of the Patri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4, Vol.49, Issue.4, pp.600-627.

考察历史遗产对于不同民粹主义的影响。凯斯·穆德（Cas Mudde）考察了共产主义阶段历史经历的遗产对三种民粹主义（农民民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的影响。^①穆德认为，在东欧家庭农场是农民民粹主义产生和存续的根基；但是在东欧，由于共产党政权所推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农民民粹主义产生和维持的根源几乎被扫除殆尽。少许特例^②存在于农村人口坚决并成功抵制了集体化政策的国家（如波兰，所以1989年之后波兰自卫党-Self Defense一度兴起），或是因为共产党政权推行适度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从而使得农业集体化政策未能充分实施的国家（如匈牙利，转轨之后匈牙利独立小业主党-Hungarian 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Party在选举中也曾占据一定的地位）。共产党统治时期相对平等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转轨阶段经济差距拉大的现实，原本有助于经济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斯洛伐克和白俄罗斯），经济民粹主义并未成为社会主流。穆德认为，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转型阶段对于市场经济改革的广泛认同的存在，以及国际市场上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的流行。在穆德看来，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历史遗产，最有利于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③首先，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党-国一体化的体制，在民众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政治^④和反政党情绪，这种情绪和民粹主义的民众-精英之间的善恶两分对立的观点有共通之处；其次，共产党统治时期的高压态势使得民众之间缺乏相互信任，转轨之后的市场化浪潮进一步加剧了中东欧社会的原子化（atomization）和虚无主义（nihilism），这妨碍了有生机和活力的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利于民粹主

① Cas Mudde, "In the Name of Peasantry,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People: Populism in Eastern Europe", in Yves Mény &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p.214-232.

② Ben Stanley, "The Polish Self-Defense Party: from agrarian protest to the politics of populism, 1990-2007", in Dirk Strijker and Ida Terluin (eds.), *Rural Protest Groups and Populist Political Parties*, Wageningen: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 2015, pp.332-353.

③ 政治民粹主义应当也包含诸多类别，只是在穆德的著作中，他本人的政治民粹主义定义等同于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参见 Cas Mudde, "In the Name of Peasantry,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People: Populism in Eastern Europe", pp.33-52.

④ 转轨之初，中东欧国家政坛的主导力量往往避免使用“政党”一词，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以及斯洛伐克的“公民反暴力运动”。在中东欧民众的长期经历中，其内心潜在的认知就是政治=暴力，政党=专制或是压制。

义的兴起。^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反政治的情绪，得到了主导转轨阶段政治进程的知识-政治精英的鼓励和提倡。比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②就提出，政治不过是有关权力和操纵权力的一个术语，至多再加上实用主义和权谋的艺术，为了让人民真正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应当提出非政治的政治（non-political politics）。与此类似的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成立之时，也强调自身的工会本色，而非自身的政治属性。^③这种反政治的情绪，在转轨时期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中东欧社会中，很容易被极右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所捕捉并利用，进而成为自身发展壮大动力。

众所周知，中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主要是苏联施加外在强制力的结果。但是苏联在中东欧诸国建立共产党政权时，并非完全依样画葫芦。在建立之后的发展道路上，也并未彻底堵死任何变通的可能。这就使得中东欧诸国的共产党政权，在总体相似的基础上同时具有各自的特性。要细致并深入考察共产党统治时期的遗产对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影响，就应当把各国各自的政权特点纳入考察的范围。在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齐特谢尔特（Herbert Kitschelt），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分法。^④从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集中程度和主要行使方式出发，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中东欧国家大体可分为三类：家长制共产党政权、民族适应型共产党政权和官僚-威权型共产党政权。

在此后进一步的分析中^⑤，齐特谢尔特指出，民族适应型共产党政权（主要包括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统治的国家，转轨之后的后继者继承了原有的半福利国家体系，主要政党在经济改革议题和自由民主化进程上的一致性程度较高。因此，政治斗争的焦点转向社会文化议题，主要在力图保留基督教文

① 有关这一点最详尽的论述可见 Marc M. Howard,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Vaclav Havel, *Do ruznych stran. Eseje a clanky z let 1983-1989*, Praha: Lodove noviny, 1989, pp.106-107.

③ Ost David, *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Herbert Kitschelt,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s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 Politics*, 1995, Vol.1, Issue.4, pp.447-472.

⑤ Herbert Kitschelt, Lenka Bustikova,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egaci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 Vol.42, Issue.4, pp.459-483.

化价值传统的民主主义保守派和自由普世主义派之间展开。20世纪90年代，这类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以及在社会福利政策上的慷慨，进一步挤压了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活动空间。虽说90年代末期的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极右民粹政党的兴起，但是主流政党主动接过社会文化议题并进行强调的策略，对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起了一定的釜底抽薪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在民族适应型共产党政权的后继国家，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缺乏坚实的基础。

对于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主要包括捷克共和国以及原东德），齐特谢尔特认为，在这类国家的后继国，总是存在坚定坚持原有意识形态立场和拒绝改革的原共产党后继党，而这类政党总是能够有效吸引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化改革不满的人群。有关经济改革议题的竞争，主要在社会党以及中右政党之间展开。这种竞争格局在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的后继国中，是固定化的政党格局，故而留给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空间也比较有限。^①

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得以勃兴的最丰厚的土壤，存在于家长制共产党国家的后继国^②（比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类国家虽说也存在坚持原有意识形态立场且拒绝自身改革的共产党后继党，但是迫于客观经济社会形势的限制，这些共产党的后继党一旦上台执政，也不得不采取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但是这类国家的改革历程中，经济混乱和政治不稳定的现象十分突出，经济改革三心二意，而且社会保障体系的事实崩溃，也使得转轨时期的政府无法有效安抚民众的不满。这几大因素相结合，使家长制共产党国家的后继国，存在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勃兴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有利因素在经济复苏（新千年之后）开始之后也并未实质性消失。

除此之外，齐特谢尔特还分析了少数民族和领土纠纷因素对于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兴起的作用。他认为，在存在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地位比较稳固的少数民族的中东欧国家，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具备充沛的崛起基础，

① Herbert Kitschelt, Lenka Bustikova,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egaci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pp.464-465.

② Ibid, p.465.

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对邻国有领土收复诉求的国家。^①

三、研究的推进和相关争议点的演进（2000年之后）

研究和探讨中东欧右翼激进势力以及极右民粹主义的兴起，其主要目的之一，也包含推测这两股势力在中东欧政治版图中的相应地位和影响，以及与中东欧民主化进程的互动。有关中东欧右翼激进势力和极右民粹主义的实际情况，学界原先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中东欧的这两股势力会从实质上葬送中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也即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的“魏玛化”。^②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民主政体的逐渐巩固和这两股势力的相对衰落，使得一部分学者提出，中东欧的这两股势力将和它们的西欧同类那样，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③但是，这两种预测都是基于与其他国家（如魏玛德国）或是其他地区（如西欧）的类比，并没有完全考虑到中东欧自身的特点。明克贝尔格在纳入中东欧自身历史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折中的观点，即从实际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以及与民主化进程互动的角度来考察，中东欧右翼激进势力和民粹主义势力是有着自身特点的一种政治存在；中东欧国家的这两股势力，就整体而言，其实际的政治能量高于其西欧的同类，实际的政治地位也较高（选举表现，执政党或是参政党），对民主政体也能够产生实质上的消极影响，但是距离完全扭转民主化进程，乃至彻底拆除民主政体，仍有相当差距。^④

应当说，明克贝尔格的论断相当贴近中东欧政治发展的现实。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以及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在本国政坛的地位，绝不是英国独立党（UKIP）和法国国民阵线（FN）所能比拟的。但是，和当

① Herbert Kitschelt, Lenka Bustikova,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egaci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pp.467-468.

② Paul Hockenros, *Free to hate, the Rise of the Righ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3.

③ Cas Mudde,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Eastern Europe”, *Patterns of Prejudice*, 2000, Vol. 34, Issue.1, pp.5-26.

④ Michael Minkenberg,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sociali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Ob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Eastern Europe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002, Vol.16, Issue.2, pp.336-363.

初希特勒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废除民主体制的举动相比，青民盟与法律和正义党却显得相当有耐心。它们旨在逐步使民主机制空心化，而不是一蹴而就。同时，就两国社会实际的发展趋势而言，也很难断定匈波两国执政党的确有完全废除民主机制的决定。但是，这两国执政党实际的举动，毫无疑问是民主去巩固（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的表现，因此，西方学者也将其纳入民主去巩固的研究框架进行分析。^①

2000年以后，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其一是欧盟东扩和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其二是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其三则是阿拉伯之春所引起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欧盟东扩和中东欧入盟而言，西方学者较早预见到入盟之后民粹主义势力上升的潜在可能。^②但是，入盟以后中东欧各国内政和欧盟层面政治发展的实际，显然比学者原本预期的更为复杂。诚然，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本土主义立场，使得他们很容易秉持疑欧主义态度，尽管具体的疑欧程度有区别。^③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对于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来说，它们获得了在整个欧洲层面上表现自己的机会，并且全面加强了与西欧同类政党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有的学者指出^④，虽说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一度兴起的激进右翼势力，并未能够在整个九十年代巩固自身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但是结合近年来的政治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中东欧民主制度的成熟以及欧盟东扩的进程，并未能在整个中东欧地区完全消除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极右势力在中东欧依然拥有卷土重来的基础；而且这种卷土重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形势陷入动荡之中。可以这样说，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在2008年以后始终无法回到新千年前

① Jan Holzer, Miroslav Mares(eds.), *Challenges to Democrac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1-15.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主编：《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3-224页。

③ 概而言之，中东欧乃至整个欧盟内部的疑欧主义主要分为两类：软疑欧——强调主权国家的作用以及欧盟作为主权国家间的合作组织，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主权的进一步让渡；硬疑欧——国家脱离欧盟，整个欧盟解散。

④ Michael Minkenberg(eds.), *Transforming the Transformations? The Eastern European Radical Righ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2015, p.349.

后的稳定繁荣阶段，这进一步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动荡，作为紧邻西欧以及和西方国家经济体系紧密结合的中东欧国家自然也深受波及。对于经济-金融动荡与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关系，西方学界对此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赫尔南德兹^①的研究指出，就选举过程中的表现而言，经济危机在整体上提升了极右民粹主义、极左民粹主义以及所有非主流政党受欢迎的程度。但是也有学者^②根据对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表现的观察发现，经济-金融动荡对于提升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所起的作用，尚无法确定。比如在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尽管这两国的经济状况深受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是两国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选举表现，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提升；但是在其他国家，诸如捷克共和国、波兰和斯洛伐克，这三国的整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力度相对有限，经济结构并未严重失衡，也并未出现严重的衰退，但是这三国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却出现了支持度提升的状况。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以后汹涌而来的中东难民，虽说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并非中东欧国家，但是难民潮以及欧盟强制要求的难民配额摊派，还是成功地在中东欧各国内部促发了恐外情绪、反移民情绪以及反伊斯兰的情绪。这种状况，激进右翼以及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自然不会不加以利用，它们很快就把这种诉求融合进自身的纲领中，并用以动员民众来提升自身的支持率。恐外、反移民以及反伊斯兰诉求的融入，这一过程一些被西方学者^③看作是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现代化趋势”。但是与此同时，在经济-金融动荡以及难民潮袭来的大背景下，西方学者认为更加“年长而传统”^④的激进右翼政党也出现了上升的势头，比如处于难民危机前哨的希腊，激进右翼政党“金色黎明”（Golden Dawn）的影响力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① Enrique Hernández, Hanspeter Kriesi,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6, Vol.55, Issue.2, pp. 203-223.

② Hanspeter Kriesi, Takis S. Pappas(eds.),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5.

③ Miroslav Mares, “The Extreme Right’s relationship with Islam and Islam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from Allies to Enemie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2014, Vol.28, Issue.1, pp.205-222.

④ 参见前文。

自从中东欧国家转轨进程启动以来，结合中东欧转轨进程的发展以及西方学界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解释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尝试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因素还是社会-文化遗产？考虑到中东欧各国两股势力的实际表现，不能不说，经济因素的解释力确实相对较弱，而社会-文化遗产无论是在新千年之前还是之后，都有着较强的解释力。然而，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完全不具备解释力或者应当被摒弃。合理的观点应当是，考虑到中东欧国家具体历史发展进程的特殊性，经济因素对于两股势力兴衰的作用更为微妙，更为间接，更为曲折，更难以被直接观察和测量到。

四、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视角

冷战结束以后，整个欧洲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就是俄罗斯作为苏联继承国，其综合影响力和势力范围的全面衰退与收缩。相伴而来的是北约的进一步东扩，其所挤压的已经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是其实际的生存空间。这自然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反制。自普京上台以后，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复苏，反制举措正式启动。除了军事-经济手段^①之外，俄罗斯反制措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加强文化-宣传手段。首先，针对西方宣传的以民主、自由、世俗化以及经济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俄罗斯提出各国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发展路径，尊重本国传统与习俗的作用，而不是机械被动地跟随西方。其次，针对西方媒体^②在国际话语权上的霸主地位，以及英语在国际传媒界的统治地位，俄罗斯在 2005 年正式启动“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RT）计划，通过设立遍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网络，构建了一个以英语宣传为主、多语种同时推进的新闻媒体网络，提供“客观但是不同于西方媒体”的信息来源。再次，构建国际性的对话平台^③，试图联合各国内部（西欧各国也包括在内）对于西方普世主

① 主要表现为消灭车臣叛军，保证俄罗斯内部政治版图的统一和稳定，利用能源议题加强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等。

② 诸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美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

③ 比如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义不满的社会群体和政党，加强联系与沟通。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项举措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今日俄罗斯”实际影响力的上升，直接引起了西方政界和传媒业的警觉，2010年之后经常能够听到西方媒体对来自俄罗斯的“假新闻”（fake news）^①的指责。同时，西方传媒界的媒体分析专家联合设立了名为“测谎仪”（Polygraph）^②的网站。该网站专门针对“今日俄罗斯”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并且将其分为三类判断结果——假新闻、有误导性的新闻和真实新闻^③，试图通过质疑“今日俄罗斯”新闻的真实性，来抵消其影响力。诸多国际性对话平台的构建，以及俄罗斯提出的尊重本国传统、不盲从普世主义的主张，客观上起到了将中东欧甚至西欧各国内部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整合起来，并且加强彼此之间沟通和协作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因素在中东欧乃至西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再度兴起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西方学者也对“俄罗斯因素”进行了相当的探讨和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笔者以为，具有代表性的两本著作，一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 Institute）访问学者吉尔契克（James Kirchick）的《欧洲的终结》^④，另一本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拉瑞·戴蒙德主编的《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展》。^⑤这两部著作的主要观点是，“欧洲现如今的局势动荡、民粹以及极右势力崛起的主要幕后黑手，就是俄罗斯，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中国。”尤其是吉尔契克提出，无论是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欧元区缺乏统一外交政策的设计缺陷，还是在同化移民方面的无能为力，这些本土因素都被俄罗斯不失时机地从各个方面进行利用，使其负面影响加剧。除了从内部煽动欧洲解体，俄罗斯还大量扩军，从外部威胁欧洲，向北约成员国频繁施压，并通过削弱美国与跨大西洋之间的关系，强行推翻欧洲的安全结构。如果说，一个繁荣和民主的欧洲是美国的核心安

① Andrew Rettman, “Russia-linked fake news floods French social media”, 20.04.2017, <https://euobserver.com/foreign/137624>

② 详见该网站<https://www.polygraph.info/>

③ 笔者曾经对“测谎仪”的判断结果做过简单的统计，虽说西方媒体专家承认俄罗斯新闻报道也有真实性，但是其整体判断结果毫无疑问是负面的，尤其是涉及俄罗斯媒体针对俄罗斯国内反对派的报道。

④ James Kirchick, *The End of Europ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⑤ Larry Diamond(eds.),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全利益，就像过去 80 年一样，那么俄罗斯政权就是应该被抵制并最终废黜的政权之一。欧洲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会消失，直到其来自东部（俄罗斯）的威胁被压制。换句话说，要使得整个欧洲走向通往自由和平之路，首先需要压制俄罗斯。同时，这两本著作还不约而同地突出了网络的作用，认为西欧以及美国过分开放的网络环境，给了俄罗斯渗透和加以利用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煽动民粹主义等反民主情绪，破坏欧洲和美国社会的内部凝聚力以及欧（中东欧与西欧均在其分析之中）美各国之间的合作纽带与政治互信。同时，这两本著作还对俄罗斯和中东欧乃至西欧各国内部的极右团体和民粹主义势力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进行了追踪和研究。

实事求是地讲，从中东欧激进右翼乃至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发展轨迹来看，西方学者的主要论断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尤其是吉尔契克），俄罗斯的因素被描述为决定性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复兴苏联时代“失去的帝国”。这毫无疑问太过耸人听闻。俄罗斯的反制举动是自身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持续挤压之后做出的被动反应，其实质依然是防御性而非扩张性的。依据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战略举动和主要的战略规划，俄罗斯所追求的，依然是在原苏联成员国范围之内保持自身的传统影响力，以及对特定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而不是完全复归苏联的霸权地位。而且俄罗斯持续走低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起类似的“帝国梦”。欧洲局势的动荡，尤其是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根源还是在于西方经济-政治模式自身出现的问题导致吸引力降低，而非俄罗斯“施加黑手”的结果。西方学者的论述有因果颠倒的嫌疑。此外，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似乎欧洲（中东欧与西欧都包含在内）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都和俄罗斯暗通款曲，这一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的确，许多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领导人都表现出“亲俄”的倾向，比如自始至终反对因克里米亚危机而制裁俄罗斯的捷克总统泽曼（Milos Zeman），以及对制裁持有保留态度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但是也有重要的极右民粹主义领导人持有坚定的反俄立场，坚决主张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抗，比如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PIS）。就中东欧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而言，它们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

虽说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说服力有限，但是，俄罗斯与中东欧-西欧激进右翼以及极右民粹主义势力之间的关联，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不容否认。西方学者的研究，对于俄罗斯与中东欧-西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势力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西欧-中东欧极右势力的诸多领导人都表达过对俄罗斯的好感；^①他们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和国际场合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而其组织活动也接受过来自俄罗斯的资助。“俄罗斯因素”在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势力影响力增强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而伴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中国在中东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会逐渐上升，也必然会和这两股势力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俄罗斯因素”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怎样的作用？中俄关系对于中国和中东欧激进右翼以及极右民粹主义势力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笔者以为，值得我国学界深入跟踪和考察。

同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突出了腐败因素在中东欧民粹主义势力兴起当中的作用。^②其主要观点就是，中东欧社会长久以来（1989年之后）存在的腐败现象，是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集中点。这一集中点聚合了中东欧社会中大量的不满情绪，成为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 force），尤其是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进行动员的绝好催化剂。当然，借助这一集中点兴起的也有中间派单议题政党（centrist single-issue parties）。应当说，转轨之后腐败现象的长期存在，的确在中东欧社会各个阶层内心都集聚了极度的不满情绪。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在特定事件的触发之下就会爆发出极大的社会震荡能量。比如斯洛伐克2018年的调查记者被杀害事件^③，虽说这一事件原本应当属于一项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以此为契机，斯洛伐克爆发了转

① 比如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以及捷克直接民主党（SPD）领导人托米奥·岗村（Tomio Okamura），案例很多，此不赘述。

② Peter Učen, “Centrist Populism as a New Competitive and Mobilization Strategy in Slovak Politics”, in Olga Gyarfásova, Grigorij Meseznikov(eds.), *Party Government in Slovakia: Experience and Perspective*, Bratislava: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2007, pp.45-72; 以及 Grigore Pop-Eleches, “Throwing out the Bums: Protest Voting and Unorthodox Parties after Communalism”, *World Politics*, 2010, Vol.62, No.2, pp.221-260.

③ Judith Mischke, “Slovak police detain suspects in journalist murder case”, 27.09.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slovak-police-detain-suspects-in-journalist-murder-case-jan-kucia-k-martina-kusnirova/>

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运动，最终迫使时任总理（方向-社会党，Smer）罗伯特·费措（Robert Fico）下台。^①根据诸多记者的调查和访谈，长期以来对于社会腐败所积累的不满情绪，是促动斯洛伐克民众上街进行抗议的一个重要深层原因，记者被害事件只是一个催化剂。^②就中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社会特点而言，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扩展有着丰厚的土壤，这主要是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和权力运作机制的隐蔽性造成的。^③而在转轨之后，社会非正式规则和熟人关系网络，在新生民主社会的进一步存续^④，则为腐败现象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深化准备了条件。但是，关于中东欧国家的腐败现象本身及其和激进右翼以及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兴起之间的关系，值得探究的内容更多。

首先，就腐败本身而言，以中东欧转轨的急先锋——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例，转轨之后，在其社会综合治理指数^⑤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腐败控制能力的持续下降。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⑥观察的结果，维谢格拉德集团呈现出的特点是，对于民族共同体以及民族国家的认同持续保持在高位（高于70%的水准），但是对本国政党的认同度持续走低，转轨之后的综合认同水平甚至不足百分之二十。^⑦虽说对具体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还需要作更加细致的考察，但是就初步观察来看，很难说持续走低的政党认同度和持续恶化的腐败控制不存在因果关系。维谢格拉德四国的民主化水

① Siegfried Morkowitz, “Slovak PM Robert Fico resigns”, 15.03.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robert-fico-resigns-slovakia-prime-minister/>

② Jan Kuciak, “Jan Kuciak’s last story: Italian mafia’s tentacles reach into Slovak politics”, 28.02.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jan-kuciak-last-story-italian-mafias-tentacles-reach-into-slovak-politics/>

③ Francois Bafoil, “Quelques aspects de la corruption dans les economies postcommunistes. Un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 *Communisme*, 2000, Vol.64, pp.45-65.

④ Marc Marje Howard,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5-29.

⑤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 (WGI)，是由世界银行所开发的衡量世界各国政府治理指数的指标体系。虽说这一指标体系远非完美，但却是如今有关政治治理能力衡量的较为客观和全面的指标体系，详见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⑥ European Value Survey

⑦ Russell Dalton, Christian Welzel(eds.), *The Political Culture Transform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64-175.

平以及社会公开程度，按照诸多国际评级机构^①的调查结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这种高水平的自由民主化水平，似乎无法有效转化为对腐败的有效控制。民主化水平和腐败控制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否开放的社会舆论环境和自由的社会媒体氛围，加上民主选举机制的存在，就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这些问题同样值得细细思量。

其次，腐败，即使民众不得不接受甚至参与到这一活动中，对于追求善治的民众来说，总是一种难以真正认同的现象。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对于原共产党政权腐败的指责，说出了许多民众的心声。作为参与到推动剧变最终实现的中东欧民众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对于腐败从内心来说是拒绝的。一旦剧变之后的执政党被爆出腐败丑闻，理应受到民众在投票选择上的惩罚。但是现实中，这一推论得到的支持比较有限。以斯洛伐克为例，莫恰尔（Vladimir Meciar）执政时期（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党，HZDS）的斯洛伐克政府，在统治方式上任人唯亲，在经济转轨方面腐败猖獗，黑帮政治行为也时有出现^②，但是这并不妨碍民斯运在 1998 年之前始终保持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③即使 1995 年莫恰尔政府诸多负面行为被大范围曝光之后，在 1998 年的大选中，民斯运得票率依然位居第一。只是由于当时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联盟（SDK）主席米克拉斯·祖林达（Mikulas Dzurinda）成功联合了另外两个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才最终取代了民斯运的执政地位。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其余国家也是如此。欧尔班 2010 年再度执政后，匈牙利的腐败控制状况持续恶化，但是青民盟的执政地位却越发巩固。尤其是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匈牙利投票率创下转轨后新高，青民盟的领先地位也更加突出。在分析腐败对中东欧执政党的作用时，有学者指出^④，作为共产党后继者的中东欧左翼政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之类）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腐败丑闻往往会对这一类政党产生极其巨大的负面作用。这一观点不无道理，纵观中东欧转轨进程，社会党等左翼势力往往因为腐败丑闻黯

① 比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② Tim Haughton, “HZDS: The ideology, organization and support base of Slovakia’s most successful party”, *Euro-Asia Studies*, 2001, Vol.53, No.5, pp.745-769.

③ 参见斯洛伐克大选数据库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rekhlavac/slovak_data_project

④ 马细谱主编：《中东欧转轨二十五年——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67-69 页。

然下台^①，但是作为左翼势力的社会党并非只有共产党后继者这一身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较为发达的社会民主政体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原本就拥有比较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只是由于二战之后共产党的强制合并，才使得原有的社会民主党势力不复存在。转轨之后，原先流亡国外的社会党势力复归本国重新组建，这样的社会民主党有别于共产党的后继党，被称为“历史党”。^②以捷克的社会党（CSSD）为例，作为具有深厚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捷克共和国的“历史党”，捷克社会党原本没有其他国家共产党后继党那样的历史包袱，但是在本国腐败状况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尤其是ANO党2017年正式胜选之后，虽说原本相互对立的两大政党公民民主党（ODS）与社会党（CSSD）都经历了严重的选票缩水，但是社会党损失的选票，要大大多于立场相对偏右翼的公民民主党。对于相应的腐败丑闻，中东欧的选民，似乎总是倾向于因为腐败丑闻而较为严格地惩罚左翼政党，无论它究竟是不是原有共产党的后继者。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深入探究其作用机制。从中东欧本身的特点来说，较高的民族共同体认同和极低的政党认同水准，这种情况总体上比较有利于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迎合本国选民的民族主义诉求。但是，是否因为自身的民族主义诉求得到了满足，进而导致中东欧民众对这类政党有着较高的容忍度？而左翼政党总是因为腐败事件受到选民的严厉惩罚，所谓的历史包袱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抑或是因为在转轨过程中，左翼政党总是更为配合来自欧盟的要求，使得民众倾向于将它们视作欧盟代理人，因而严厉惩罚之？还是因为转轨的过程（以加入欧盟为最终节点）基本上是由这些左翼政党主导推动的，腐败恶化的过程也是在转轨进程中逐渐展开的，故而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总是有充足的理由，将社会的整体腐败归咎于过去执政的左翼

① 参见朱晓中主编：《中东欧转型二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1-193页。

② 金雁、秦晖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91-292页。

党，进而减轻自身腐败事件所造成的压力^①？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带一路”陆上部分的有机构成，中东欧尤其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是我国最终接入西欧的枢纽。我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影响力，在未来必然会逐渐增强，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活动，必须在欧盟内腐败较为严重的中东欧地区内运作。弄清楚腐败在中东欧的发生机制，腐败对于中东欧不同政党尤其是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于我国在当地的政经、文化活动的潜在作用，以及对中东欧民众对中国的观感的影响，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面。

第三个值得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是政治极化问题。对于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本身和民主化进程以及民主政体的巩固密切相关，所以西方学界的研究由来已久。对于政治极化现象的主要分类以及含义，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概括较为全面。萨托利认为，政治极化是指政治舞台上的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出现较大的差距，在具体的政策立场上产生极大的分歧，进而无法协调行动达成一致，或者说政治舞台上产生“反体制政党”。^②一言以蔽之，政治极化，笔者以为可以分为政策立场极化和政体立场极化。这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无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③但是就自由民主制的巩固和发展而言，主要政党在特定政策立场上的极化导致的政治僵局和激烈对抗，虽说也会对自由民主制的运作，和民众对于自由民主制的印象产生消极作用，但是其伤害相较于政体立场极化来得轻微，因为主要政党对于民主政体的存续与否并无歧见。但是政体立场极化的出现，则直接关乎自由民主制本身能否有效存续，而政体

① 匈牙利青民盟 2010 年胜选执政之后，有关总理欧尔班（Orban）的腐败传闻就不绝于耳，但是欧尔班的回应也发人深思：“我本人就算是腐败，难道我比你们以前选出来的领导人更为腐败吗？”。参见 Richard Field, “Is Viktor Orban really the second most corrupt politician in the world?”, 14.01.2015, <https://budapestbeacon.com/is-viktor-orban-really-the-second-most-corrupt-politician-in-europe/>; 也可参见 Attila Mong, David Jancsics, “How the Orban government ‘eradicated’ corruption in Hungary”, 22.01.2016, <http://visegradrevue.eu/how-the-orban-government-eradicated-corruption-in-hungary/>

②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ECPR Press, 2005, p.120.

③ 在野党在重要政策上的立场，一旦为执政党所拒斥，且拒斥立场不作丝毫更改的话，有可能会推动在野党走向试图改变整个政治体制的进路。

立场极化诉求，主要是由反体制政党所提出并力图实现的。因此，衡量一国政治极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反体制政党的存在与否及其主要影响力。无论何种政体，离经叛道者总是不乏其人，自由民主制也不例外。只要特定的反体制政党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和轻微，自由民主制的存续则基本无虞。一般而言，自由民主制政体之下的反体制政党，多为在主流政党之外重新成立的政党，诸如英国独立党（UKIP），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均为这种情况。而这类政党的影响力在多数情况下均比较弱小，充其量只是自由民主制下的有限“杂音”，无法对整个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产生根本的影响。当然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类反体制政党也会迸发出强劲的能量，比如英国独立党对脱欧议题的反复渲染和炒作，迫使执政的保守党不得不采取脱欧立场，而脱欧议题随后撕裂了整个英国政党体系甚至整个英国社会。这样的情况固然是政治极化加剧的表现，但是这依然只是相应议题立场上的极化，而无关整个政治体制的性质。

但是在中东欧，由于反体制政党的出现而导致的政治极化现象，却有一个全新的表现，这就是原有主流政党的激进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当今匈牙利的执政党青民盟。在匈牙利转轨的过程中，青民盟是鼓吹实现民主化的急先锋，现主席维克多·欧尔班也是当时民主化的“弄潮儿”。在青民盟第一个执政周期（1998-2002）中，青民盟的统治风格也几乎完全符合自由民主制的理想模板，在国际民主评级机构的评分中，匈牙利的分数也在青民盟的第一个执政周期中节节走高。就匈牙利政坛来说，青民盟毫无疑问是属于主流民主派。但是 2010 年青民盟再度执政之后，却大步走向曾经的自身的反面。再度执政后的该党全面削弱权力制衡机制，压制反对党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遏制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并因此与欧盟处于长期的冲突之中。为什么青民盟的前后执政风格会发生如此剧变？就匈牙利自身的政权更替过程而言，完全符合“协议转型”^①（Pact Transition）

① 指的是原先极权或者威权政权的掌权势力中的改革-温和派和反对派中的温和派共同联合，通过订立协议设定转型议程，来最终实现整个政治体系的民主化。这一转型模式被认为是最有利于未来民主制的巩固和长久存续。详见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9-21.

的模式：反民主势力的能量和怨气理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和遏制，主流的民主建制势力应当拥有最充足的筹码来巩固民主制，并且将自身也牢牢置于民主规则之中；但偏偏是通过协议进行转型的匈牙利，出现了主流政党的激进化（也可称为反体制化），坚决反对自身曾经大力参与建设的民主体制。

主流政党激进化趋势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整个中东欧的转轨进程。1989年政权更替之际，遍布整个中东欧乃至苏联地区的“民主”呼声，究竟呼唤的是什么？中东欧精英和民众所要求的“民主”，究竟是“民主”的本真，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观察和担忧的那样，夹杂着大量民粹主义的杂音？^①或者换一种表述，整个中东欧的政权更迭和转轨进程，中东欧民众和精英所要求的，究竟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只是想和共产党政权告别？虽说主流政党激进化的最突出例子只出现在匈牙利，但是考虑到匈牙利转轨的特点以及匈牙利本身所处的转轨排头兵位置，其案例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既然青民盟的激进化战略能够取得成功，其余国家的执政党为了保住权位自然会考虑起而效仿。同时，青民盟的案例也为我们进一步考察中东欧政治生态和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中东欧，由于整个政治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中东欧政党多数是所谓的“蝌蚪党”。^②这类政党缺乏完善的组织，主要依赖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手段，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称之为政党，而主要应当被视为是领导人的竞选工具。除了前共产党的后继党之外，中东欧地区拥有比较完善组织体系的政党着实很少，但是青民盟却是一个有着比较严密和完善组织体系的政党。根据现有的研究，从地方组织体系、中央组织能力以及政党中枢对于议会以及政府中党员的掌控来看，青民盟称得上是一个严密且完善的现代化政党。^③组织严密的政党对于领导人个人野心的施展，是具有相当约束作用的，领导人很难纯粹按照自身意愿行事。要知道，在匈牙利的转轨进程中，青民盟也是积极要求民主和推动转型的，在第一个执政期内又是完全按照自由民主制的标准履行统治职能，其自身定位应

① Wolfgang Merkel(eds.), *Systemwechsel, Theorien, Ansätze, Konzeptionen*, Leske und Budrich, 1994, Tom.1.

② 意指政党没有广泛且深入的地方组织，只是依靠主要领导人和中央机构进行活动。参见金雁、秦晖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第327页。

③ Margit Tavits,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12-213.

当是自由民主建制派，其成员也应当是支持自由民主制的。但是 1998 年之后，欧尔班推动青民盟的意识形态转型，逐步在青民盟内部建立起了自己的一言堂；同时青民盟的意识形态定位，也迅速转为反自由民主建制的民族-民粹主义保守派。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欧尔班并未在青民盟内部领导层受到强有力的抵制，也未曾见到青民盟党员形成有效的反抗行动。青民盟从上到下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欧尔班的意识形态定位改造，对于欧尔班在野和在朝时期对自由民主建制的挑战，青民盟也是全方位提供配合。这就不由得让我们进一步深思，作为拥有完善组织架构的自由民主建制派政党，青民盟内部为何无法对欧尔班本人形成有效的约束和遏制？究竟是欧尔班本人的政治手段高超，还是民主诉求在中东欧自由民主建制派政党内部也并未真正扎根？

五、结语

进入新千年以后，中东欧国家入盟诉求陆续得以实现，在诸多学者和观察家认为中东欧转轨进程即将告成之际，波兰法律与正义党上台，中东欧极右民粹和激进右翼势力掀起了一波剧烈的回潮，其势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有增无减。虽说所谓的“民主转型范式”，在西方学界内部也已经受到相当的质疑乃至否定^①，但是即使转型的模式受到质疑乃至否定，在西方学者看来，中东欧的转型作为一种迈向自由民主制的尝试，其本身依然是成功的。但是中东欧国家出现的这种趋势，毫无疑问地表明，中东欧的政治发展陷入了某种“困境”。西方学界将中东欧政治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形容为“同性困境”；我国学者秦晖则将其进一步形容为一个“考古挖掘的堆积面”^②，积累了各个层面所存留的遗迹，每一步发展都是“负重而行”。应当说，这是一个恰如其分地比喻，中东欧的历史自主发展进程屡次被外力打断，其自身的历史演进有着明显的外力强加痕迹。但是，所强加的外力无法在根本意义上消弭中东欧历史演进的自身色彩。一个社会的制度组成可以被区分为正

①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1, pp.5-21.

② 金雁著：《从东欧到新欧洲，二十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既有的研究已经指出，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往往比正式的制度约束更为本质，更为深刻，更加难以改变。^①就中东欧而言，其所有的正式制度约束往往是外力所强加的结果，无法从更深刻的层面上反映中东欧社会民众乃至精英的实质性需求，故而往往更为脆弱；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则是其自身社会发展和演进的结果，因此更能够体现出民众-精英的实质诉求。中东欧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即使在苏联阵营的高压控制之下，中东欧国家内部的“萨米兹达特”文化也十分昌盛^②，从未消亡。笔者在西方学者和秦晖教授的比喻基础上，尝试再作进一步阐发：由于缺乏历史进程发展的连贯性，中东欧的历史进程发展就像是一条被截为几段的蚯蚓，每一段都有自身的生命力和活性；因此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很难确定具体的事件会触动哪一段的“敏感神经”，进而引发特定的反应。这并不是说经济因素不重要，只是由于中东欧具体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破碎性，经济因素的作用机制会受到多重扭曲，其效力的作用方式更为复杂和多样，难以直接确定。

综上所述，结合中东欧自身历史发展的特点和现实中的实例，对于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势力的兴起和发展，社会-文化因素具有比经济因素更为强大的解释力。经济因素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和具体的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其作用机制受到多重的扭曲和限制，难以较为直接地被确定和观察。

无论是激进右翼还是极右民粹，其诉求的重要根基依然在于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形态，根据国家和民族形成次序的先后，有学者将民族主义区分为国家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③；也有学者根据民族主义中“民族”一词的具体界定特点，将民族主义区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④文化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都是指民族形成于民族国家之前的情况，由于国家独立的缺乏，这两种民族主义都具有比较明显的排外性，中东欧的民族

① [美]道格拉斯·诺斯著：《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② Samizdat，指中东欧国家在苏东阵营统治时期的地下印刷所和出版物，主要内容为宣扬自身民族文化，抨击苏联和苏联支持下的本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政策。

③ 李寒梅著：《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一章第二节。

④ 叶礼庭著：《血缘与归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主义无疑符合这两种情况。同时，由于中东欧国家独立的时间更短，缺乏实质性独立（即国家命运基本不受外力干涉决定的情况）的时间更长，中东欧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也更为突出。转轨以后，外资的大量涌入使得中东欧民众感慨“坦克”（Tank，意指苏联的军事控制）走了，“班克”（Bank，意指西方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掌控）来了。^①这种情绪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牢骚，但是考虑到中东欧自身的特点，其内含的深层次诉求不容忽视。长期缺乏独立之后就被迅速卷入全球化进程，这种发展历程使得中东欧民众的无根感和不安全感，远较西欧民众来得更为强烈。也正因为如此，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在选举中能够有更为强势的表现，甚至直接成为执政党。

根据已有的研究，决定一国政党之间的对立和具体政治运作的，是一国在具体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冲突线”（Social Cleavage）。^②中东欧学者据此梳理出中东欧社会在转轨之后所形成的五大“冲突线”^③：（1）新、旧特权阶级之间；（2）贫、富阶层之间；（3）自由普世主义者、民族传统保守主义者之间；（4）亲欧盟、疑欧派之间；（5）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之间。既有的研究指出，任何民主社会都无法避免冲突线的存在，但是只要一个社会的冲突线能够彼此交叉，就能够舒缓社会的对立程度，保证民主制的稳固和存续，避免出现社会对立的加剧。^④但是结合中东欧近年来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及其历史轨迹，中东欧的社会冲突线，越发集中于自由普世主义亲欧盟势力和民族主义保守疑欧派之间，亦即，究竟是遵循中东欧各国自身的传统，还是继续选择外加的模式。依照前文所述，中东欧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比之于西欧同类显得更为“年长而传统”，似乎其吸引力应当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人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⑤，中东欧的年轻一代思想更

① 金雁、秦晖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第三章。

② Stein Rokkan, Seymour Martin Lipset, *Party System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③ Jan Vecernik, Petr Mateju, *Ten Years of Rebuilding Capitalism. Czech Society after 1989*, Prague: Academia, 1999.

④ [挪]斯坦因·U.拉森主编：《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十九章。

⑤ 金雁著：《从东欧到新欧洲——二十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67页。

为开放和多元，那么在文化价值观立场上持保守倾向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理应在年轻一代中获得较少的共鸣，但是情况恐怕并非完全如此。根据波兰民意调查机构（CBOS）的调查^①，在 2015 年波兰议会大选中，年轻人群（18-29 岁）投票总数的 25.8%选择了法律与正义党（PIS），只有 14.6%的年轻人选择了更为自由主义的公民纲领党（PO）。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年轻人中获得了最大份额的支持，虽然并不居于绝对多数地位。同样的例子还有匈牙利的尤比克党（JOBBIK），该党在匈牙利年轻人中广受欢迎。可以说，基于文化-种族民族主义，力主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具有强烈排外色彩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诉求，在中东欧各个年龄段人群中都广受欢迎。中东欧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计划连接欧亚的关键枢纽，我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近几年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越发得势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我国不成为这些势力所针对的对象，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因为经济因素作用的次要地位，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的项目提高了中东欧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准和社会福利水平，就诸事大吉了。如何能够通过论证和宣传让中东欧民众乃至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势力相信，我国的投资、我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绝对无碍于这些国家自身民族传统的存续，是一个值得细细探讨的课题。现今这两股势力主要的针对目标，依然是欧盟以及获得欧盟支持的本国建制派精英。我国暂时还不会进入这两股势力的“视野”，但是这种缓冲地带还能够存在多久，恐怕很难确定。为了“一带一路”计划的顺利推进，需要尽快研究对策，做好准备。

此外，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自由民主制传统较为薄弱的国家，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更为强势，排外性更为明显；而自由民主制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这两股势力的实际力量则相对有限，其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也更为自由主义和多元化，比如捷克的海盗党（CPS-České Pirátské Strany）。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类民粹主义政党就无碍于我国“一带一路”事业的推进。捷克海盗党自 2018 年下半年布拉格地方选举获胜并夺得布拉

^① CBOS: “Elektoraty PO i PiS w ostatnich dwunastu latach”, *Komunikaty z badań*, 130/2017, 2017.

格市政领导权之后，反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加强与我国各种分裂势力的联系，最终导致了布拉格-北京之间姐妹城市关系的终止。^①深刻把握中东历史发展特点，了解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文化遗产，并灵活应对各种民粹主义势力的活动和诉求，是我国“一带一路”计划在中东欧顺利推进并成功打通亚欧大陆连接，必须面对的课题。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ultimate appeal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CEE) should be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istenc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whether according to the CEE countries'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or the acceptance based on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f the EU countries. However, after the “golden age” in the 1990s, populist forces in CEE countrie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especially the Visegrád Group (referring to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Poland) which was once the leader of the transition. Populism not only rose but also took power, successfully carrying out the so-called “anti-democratization” operation. Meanwhile, the influences of radical right-wing in CEE has also increased. For the rise of these two, there have always been two major explanatory aspects: economic factors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already analyzed their practical roles, but considering the realit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EE since the Cold War, it is obviously more effective to explain in the ligh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main western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radical right-wing in CEE, pointing out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shortcomings, as well as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adical Right-w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entral and

^① Ian Willoughby, “Beijing ends Agreement with Prague – but can spat harm Czech Capital?”, 10.10.2019, <https://www.radio.cz/en/section/curraffrs/beijing-ends-agreement-with-prague-but-can-spat-harm-czech-capital>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конеч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создание и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либераль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заявки стран на членство в ЕС или их принятия на основе надзора и контроля со стороны ЕС. Однако после «золотых лет» 1990-х годов популистские силы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возросл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когда-то являвшаяся авангардом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Вышеградская группа (Венгрия, Чехия, Словакия и Польша), популизм не только возрастает, но и приходит к власти, успешно проводя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ую операцию «обрат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лияние правых экстремист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также возрастает. Рост этих двух тенденций всегда объяснялся двумя основн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существует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роли обоих факторов, однако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развитие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факторы, очевидно, 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 в объяснение этих тенденций.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предпринята попытка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и обобщить основ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анализа западными экспертами популизма и роста правого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указать их вклад и недостатки, а также возмож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альнейш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пул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прав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соц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地方·地区研究

“地方性”视角的中东路事件 ——基于地方史料的研究*

宋铁勇**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东路事件前，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地方化”历程与空间上的动态伸缩，使人们逐步形成了“地方”意象和“地方中心主义”观念。其“地方性”表现在“地方”的去政治化、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和社会秩序主导力量等方面的特征。“地方性”视角下的中东路事件，打破了人们既往的“地方意象”，降低了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经济关联与辐射作用，主导地方社会秩序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客观上，起到了去地方性的作用。然而，当时中国一方去殖民地化的努力归于失败，国家主体性在“地方”的创设未能达成，造成了中国政府在“地方”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全部被弱化，并且给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造成了极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事件后“地方”的殖民地化程度加深，社会秩序动荡，民众生活陷入困境；苏联的军事进犯，伤害了中苏两国民众的情感，文化交流被阻断，其商业倾销政策阻碍了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动摇了以铁路经济为中心的地方经济基础。

【关键词】中苏关系 中东铁路事件 中国东北 苏联远东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6-0176
(33)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28）、长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项目编号：CSCXB201700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 宋铁勇，长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讲师。

一、引言

所谓中东路事件，是指发生在 1929-1930 年中国因收回中东铁路主权及其附属利权，而与苏联爆发的外交及军事冲突事件。

“中东铁路”乃“中国东方铁路”之简称，又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是沙俄赤裸裸侵略中国的产物。1896 年沙俄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之际，威逼利诱中国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并获得了独自铺设东清铁路的权利。该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分北部干线（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南部支线（哈尔滨-长春-旅顺）与其他支线，呈“T”字形盘踞在东北大地。1905 年，沙俄因在日俄战争中败北而将该铁路长春至旅顺段转让给了日本，称南满铁路；其他线路仍在沙俄手里，仍称东清铁路。1920 年起东清铁路改称中东铁路，协议由中苏共同经营。自 1922 年起，中国与苏俄/苏联反复商谈收回中东铁路主权事宜，苏俄/苏联政府故意拖延。1928 年东北易帜后，伴随着国内“收回主权运动”、“革命外交”风起云涌般展开，当时的英、法、美等列强均在口头上表示支持中国的行动，唯有分别攫取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路权的苏联与日本断然拒绝回应。中东铁路本系中苏共管，但苏联却将中国排斥在外，独占路权。是时，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的管理模式、权益分配、中方收回的方式等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中东铁路问题上升为中苏关系的主要矛盾。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采取了强力措施回收中东铁路主权及相关利权，从而爆发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对当时、之后和今天的东北亚局势、中苏（俄）关系、中日关系，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社会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其所具有的国家性、全局性乃至世界性意义毋庸置疑。故自事件爆发至今，国内外学界对该事件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目前所见的该问题研究多从国际、国家与大的国际性区域层面着眼，多探讨和反思事件发生经过、结果及其影响。然而，仅通过这类宏观、总体性的研究，往往会遮蔽事件的“地方性”缘起，以及地方军阀外交和军事职能对于国家和中央政权的危害，忽略地方所承受的巨大损失，更难以发现事件背后所隐含的“地方性知识”，进而模糊事件研究所适用的尺度空间，错失了多样性、多元化的地方性视角。

基于中苏史料的比较，对中东路事件之地方性进行研究，发现不仅身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中国人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情绪，而且，苏联一方在事件初期，号召并动员苏联工作人员举行大罢工，也没有得到大部分苏联人的响应，甚至有部分员工随白俄人一同归化中国，成为中国的俄罗斯族一员。究其原因，“地方性”被嵌入整个事件过程之中，在个别时段曾经超越政治权威与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作用，而强化了“地方”内的社会关系，在地方居民为维护生存权利、表达和平愿望的诉求下，形成了一股反政府的地方动员力量，并迫使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两败俱伤”的军事冲突来解决问题。因此，探讨中东事件之“地方性”影响，是研究该事件前后中国东北边疆在面对殖民政权、国家威权和市民社会时的反应与变迁的重要理论进路；也对地方性与民族主义交汇时国家主体性如何创设，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观察中东路事件过程中地方性的演变与社会动员及对地方社会秩序和利益的影响，对当代中国边疆地方治理仍具有现实意义。

二、中东铁路“地方性”的形成

从中东路事件经过和解决的方式看，中国一方以东北地方当局为主，中央国民政府始终没能有效干预，苏联政府也未主动与国民政府接触，而是仅仅保持着与东北谈判代表沟通的单一联络渠道。短短几个月，事件由中苏两国外交冲突而激化至边境战争，成为两国国内最为关注的热点事件，又以东北地方当局单方面妥协而迅速解决。其中，固然存在军阀长期割据、地方外交传统之惯性使然，但探究深层次原因，还应充分挖掘“地方”在该事件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地方社会”的反应与行动。

（一）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地方意象”

“地方”，是能够被人们感知、并形成同质化认知的时间与空间综合体。彼时，作为“地方”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之于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地方意象。

从中国政府治理视角看，它专指东省特别区。1920年3月，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辞职，由中方鲍贵卿督办铁路事宜。10月2日，中国政府交通部与俄亚细亚银行^①签订《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明确中东铁路“完全为商办，与俄国新旧党绝无政治上之关系。”^②继而，从国际共管委员会手中收回了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主权，和参与铁路管理、监督的行政权力。同年10月31日，东北地方当局颁布《东省特别区法院编制条例》，设立了东省特别区，并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承认，管辖范围主要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域，该区的设立是中国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重要一步。至1923年，始设置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按照省一级建制进行行政职权和机构添设。彼时，“东省特别区之机构与官吏，只市政管理局之组织规章是由北京中央政府公布施行，局长、副局长由北京中央政府简派，高等审检两长由北京中央政府任命，余皆由东北地方自派，盖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停，我国接收天津德、奥、俄各国租界，汉口德国租界，皆组设天津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及汉口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接收管理，东省收复路权事起中央与地方商定，遂沿天津、汉口之例设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至局长、副局长作为简派亦系与津汉一致，此为东省特别区名称之缘起。”^③该特别区设置的目的和目标很明确，就是一步步将中东铁路的路权、行政权、警察权、裁判权和公共事业管理权收回。但是东北地方政府在经济方面无所作为，尤其是无法支付原由铁路拨款的各项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所需经费，而在铁路沿线未能动摇中东铁路在地方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在中国地方居民看来，它主要为铁路经济辐射区域。铁路及其附属事业在铁路沿线区域及整个北满地区占据核心地位，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生业依附于铁路经济。自中东铁路敷设后，“北满经济历史可称萌芽，良以北满土地肥沃实为天然绝大农场，不仅与世界商务未有联络，与内地商场，未有交易已也。铁路既通，各种新事业得此发达之媒介，内地人民移居屯垦者，络绎不绝，而又因俄国政府与修路线及经营殖民之故，流入之资本，为数颇巨，

① 前俄道胜银行，总部迁往巴黎，受法国政府保护。

② 华企云：“中东铁路概论”，《钱业月报》，1929年第9卷第9期，第3-4页。

③ 黄曾元：“东省特别区建置丛读”，《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06页。

一方地方生产物，则得逐渐运售于远东俄国阿穆尔辽远之地。……铁路建筑以来，北满全境百业勃兴，其成效显著者，尤推农业，由是向称广漠荒芜之区，一变而为农事兴盛之地，地方经济之根基既固，工商各业之发达，殊未有艾也，夫自农业之兴，遂使与世隔绝之满洲，不数十年而为国际市场竞争之焦点。……农业之继续发达，不特地方上工业实业随之而进步，即内地市场凡百事业，亦莫不蒙其利益。”^①中东路事件前，中东铁路之地位与情形，“与国中各路不同，盖内地各省水程四通八达，货物泰半由水道运输，故地方企业与铁路之关系犹小。若东省则地广人稀此市与彼市相隔恒数百里，故虽亦有代舟楫之车马，然既不能载大宗之重量，又不便跋涉远程，所有运输遂咸群趋于铁路。故如东省特别区全境及其附近数十百里内与东路几成相依为命不可分离之局。斯该路之一举一动，事事与地方发生休戚关系。”^②“从前铁路交涉局官员大都仰鼻息于铁路当局，虽东省特别区设立并次第收回行政权于我，然经济力之所在，犹未免多所迁就，一般迁足沿线之华人，亦觉路局之命令如王言般。积习所存未易朝夕变革。”^③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大肆向铁路沿线倾销苏联商品，打击中国民营资本，事件前所形成的铁路经济与地方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不复存在，中东铁路在地方民众心目中的核心地位和经济影响力也有所减退。

在苏（俄）人看来，它涵盖铁路附属地、铁路各站及苏（俄）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中东铁路的全线贯通，标志着铁路本身与其附属事业以及附属地在经济和行政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尤其是铁路沿线各站的城镇化进程，促使俄（苏）行政手段作用于地方社会，并以经济文化优势支配地方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实际等同于俄（苏）在华之殖民地。“苏联人虽未打算永久居住在哈尔滨和铁路沿线地域，但因为中东铁路公司所支付的高工资和各种福利而将其视为最佳选择，而意识到已经失去‘祖国’

① 佚名：“北满之经济（附表）”，《经济科学》，1928年第2卷第14期，第142-144页。

② 佚名：“丛谈：东铁运输与北满企业之衰落”，《铁路协会会报》，1924年第142-144，123页。

③ 佚名：“东省铁路对华策略之观察”，《铁路协会会报》，1925年第148-149期，第85页。

和‘故乡’的多数白俄人，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是其移居的唯一选择”^①。彼时，俄国十几万移民的“‘唯一主脑’为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学校、医院、农场、俱乐部等无一不为中东铁路所设，除铁路所有物外，实已残留无几。”^②中苏共管铁路后，苏联对外标榜“中东铁路管理局向以增高铁路价值及改良建设两大目的积极从事各种新设施。苟其措置有利于路，即费巨款亦在所不惜。”^③“其以经济笼络官吏、策士、商民正不知其所至极也。”^④苏联同时视中东铁路为其意识形态宣传媒介，在铁路沿线组建了工会、共青团、共产党支部等组织加强宣传，而原有白俄的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与之相抗衡，这种对抗成为当时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国东北局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学者阿瓦林第一次尝试将苏联殖民地的苏（俄）人群体细分为白俄的无产者、白俄有产者、事件后新调入铁路系统的专家，以及事件后被赋予苏联国籍的原白俄移民。虽然，苏联政府在中东路事件前后，着力对在铁路沿线生活的白俄移民进行驱逐或遣返，但是因为与中国交恶之原因，导致白俄受到中国的保护而与所谓“赤俄”能够在铁路沿线共存。对于白俄人而言，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各项事业，既是生计的保证，也是生命财产安全和基本政治权利的保障。

对于日本人而言，它几乎等于整个北满地区，即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北半部，也是苏（俄）人营建的“特殊法域”^⑤。中东铁路让渡给满洲国之前，俄（苏）在北满地区将中东铁路干线及其军用、矿物资源运输和其他商用支线辅线同远东地区的海参崴等海港组成了三位一体的交通系统，促进了铁路

① 阿基纳科·雷吉纳：《1920-1940年代の満洲におけるロシア人と日本人の「満洲経験」に関する思い出：1920-1940年代の満洲において居住したロシア人と日本人の回想記の比較研究》，大阪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申請論文，2016年，第27页。

② 佚名：“东省铁路对华策略之观察”，第85页。

③ 坡格列别次基：“中东铁路五年来之营业”，《中东经济月刊》，鹿鸣译，1930年第6卷第10期，第79页。

④ 佚名：“东省铁路对华策略之观察”，第87页。

⑤ [日]麻田雅文：“日露戦争前後における中東鉄道収用地の形成と植民計画：満洲における特殊法域の誕生”，《史学雑誌》，2010年，第9期，第1493-1524页。

沿线城市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理想的’、‘卓越的’殖民地空间。”^① 中东路事件后，日本势力大肆北进，最终迫使苏联以低廉的价格将中东铁路让渡给了满洲国。彼时，日人总结俄国敷设中东铁路时，工程甚巨，开辟了大量北满之荒地，此外多年来铁路维护及各项设施添置之费用亦不在少数，俄（苏）经营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事业的过程即北满开化之过程。^② 铁路沿线地域之森林、矿产等富源，大片未开垦之荒地等资源，若为大量日本移住民所利用，将解决日本人口过剩问题，东北交通经济如渐次为日本所垄断，沿线粮食、工业原材料来源将更为广泛，日本商品市场得以扩张，有望尽获满蒙开发之利益。如能驱逐苏联势力，将全面统制满蒙经济和军事防御，在日本国家立场和大量移住民观念中，经济收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性都将增强。^③

总之，中东路事件之前，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事业对铁路沿线地域的经济统治力和社会影响力，使地方政府与居民及其相关利益群体对其形成了极强的依赖性。1928年，“东北易帜”，加速了中国政治一体化进程，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成为时代主题。在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创设国家主体性，势必打破人们已经形成的地方意象，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语境及去殖民地化背景下，在这一“地方”创造国家主体性、保有并强化该“地方”主权的应然之举。中东路事件后，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均发生了一定变化，其地方意象也因中东铁路在地方行政和经济影响力的下降，而产生了消极的转变和负面的认知。

（二）“地方”之空间属性

关于“地方”，除了地理维度的表征外，还具有行政管辖权限范畴和经济辐射维度的界定。地方居民的感知也往往建立在生产生活空间的界限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① 阿基纳科·雷吉纳：《1920-1940年代の満洲におけるロシア人と日本人の「満洲経験」に関する思い出：1920-1940年代の満洲において居住したロシア人と日本人の回想記の比較研究》，大阪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申請論文，2016年，第27頁。

② 横山又次郎：“東支鐵道の成行”，《地學雜誌》，1936年第48卷第5期，第200頁。

③ 工藤武夫：《滿鉄調査資料第075編・我國人口問題と滿蒙》，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調査課，1928年，第177-178頁。

1. 地理空间：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

1896年中俄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次年俄国开始敷设中东铁路，到“1903年，中东铁路竣工通车时，铁路主干及各支线总长3189公里，107个车站。”^①1905年，日俄战争后，战败的俄国将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主干和支线及其沿线附属企业财产悉数让渡给日本。中东铁路南线仅剩哈尔滨至宽城子（长春城北）一段。让渡给日本的铁路线路，后被称为“南满洲铁路”，也标志着俄日两国将中国东北地区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实行殖民地控制的开端。是时，中东铁路西南三线分别以满洲里、绥芬河、宽城子为终点，其中“由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之由西向东线路总长1483.78公里，哈尔滨至宽城子南向线路长238.46公里；另包括各类公用和私人企业之铁路道岔各为186.74公里和421.79公里，中东铁路总长为2330.77公里。”^②同时，俄人曲解铁路合同章程，在铁路沿线肆意强占强购土地。吉黑两省为规范俄人行为，又分别与中东铁路管理机构签订《铁路展地合同》。依据合同，将铁路沿线土地分为熟地、荒地、水地三等，无论官私产权，均需给价租购，仅“哈尔滨一埠经先后三次展地即占用10300余华垧（每垧十亩）。”^③到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确系中东铁路地亩处、民政处管理的附属地为：“中东路西南三线，共占用162443华垧。此外，全路长期租地1245华垧；全路短期租地5591华垧；公用地亩，系该路历年应公共法团之请，如教会、学校、邮局、海关、义冢等类，免费拨给，用为建筑用地，全路共计312华垧，此项地亩，既系免费，又无年限；自列用地，系铁路敷设直接占用及其营业必须地亩而言。除哈尔滨一埠外，中东路西南三线铁路用地32185华垧。”^④共计约212076华垧，约占1414平方公里土地。

① Чапыгин И.В. Русск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в полосе квжд(период xvii – начало xx в.)// 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древн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2014. №3. С.58.

② 国立北平研究院：“调查：（二）全国铁路状况调查：中东铁路”，《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1年第2卷第1期，第17页。

③ 清埜：“中东铁路的概况及其由来”，《清华周刊》，1934年第11-12合刊，第192页。

④ 佚名：“中东路占地亩详情”，《津浦铁路月刊》，1930年第1卷第2期，第223-226页。

中东铁路附属地，相比于中国东北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面积而言，虽仅占 0.1%左右，然而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地广人稀，随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建造经营而来的移民却占比极高，又因中东铁路不仅在附属地内享受司法、警察、税务等专权，亦对其员工及家属按其属人原则享有民政自治等权限，使得附属地实际上还存在着动态的辐射与关联功能。按照俄人的统计，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的辐射作用，在 1911 年以后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时，“中东铁路主干线路每一公里就会拓展出 467.9 平方公里的生活区，铁路及其附属企业运营过程中所拓展出的生活区面积已经达到 606587 平方公里。”^①可见，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无论是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域这一“地方”，还是在东北北部地区都位于中心位置，是人们感知空间的首要概念和事物。

2. 行政空间：东省特别区

依据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中东铁路为商业性质企业，因此，中国对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享有国家主权。然而，在之后的大量附属合约中，东北地方当局向中东铁路管理机构让渡了大量经济、行政、民政和公共事业权利，以致其逐渐发展成为拥有高度自治权限的“国中之国”。虽然，曾趁 1917 年俄国国内发生苏维埃革命之机，收回铁路管理权，但终因国力不济，而又使苏联承继了俄国在此享有的特权。这一特权之地的存在，严重伤害了国人的利益和情感，东北地方当局为争取中苏合办铁路，于 1923 年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域规划所谓“东省特别区”，设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图以此制衡苏联势力。该特别区在规划时，即以中东铁路各重要站点为核心展开，其中，中东铁路附属地被包含在特别区内，约占特别区面积的五分之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在东北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控制下的新空间。

特别区先是筹设市政管理局，对全区的行政管理进行统筹，并于“长春、张家湾、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昂昂溪、安达、满沟、绥芬河、穆棱、横道河子、一面坡各处设置分局。”^②然后，允许各地方申请设立市乡，

① Чапыгин И.В. Русск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в полосе квжд(период xvii – начало xx в.)

② 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所属各市政分局编制章程”，收录于《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章程辑览》，1929 年。

地方人口满 1 万者，可申请设市，不足者可申请设乡，将原本受俄（苏）人员控制的公议会改组为中国委员居多的自治临时委员会（如表 1）。

表 1 东省特别区自治团及监督机关系统表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市政管理局长	哈尔滨市自治临时委员会	以委员长一名，委员四名组织之。其他各站相同
		各站市政分局长	满洲里市自治临时委员会
			绥芬市自治临时委员会
			海拉尔乡自治临时委员会
			博客图乡自治临时委员会
			昂昂溪乡自治临时委员会
			横道河子乡自治临时委员会
			富拉尔基乡公议会（因为华人组织而未改组）

资料来源：先用：“东省特别区收回自治政权”，《太平导报》，1926 年第 16 期，第 14 页。

特别区通过成立华洋诉讼所、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设五分区，各有总署、分署、派出所）^①、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署、地亩管理局、教育厅，颁行《东省特别区不动产法规》^②等一系列举措，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渗透到了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村屯、工商业组织和公共领域之中。但是，在铁路员工诉讼、撤销苏籍护路军、清查中东铁路地亩、整顿金融币值、铁路收益由中苏分别保存等问题上，苏方坚不让步。加上中苏双方对旧俄人员竭尽争取之能事，中方甚至大量归化旧俄人员，以对抗苏方不允许旧俄人员在铁路工作的规定。随着矛盾日深，东省特别区的行政手段无法打破苏方在铁路自留空间内的区隔与界限，苏方人员在中东铁路公司辖下，仍然享有独立司法权、路警权、减税优惠，甚至向外转租大量土地以牟利，使铁路公司成为东省特别区内最大的地主。再有，特别区内的电报、电话等通信设施和技术掌握在苏方手中。这就导致东省特别区内存在大量的特权界限和技术壁垒无法打破，从而无法有效地实施行政职能。

① 徐墀：“东省特别区域主权恢复始末记”，《东方杂志》，1923 年第 20 卷第 12 号，第 52-55 页。

② 王咸一：“东省特别区土地租借问题之过去”，《中东半月刊》，1932 年第 3 卷第 4 号，第 20-21 页。

3. 经济空间：铁路经济辐射区域

中东铁路名义上属商办性质，即经济是其重要属性。据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调查所得，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轴心，呈丁字形，沟通北满全境。北满幅员辽阔，计 100.8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 1289.5 万，与铁路毗连之经济区包括（见表 2）：

表 2 中东铁路毗连之经济区域统计表

区域类别	面积（万平方公里）	人口（千人）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呼伦贝尔	19.5114	75	0.38
齐齐哈尔区域	19.3673	480	2.48
安达区域	7.7311	1950	25.22
哈尔滨区域	3.03	1550	51.15
松花江下游区域	8.6826	1400	16.12
扶余区域	4.0932	915	22.35
东铁南线区域	2.6488	2165	88.41
东铁东线区域	5.3566	765	14.28
共计	70.421	9300	13.21

资料来源：佚名：“北满一带之牧畜及东铁改良该业之设施”，《东省经济月刊》，1929 年第 5 卷第 1 期，第 19 页。

附注：根据东省铁路民国十六年统计年刊，连同索伦一并计入，但按照阔尔马佐夫所著述的《呼伦贝尔》一书，记录呼伦贝尔之面积为 15 万平方公里。

中东铁路西线，自满洲里至哈尔滨站，横亘黑龙江省。按天然物产及收运货物区分，可将这一线分为极西草原牧畜区、中央林业区域和东部农业区域。东线，自哈尔滨至绥芬河，铁路横贯东部诸山，牡丹江、穆稜河、海林河、蚂蚁河等流域山间平地，亦悉经开垦，故物产颇丰饶。南线周边农产富饶。另外，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对接大连、海参崴两个国际性港口，使北满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能够与亚欧各国紧密连接。其中北满“豆类出口赴日本者计有半数，其余一部分散于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亚洲各市场，一部分输往英德及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地以制油。小麦主要行销于中国内地、俄国远东及日本。畜产方面，绵羊 1100 万只、马 350 万匹、牛 500 万头，骡亦不在少数。购买可供食用之牲畜产品则为海拉尔、满洲里等地，而大宗牲畜交易则在甘珠尔庙每年八月下半月之集会。除在北满

各地就近出售外，还有部分通过铁路销往内地市场和俄国各地。林业产品方面，兴安岭之森林地带主要出产木柴、落叶松枕木、电线杆及矿坑所用之支柱。松花江下游林区出产建筑木料、木柴等较多，但销往国外较少。矿产方面，金矿并其他各类矿物等无所不有，较富集的为煤炭、石灰及建筑石料。仅能保障北满地方和铁路用煤量的半数，另一半则主要从南满进口，少量进口于俄国西伯利亚。实业则以哈尔滨及傅家甸为中心。”^①中东铁路之所以在“地方”享有极高的权威和影响力，与其经济关联和辐射作用密不可分。

（三）“地方”的历史变迁

如前所述，“地方”在空间上的伸缩，呈现出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对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辐射作用。身处其间的人及人与人，人与土地、政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地方社会的核心脉络。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主要缘于中苏对于中东铁路控制权的争夺，争夺的背后实际上是对铁路沿线地域及其相关利权的控制。中东铁路自运营以来，一直是地方经济的生命线，更兼有对地方民生的保障。因而，事件过程中，与铁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员工、家属及大量民众，无论国籍为何，大多没有表现出对于政府的支持；相反，一再表达对于破坏铁路运营行为的不满，并以实际行动来保障铁路正常运行，甚至主张中东铁路作为企业应具有“中立”身份，俨然将中东铁路视为自己的“家园”。所以，中苏双方旨在争夺的这一“地方”，是如何演变为“铁路人”的物质与精神寄托的，还需要从“地方”的历史变迁来观察。其中，尤以移民、教育、医疗卫生的发展最能反映这一“时间”、“地方”与“地方社会”的演变历程。

1. 移民与“地方社会”变迁

中东铁路的铺设及其沿线地域的土地开垦、森林采伐、矿产开发，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吸引了大量中国人来此谋生，移民活动未有间断，只是在中东路事件过程中，移民势头才稍有放缓。与中国人一样，由于俄（苏）将中东铁路沿线地域视为其海外殖民地，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以

^① 东省铁路经济实业事务局：《东省铁路与东省铁路之沿带区域》，哈尔滨：商务印书局，1924年，第19-30页。

及生活空间的相对优越，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也招徕吸引了大量俄罗斯移民。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前，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俄罗斯移民潮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中东铁路修建，所招徕的大量工人及其家属；第二次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反苏维埃的俄国贵族、官员、商人和边境地区躲避战乱的一部分农牧民大量迁居中国；第三次是1924年后中东铁路确定中苏共管原则后，苏联政府向中国派出的大量公职人员及其随行家属。其中两次移民都与中东铁路直接相关。“到中东路事件结束时，中国东北地区已经有苏（俄）移民11万人。”^①伴随着铁路业务的发展，铁路沿线地域也逐渐营建了大量城镇、村屯，促进了“地方”的繁荣。

“1903年，中东铁路竣工通车时，铁路总职工数达39112人，其中俄国人18123名，中国人20948名，其他欧洲人17名，日本人17名，朝鲜人9名。铁路总价值约5亿卢布。”^②哈尔滨在俄国人积极的营建中，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水路运输便利，以及周边阿什河、双城子、拉林、呼兰等农业区充足的粮食供给，很快成为中东铁路乃至西伯利亚铁路的枢纽，也是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1907年，哈尔滨人口就已超过45000人；“铁路西线工作人员及其家属15970人，包括满洲里5577人，扎赉诺尔1428人，海拉尔4375人，博克图2767人，扎兰屯1643人，到1910年，西线人口上升到17061人，占当时呼伦贝尔全部人口的30%以上；铁路东线7127人，其中铁路工作人员3305人；南线729人，有503人为铁路工作人员。”^③截止到中东路事件发生前，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34万（参见表3），西线荒凉之地，人口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7.8万（参见表4）。

不仅哈尔滨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化都市，而且以沿线各站为中心，还建成了大量中小城镇，农业和畜牧业区还出现了许多村屯、农场、养殖场、农艺园等设施。电灯、电话、电报线路的铺设，也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优越感，在城市以及工矿企业陆续出现了近代化的社区。

① ГАХК. Ф.830. Оп.1. Д.218. Л.3-6.

② Чапыгин И.В. Русск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в полосе квжд(период xvii – начало xx в.)

③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ВЖД. Харбин, 1922. С.621.

表3 1929年6月东省特别区人口国籍统计表

国籍	人数	占总数百分比
华人	236751 (哈 97776; 沿线 138975)	69.5
俄人 (苏联及无籍者)	95235 (哈 57121; 沿线 38114)	27.9
日本人	3261 (哈 2683; 沿线 578)	1.0
朝鲜人	2685 (哈 949; 沿线 1736)	0.8
欧洲人 (俄人除外)	2604 (哈 2141; 沿线 463)	0.8
共计	340536	100

表4 中东铁路西线各站人口数

(1929年6月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统计数据)

国籍	户数	男性	女性	人口总数	每户平均人口数	女男比例
华人	13392	49145	22679	71824	5.3	0.46
苏联人	1052	2485	2167	4652	4.4	0.87
无籍俄人	399	806	876	1682	4.2	1.08
日本人	43	75	54	129	3.0	0.72
朝鲜人	60	117	110	227	3.7	0.94
欧洲人 (俄人除外)	36	74	55	129	3.6	0.74
共计	14982	52702	25941	78643	5.2	0.49

数据来源: 秋山: “最近中东铁路沿线一带之人口 (续)”, 《中东经济月刊》, 1930年第6卷第10期, 第11页。

表5 东省特别区1928-1930年户口增减总数表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户数	中国	42833	48582	53884
	苏联及白俄	25537	20692	21720
	其他各国	2378	2362	2272
	共计	70748	71636	77876
人口数	中国	220666	247288	250724
	苏联及白俄	95345	87169	84172
	其他各国	8994	8834	8750
	共计	325005	343291	343646

数据来源: 佚名: “东省特别区历年户口增减总数表”, 《东省特别区市政月刊》, 1931年第6卷第11期, 第101页。

虽然中东路事件给地方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以事件前后东省特别区户口增减为例 (参见表5), 铁路沿线地域整体上人口变化不大, 甚至有所增

加。显然，即使两国军事冲突激烈，局势不稳，人们为了追求稳定的收入和富足的生活以及各类公共福利保障，仍未对中东铁路失去希望和信心。

以农业服务为例，中东铁路铺设期间，粮食供给基本要依靠俄国国内和中国其他地域供给，俄国农民只少量集中在“三河地区”，中国农民也只是开垦了少量农地，产量偏低。随着中东铁路的运营和土地开发，大量农业移民到达铁路沿线地域，租种土地，才缓解了铁路的粮食供给问题，但距离形成规模性农业经济还较远。为了巩固中东铁路在“地方”的经济统治地位，“1912年中东铁路将俄国满洲农业协会收归旗下，开始在中东铁路沿线设立各类农作物实验室，并在哈尔滨和铁路沿线学校及村庄向学生和中俄农民传授农业知识，在铁路车站附近的作物园和园艺区进行实践培训。……满洲农业协会与中东铁路地亩管理局合作，将俄国农民和中国农民一同纳入耕地分配制度中，对分到耕地的农民进行为期1-3年的跟踪培训；对现代技术装备，如拖拉机、农用机车驾驶进行短期技术培训；并且讲授农业经济管理知识；提倡用科学方法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以移动图书馆的形式在铁路沿线分发种子和育种材料，将那些经营有道的农庄、果园、养殖场、畜牧业基地的经验，整理总结并向铁路沿线农民传播。……1922年，中东铁路理事会还斥资10.2万金卢布，在哈尔滨及其周边建立了三个农业试验园。……1922年起，满洲农业协会开始着手实施定期教育规划，旨在整合中短期培训、技术科学研究和学校教育，以此培养更多的农业技术专家，直到1927年，该协会被并入满洲研究协会为止。”^①该协会在中东铁路管理系统内，为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1917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后，许多在此协会工作的农业专家以及协会培养的技术人员，纷纷加入中国国籍，继续为中东铁路沿线的农业研究和农民教育贡献力量。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域，也出现了中国第一批机械化的现代农场，到中东路事件发生前，拖拉机在中东铁路沿线已经广为人知，并在满洲农业协会的培训下，已经有第一批中国农民熟练掌握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操作技术。彼时，中东

① Белоглазов.Г.П. Русские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научная-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ая и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усских экономистов и учёных-аграрников, как фактор влияния на модернизацию апк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хх столе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инновационная наука». 2017. №.3. С.44-45.

铁路管理局旗下的地亩管理局、农业协会、农业部、商业局、哈尔滨理工学院以及其他机构都参与了这项农业科普教育活动，对于吸引中俄两国农业移民起到了重要作用。苏（俄）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农业教育蓬勃发展之际，1928年，在哈尔滨开办了中国的一所农业学校，填补了满洲农业协会裁并在“地方”农业教育领域留下的空白。

移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有大量铁路工人、矿山工人、伐木工人、渔民，以及大量从事生产和生活性服务的手工业者、商人、教师等。“地方”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促使地方社会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与之相协调，随之而来的是，地方文化也呈现出多元融合与调适。起初，俄国人与中国人聚居区泾渭分明，但伴随着工作互动、商贸往来，以及铁路公共福利事业的展开，加上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加入中国国籍，使得中俄居民相互的文化学习、借鉴现象越来越多，在饮食、节庆、婚娶、建筑、宗教、艺术、传媒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深入；城市内的剧院、影院、公园、图书馆、报社等文化设施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融合的媒介，彼此人口聚落的界限也越发模糊，强化了“地方社会”的整体性和内部成员关系。

2. 铁路学校与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除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外，移民对于中东铁路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铁路及其沿线地域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东铁路运营后，俄国教育部即开始在铁路沿线的俄国人聚居区建立学校。除此之外，铁路附属企业也纷纷为员工子弟建立学校，为中俄两国适龄儿童和少年提供就学机会。在俄国人的带动下，也为了防范俄国人大量同化中国人，东北地方当局也积极在主要城镇创办了多所现代化学校。其中，位于铁路沿线地域的学校大多受中东铁路资助或由中东铁路直接管理。“到1917年俄国国内革命爆发之前，中东铁路管理机构在铁路沿线筹建了10所小学，12所一贯制学校，最多时曾有3036名学生在校学习。……1924年，确定了中苏共管中东铁路原则后，苏（俄）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学校由教育机构委员会和高等特殊教育机构委员会共管，其中教育机构委员会主要负责联络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资助和日常管

理。”^①苏联政府为了降低白俄在铁路沿线的影响力，规定苏联籍学生和铁路员工子弟必须在苏联人开办的学校学习，并在“1925年将以‘霍尔瓦特’命名的铁路学校改名为‘中东铁路第一学校’。在1928年，确定与中国共管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同时将其更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即今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到1931年，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域，中苏合办了各类学校29所，其中包括11所初级学校、11所二级学校，1所幼儿园和6所寄宿制学校。”^②虽然苏联收回了很多以前铁路自办学校的管辖权，但仍然留用了大部分以前的实际管理人员和教师。因此在意识形态教育上，铁路沿线学校的学生并没有被灌输“共产主义”理论，很多学生甚至并不知晓“共青团”“少先队”“共产党”的意义，也没有被强迫高喊口号和对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因此，学校除了增设了几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外，其他教学课程和形式与之前白俄移民开办的学校并无二致。苏联人和白俄人在铁路沿线能够和平相处，且教育理念想通。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课程仅仅设置了常识性、通识性的课程，所占课时量较少。到“1930年初，苏（俄）人开办的学校在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已经达到75所，其中43所在哈尔滨，32所在沿线各站附近，最多时有17583名学生在读。”^③期间，“苏（俄）移民在铁路沿线地域创办了超过250份杂志、报纸和其他刊物。”^④不仅有专业的科研学术读物，还有大量文学艺术类和通讯类纸媒体，开阔了地方居民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以上教育文化事业的开展，主要缘于中东铁路的资助，也是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成果，一方面强化了地方居民对于中东铁路的依赖感，另一方面统筹了地方社会的发展方向。然而，上述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成为阻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理念在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传播的主要因素。客观上，麻痹了广大中国居民的国家主体性意识，并且将身处

① Мелихов Г.В.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925-1932).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7. С.82-87.

② Погапова И.В. Русская школ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898-1945 годы: монография. Хабаровск: Частная коллекция, 2010. С.89-91.

③ Михайлов С. Школа и жизнь (на 1931 год)// Политехник. Sydney Australia. 1979. №.10. С.127.

④ ГАХК. Ф.830. Оп.1. Д.218. Л.20.

于此的苏（俄）人与其他苏联人区别开来。

3. 铁路医疗系统与地方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中东铁路能够吸引移民、强化民众认同的原因，还在于对铁路员工、乘客和沿线居民的医疗卫生保障。“在 1897-1903 年中东铁路修筑的五年间，在哈尔滨站、海拉尔站、博克图站修建了三所医院，加上其他各站医务室，共有 759 个床位和 23 名医护人员。到 1903 年底，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共有 8 个门诊科室，216 个床位。”^①1903 年，中东铁路正式组建铁路医疗服务队，不仅针对铁路职工进行医疗服务，同时也面向中俄居民提供公共医疗服务，对防控铁路沿线地域 1910-1911 年发生的鼠疫、1919 年的霍乱，1920-1921 年的瘟疫起了主要作用。1922 年，苏联政府派出专业医疗管理团队，全面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医疗设施和人员，决定按照其国内原则，对铁路及其附属企业职工以及火车乘客、沿线贫苦难民等急难患者实行免费治疗制度，不对国籍做任何歧视性区分。并且自 1923 年开始，引进并允许中国医生进入铁路医院工作。1921-1924 年，铁路医院的医生组建了医学研究协会，在哈尔滨创办了医护学校和医学专门学校，并且在 4 年间出版了 13 期《医学先驱报》，开启了中东铁路关于公共卫生保健教育与研究领域的科学工作。1924 年，中苏共管铁路原则确定后，苏联将中东铁路视为其国有财产，对整个铁路系统内的白俄移民进行清洗，并在医疗系统开展医疗保健事业改革，免费诊疗制度被取消，大量医护人员不得已选择了离开，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留下加入苏联国籍。为了补充医护人员短缺，苏联将国内医学院学生大量派往中东铁路。同时，为了安抚中国一方的情绪，将中国医生伍连德任命为新的医疗系统主任。到 1929 年中东路事件前，铁路及沿线地域的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过渡到苏联政府掌控之下；事件期间，医疗卫生系统停摆；事件后，医疗卫生系统人员构成主要为苏联籍医生和护士，“在 1930 年 621 名医护人员中，有 469 人为苏联籍，全部 54 名医生中，仅有 4 名中国医生。到 1934 年，苏联已经着手准备让渡中东铁路，开始有计划地撤离工作人员，

^① Полетика М.И. Общий медицинский отчет по постройке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СПб., 1904. С.25-26.

医护人员减少了超过 50%，而中国医生人数增加到了 22 人。”^①

从 1924-1935 年间，以中东路事件为节点，苏联政府将医疗卫生系统原本对中东铁路及沿线地域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逐步剥离，侵蚀了“地方”福祉，这也成为地方反苏的原因之一。

三、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与经过

中东路事件以东北当局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为导火索，1929 年 7 月 10 日南京政府与东北地方政府议定完全收回中东铁路为开端，至当年 12 月 22 日签订中苏《伯力协定》（草约），结束敌对行动止，历时五个多月。

1929 年 7 月 10 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会议，讨论东北外交问题。会议决定收回中东铁路，驱逐所有俄籍之共产主义者的方针，并立即实行。当月 17 日，苏联政府电告苏联驻日大使馆，正式宣布对华断绝国交，召回铁路所有苏方职员，驱逐中国驻苏外交人员，并断绝中苏间交通。“18 日，苏联将驻哈尔滨领事馆大楼和财产移交给德国驻哈尔宾斯托巴领事，并促请德国政府和在华机构保护其撤出公职人员，德国驻华机构成为中苏联络信息的唯一孔道。”^②22 日，蔡运升与苏驻哈领事梅里尼可夫进行接触，商讨事件解决之策；24 日，张学良致函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提出希望尽速解决中东路问题并互相释放所拘侨民。8 月 2 日，东北当局得到加拉罕的回函，提出因未得到中方任命苏方正副局长的承诺，拒绝了张学良的提议。

苏军于 8 月 13 日开始大规模犯我边境，先是攻击绥兰东兴镇，16 日攻扎赉诺尔、满洲里，18 日攻绥芬河。期间，苏联国内媒体歪曲事实，大肆渲染，指军事冲突系由中国军队伙同白俄暴徒挑起，并强调中东铁路已经瘫痪，派军队进驻中国是为了帮助中东铁路恢复运营。但实际上，中东铁路干线始终保持着运行，只有边境各站因战事而停摆。到 8 月下旬，苏联攻击稍

① Ратманов П.Э. История врачебно-санитарной службы китаг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1921-1935 гг.)//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медицинский журнал. 2009. №.3. С.126.

② Кротова М.В. Конфликт на квжд 1929 г.: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естник РГГУ.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2013. No.11. С.85-97.

缓，但拒绝他国调停和南京政府的会晤请求，只保留了东北地方代表蔡运升和梅里尼可夫的联系渠道。9月26日，苏联驻大连领事向西伯利亚铁路管理局报告：“铁路职员、教师和其他由铁路预算支出负担工资的人员都选择了自动离职。铁路运营暂未受到很大影响，苏联一方也并不需要主动承担维护费用。只有铁路工人的辞职，对铁路影响最大，工程师、机车组等人员减少仅15%左右。‘此外，还有人告知称，工程师并不支持铁路员工的辞职和与白俄员工的斗争政策，反而公开举行会议，颁布临时解决法令，要求中国解雇所有妨碍和平的工会会员。’”^①1929年10月1日，苏联驻大连领事乌斯特里亚洛夫写给苏弗钦斯基的信中也提到：“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罢工策略宣告失败了。很明显，中国人在白俄员工的配合下，已经完全控制了整条铁路。不仅中国和白俄员工没有主动辞职，就连大部分苏联工人也没有理会罢工号召。”^②是时，苏联通过号召罢工而促成铁路停运的措施并没有起到作用，苏联重新获得中东铁路控制权仅剩武装占领这一路径。

此后，苏联加紧向中苏边境地带及松花江流域进攻，同江、富锦之役与扎赉诺尔、满洲里之役，中方损失最巨。^③黑龙江省多地被苏军攻破或占领，东北边防部队已无战胜之机，只得派出蔡运升再次与苏联代表接洽进行停战谈判。12月初，蔡运升与苏方代表西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谈判数日，商订各方之停战条件并签署备忘录，定明在伯力正式会谈，再在莫斯科会谈，最后在北京换文。^④当月6日，张学良及东北当局接受苏方停战条件。12月22日，在告知南京政府的前提下，以蔡运升为全权代表的东北当局与苏方代表签订了中苏《伯力协定》（草约），结束了中苏边境的军事冲突。

中东路事件的收场，是因“东北边防军两度失败，损失惨重，张学良被迫不顾南京方面的反对，单独与苏联订立了城下之盟。此举虽令南京不满，

① АВП РФ. Ф.146. Оп.12. П.138. Л.175.

② Устрялов Н.В. Письма к П.П. Сувчинскому, 1926-1930. М. Дом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им.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2010. С.56.

③ 正江：“从中东路事变说到伯力会议”，《健行月刊》，1930年第2卷第2期，第63-72页。

④ 蔡运生：“伯力交涉始末记”，原载《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收录于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三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568页。

蒋介石终因顾虑到关内逐渐形成气候的反蒋风潮，而不得不曲予承认。”^①

《伯力协定》内容公布后，南京政府与全国舆论皆称之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协议，因此拒绝完全承认该协定。但由于协定签署和执行均为东北地方当局，出于尽快恢复和平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协定内容得以有效执行。

1930年元旦，包括正副局长在内的苏方工作人员回到了工作岗位，以1929年7月10日为界限，恢复或弥补苏方的损失。中方大批战俘和被拘平民、商贾得到释放并返回国内安置。在之后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双方最终仍未有效解决分歧，也未能订立正式协定。

四、中东路事件后果的“地方性”影响

中东铁路的经济文化影响力，形塑了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这一“地方”的社会空间。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不过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②“地方性”正是以地方居民对于空间和其间社会关系变迁的特有感知而呈现的。彼时，当地居民对于中东铁路经济作用的认同和对其民生保障的依赖，使地方社会关系形成了对中东铁路经济权力绝对服从下的中俄（苏）文化融合和适应的地方性特征。无论是中国居民还是苏联籍居民抑或白俄居民，在面对中苏两国政府对中东铁路主权及相关利权的争夺时，坚持彼此拥有共同的认知，共同的命运，着力强化中东铁路的特殊性以及“铁路人”的特权，使中苏两国政府对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行政管理效力极大下降，独立性表现得愈发明显。因此，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以及之后中苏武装冲突的升级，都证明了事件前越来越稳定的“地方”社会关系，巩固了中东铁路公司在铁路沿线地域的中心地位和核心权力。显然，中东铁路公司规避中国东北地方当局的行政管理在法理层面无任何依据，在国家主体性不在场

①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第三版·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0页。

② [法]列斐伏尔著：《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收录于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的情形下，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更应视作俄（苏）的殖民机构和殖民地。因此，当东北地方当局强行将中国国家主权意识注入地方社会关系之中时，“地方性”就发生了显著改变。这种改变集中体现在，中东铁路在铁路沿线地域的经济核心地位，被中苏武装冲突和之后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倾销政策所动摇，证实了中东铁路公司在铁路沿线地域营建的特殊“经济文化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该地方创造国家主体性相抵触。而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地方当局的失败，使中东铁路和边境各地遭受重大损失，也反过来证明了政府的政治、军事行动需要地方的全面支持，只有具备主导地方经济实力和有效保障民生的政策与行动才可能获得民心。同理，苏联一方以意识形态强加于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举动，也难以消除“地方主义”影响，反而在事件过程中遭到了来自自己方的对抗和抵制，一度失去了对铁路公司的控制。

（一）中东路事件造成的损失与铁路经济影响力下降

就“地方性”影响而言，中东路事件使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原有的经济影响力下降，弱化了地方民众对铁路的经济依附关系；部分教育、医疗、文化设施关停，造成公共资源短缺，又进一步分化了地方居民社会关系的整体性。

首先，中东路事件中，中东铁路本身承受了巨大损失，运费收入锐减，出口贸易线路阻滞，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海关税收损失极大，发生战事的边境城镇人员和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依官方数据，中东路事件后，东北当局设立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所得（参见表 6）：共计各项损失 1.756 亿元之巨。^①此外，苏联强占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拒不撤兵，以致成为日后中苏（俄）边界悬案，直到 2004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国才收回其一部分领土主权。在中东路西线满洲里、扎赉诺尔附近，苏联屡有挪动界碑、界牌，侵占边界我方一侧领土的举动。^②

① 中东路事件损失调查委员会：“中俄战争之损失调查”，《中东经济月刊》，1930 年第 6 卷 第 4-5 期合号，第 18 页。

② 王恒升：“黑龙江省庐滨县附近中俄国界记（附图）”，《地学杂志》，1931 年第 19 卷第 2 期，第 172 页。

表 6 中东路事件各方损失调查

各类损失	折算金额 (万元)
黑龙江沿岸	1679.7446
满洲里附近	3580
海拉尔	3110
中东路工程	210
中东路停运	60
防俄军第一军	700
防俄军第二军	370
扎赉诺尔煤矿	500
海军	75.3
船舶	565.4592
东北航务局	42.018
总计	17560

表 7 1927-1931 年中东铁路货运情况

年份	数量 (单位: 吨)	收入 (单位: 金卢布)
1927 年	4920343	44774262
1928 年	5474140	46588438
1929 年	5749756	55572730
1930 年	4319540	40759157
1931 年	3930508	35411954

数据来源: 哈尔滨满铁事务所编: 《北满概观》, 汤尔和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第 73 页。

注: 1930 年中东铁路理事会规定金卢布每一元合哈洋一元三角。如哈洋行市低落时, 得提高至一元五角。参见佚名: “币制消息-中东铁路规定哈洋与金卢布定价”, 《中央银行旬报》, 1930 年第 2 卷第 7 期, 第 13 页。

表 8 1927-1931 年中东铁路营业收支情况 (单位: 金卢布)

年份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相抵所余收入	新事业费	纯收入
1927 年	60043247	35229969	24813278	5736072	19077206
1928 年	64711030	40239241	24471789	7383384	17088405
1929 年	64415761	32760832	36654929	4416403	32238526
1930 年	69921502	28629187	21292315	1252971	20039344
1931 年	40541612	22415906	18125706	472031	17653675

数据来源: 哈尔滨满铁事务所编: 《北满概观》, 汤尔和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第 77-78 页。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 铁路运力下降极快。受战事影响, 大部分运输业务

和附属事业萎靡不振，向西与苏联断绝了贸易往来，向东与乌苏里铁路联运中断，所有输出货物运输皆舍东而南行，整个下半年中东铁路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在 1929 年仅仅上半年的货运和营收情况竟然好于相邻的几个年份（参见表 7、表 8）。苏联在 1928 年开始实行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带成为其进出口的重要通道，整个北满地区成为其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原料产地和货物倾销市场。而同年，东北易帜，开启了北满地区与南满及内地经济一体化进程，鼓励北满以外的中国资本、劳动力、新技术以及文教娱乐等事业进入中东铁路沿线地域被提上日程，尤其以招徕关内移民开垦农地、鼓励商贾发展工商业为紧要。这就与苏联在延展经济空间边界上，产生了方向冲突。苏联要向北向西将掠夺或低价收购到的工业原材料从中国运回国内，向东与国际海运市场联系起来。而东北当局主要向南与中国国内市场融合，希冀通过中国主导的资金流、信息流、劳动力流等，抵制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和影响。这一矛盾的激化，直接促使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其次，事件发生在中东铁路经济收益最好的年份，即便受到战事影响，其收益仍然高于之前和之后若干年份，因此中东路事件的发生有着两国争夺经济权益的直接动因；同时，也有与民争利之嫌。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在哈尔滨设有消费合作社及苏联商务处，直接隶属于苏联国际贸易局。借助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区位优势和中东铁路的交通优势，苏联利用经济手段，将廉价工业原料或制品以及纸烟、纺织品等消费品，向中东铁路沿线地域倾销（参见表 9），使得苏联重新占据了中东铁路沿线市场。在铁路沿线，“苏联国营贸易，在 1929 年中苏武装冲突前，资本 50 万以上之商店计 11 家，20 万以上者 16 家，遵守地方法令，年纳市捐及各项杂税，总计 90 余万元。冬季之苏联煤炭临时收捐，犹不在内。自战事发生，中间停业数月，及伯力会议记录签字，前项各商店均次第复业，而煤油公司等，挟其国营贸易资力，来哈新张设业者，又有十数家。苏联煤油、石炭等迩来之销售遍于东省。苏货之畅销在日本视之，亦谓为与其满蒙经济策划冲突，且因苏联煤布均已攫代日本位置，因视俄为劲敌。”^①

^① 佚名：“苏俄在北满竞销煤油石炭”，《矿业周报》，1930 年第 93 期，第 719 页。

表9 中东路事件前后苏联倾销北满货物比较

品名	单位	1930年		1929年		1928年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细布	疋	529	1384560	1759	2232038	4063	3828701
花标	疋	173070		269994		411991	
其他棉布	码	52182		44367		103315	
卡丹丝	哥	2489	6222	19572	62628	13860	385780
麻织品	码	55192	33115	94406	96376	24130	23675
羊毛	担			488	19821	977	30046
海产物	担	17150	343853	13731	385757	33085	777165
纸烟	千支	35019	117294	2233	47023	10121	23956
挥发油	加仑	369720	292844	409515	368189	508979	300719
石油	加仑	2617412	1504425	1149462	588486	2574040	889237
机械油	加仑	588566	343719	84783	62006	537047	269079
毛皮	张	36188	47044	78306	144790	75191	248710
枕木	根	214206	171364	1354	1609		
柴	担	90191	29763	32161	11256	148088	59235
煤油	吨	343557	4005437	105925	1707921	189897	3714754
玻璃片	平方尺	52800	4035	610	65		
水泥	担	10825	14502	28630	55677	73824	208959
火柴	哥	36636	15628	41424	25625	8086	6185
衣类			73649		78443		141263
农业机械			122740		68168		8187
其他机械			20788		39455		29056
铁道材料			15445		16856		137903
木材	千平方尺	7730	233831	1664	82676	12190	570194

资料来源：后起：“苏俄倾销政策与我国北满(附表)”，《社会杂志(上海1931)》，1931年第2卷第4期，第1-5页。

1930年“进口苏俄商品总额为700万元，入口商品以棉麻织物为大宗，其额为250万元，次为矿油及煤炭各150万元，再次为木材75万元，余为杂货，惟至入正以后，铁路沿线财界在于菱微沉滞之极度，加以金价迭涨，银价续跌，满民购买力较前大减，市面萧条，华商之倒闭者接踵而起，俄品销路遂受打击，本年1月至3月进口货品，只得120-130万元而已。综观各方今后之商情，以煤油煤炭、洋灰、铁板、鱼类、棉织品等最有希望，俄之煤油与美产竞争激烈，棉麻制品为其独占之物，进口商品中，以俄之铁板，

为最有希望，而俄之玻璃及煤炭，价格低廉，他国货品不能与其竞争。”^①然而，观之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中国所属实业荒废颇多，修复艰难，倾销政策实则苏联经济权力施于中国的手段措施而已，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等权力手段对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侵害并无二致，压制了中国自办经济产业的上升势头，苏联也利用该手段迅速夺回了社会经济权威地位。但于中苏两国居民而言，铁路仅剩交通运输功能，其经济文化辐射与关联作用受到苏联倾销政策的严重限制，民众获利极少，无法再依靠铁路经济保障自身生产生活的稳定性，铁路在人们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力被降至历史最低点。

（二）去殖民地化与去“地方性”的路径差异

彼时，东北当局希望引发的“地方性”改变，是将国家主权意识植入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社会关系之中，希望通过去殖民地化，实现将中东铁路所有权限收归东省特别区，继而真正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整体性控制。中苏在边境地区武装冲突的规模扩大，并非双方解决事件的主要选择。东北当局甚至未做战争动员和充足的战争准备，它想要的是正本清源，利用其自身认为的合法手段，如驱逐苏方管理人员，来根除中东铁路沿线地域的殖民地特征和这一“地方”的自治权限。这与中东铁路在“地方”长期代替了国家、政府和法治机构，形成了“去政治化”之“地方性”有直接关系。然而，中东路事件的结局，却反映出“去殖民地化”与去“地方性”在路径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表面上，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将是去殖民地化与去“地方性”一劳永逸的做法。但从事件发生后，东北当局的一系列做法和最终解决办法看，东北当局的目的，更多地是想要降低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特殊地位，使其服从于东北地区的“整体性”，至少实现北满地区的政治一体化。这并未脱离军阀割据、独占东北的思维。其实，消除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地方性”，并彻底驱除苏联政治军事势力，才是去殖民地化的基本逻辑。但东北当局却将去殖民地化，作为其去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地方性”的手段和宣传工具，本末倒置，无奈只得接受失败的结果。总结其原因，东北当局

^① 佚名：“北满苏俄商品进口之繁盛”，《中行月刊》，1931年第2卷第9期，第94页。

收回中东铁路的举措，并非要打破特权空间，而是想要更换特权主体，扩大自身特权空间至整个东北地区。对于遵循“生计原则”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仍然是被统治阶级，而且用规章制度、法律规范来取代苏式“特权”并未能明显改善民众生活。因此，东北当局在发起事件前，没有充分向中国居民释放消除特权的信号，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失去了民众和地方性基础，使事件成为两个政治势力集团抢夺铁路及其沿线地域控制权的争斗。

中东路事件前，在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社会秩序中的职业等级体系对“地方”影响最大，是其“地方性”的重要表征。中东铁路和沿线农地、牧场、林场、矿山、金融机构、工商业企业和教育医疗卫生组织等社会实体中工作的苏联人和旧俄人，因职业能力和技术而获得在地方社会的优势地位，从而引发中方质疑苏方在中东铁路管理上“用人不均、事权不均、待遇不均”，并最终以此为理由发动了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政府为缓和中苏紧张关系，在铁路附属企业和公共事业等组织中的用人和事权上，做出了适当让步；加上大清洗后，苏联大量新入职员工的技术能力和经验较低，使其职业等级体系扁平化，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一结果也客观上起到了“去地方性”的结果，但也再次强化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的殖民地属性。中东路事件后，苏俄商品在铁路沿线地域骤然增加，东北当局有鉴于此，特制定倾销货物税法于1930年2月9日公布。该税法之要点是，对于廉卖之外国商品，以该货价格与国产同种货物市价之差额为课税标准。然而，因需让步于中苏莫斯科谈判，此项税法并未严格执行。中国所属实业极为低迷，东北当局对苏联商贸政策的推行多有让步，而转由中国商会与其倾销之策直接对抗。“1930年2月以后，该年度之输入总额曾有1033.6407万海关两^①之报，然计数尚有过少之憾。根据1931年各种统计而论，总额为1328.2417万海关两(不包括南部线之额)。据时人对1924-1931年苏联输入满洲货物额和输入全国货物总额比较，平均每一年度输入满洲货物额都超过总额80%，且有苏联货物独占北满市场的倾向。”^②苏联在中东

① 民国时，海关一种计算关税的虚拟记账式货币单位，中东路事件结束后，该计算单位被“海关金”代替。

② 厚吉侯：“苏俄倾销政策与中俄贸易之前途-附表”，《国际贸易导报》，1933年第5卷第1号，第66页。

铁路政策的变化，强化了对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企业的控制，破坏了原有铁路经济的区域关联带动效应，阻碍了北满区域经济发展。事件发生后，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社会秩序即陷入混乱，边境居民纷纷逃往内地，以避战祸。以绥芬河为例，“1929年7月份，事件爆发时，有华人960户，3370人；俄人（包括苏联及无籍者）1010户，4620人。到伯力草约签订的12月份，人口锐减，仅剩华人301户，670人；俄人681户，1341人。”^①呼伦贝尔甚至发生了民族分裂活动。然而，整个事件过程中，中东铁路仍保持着正常运营，职工人数也未出现很大波动。在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工作的人口动态却不减反增：中国籍白俄人数增加了大约2000人，大多数苏联公民仍留在原地工作。1929年6月，苏联公民11177人，中国人11603人，白俄1163人；同年12月，中东铁路雇用了8195名苏联人，16877名中国人，3340名白俄人。”^②这一人口变动情况表明铁路经济的持续运转，使得中东铁路的直接雇员能够得到铁路的继续庇护和获得生活保障，而间接相关民众则不得不另谋生路。可见，中方“去殖民地化”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但客观上起到了“去地方性”的作用。战争的破坏力打破了地方间区隔，苏联的商业倾销政策破坏了以铁路经济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基础，侵夺了地方民众权益，加剧了地方恐慌，破坏了多数民众对于中东铁路的经济依附关系。

（三）苏联意识形态控制与中东铁路大清洗

虽然苏联通过军事力量侵入中国，全面控制了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但是以这种破坏性手段攫取的“地方”权益，并未能长期保有。在之后的几年中，随着日本军事压迫和铁路自身经营困境的加剧，使得苏联不得不将中东铁路控制权拱手让与日本人扶持的“满洲国”。彼时，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是中国对铁路及其沿线地域去殖民地化与苏联殖民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地方”在这一矛盾冲突中，不仅没有参与东北当局去殖民地化行动，也没有表现出对于苏联殖民化的支持。事件后，苏联不得已将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殖民地类型从原有的殖民与掠夺混合型，调整为商业倾销型。

① 佚名：“一月来之边疆”，《时事月报》，1930年第2卷第2期，第106页。

② РГИА. Ф.323. Оп.5. Д.1243. Л.11.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中东路事件对于苏联一方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大部分白俄人完全倒向了中方，而与苏联彻底决裂。因为随着铁路修建，俄国文化携经济、技术、军事、政治等优势来到这里，将其文化价值强行注入地方定居文化之中，形成文化高地，开始广泛影响地域文化交流内容，促成了俄国文化为中心的多元文化体系。苏联接管中东铁路后，苏联文化价值与俄国传统文化价值在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产生激烈冲突，文化价值取向的分野给这一地域空间带来了剧烈动荡，最终导致苏联对中东铁路员工的大清洗。彼时，苏联国内认为：“苏中冲突，暴露了身在中国殖民地的苏联公民思想意识上的极大差异，其中，大多数在中东铁路工作的苏联员工虽表面上是‘红色’的，但内心却是‘白色’的；他们在事件初期，急于与苏联政府撇清关系，有些人甚至不惜放弃苏联国籍。军事冲突后，苏联政府对中东铁路员工进行了大清洗，仅支持那些经过考验和审查的老员工，全面更新了铁路管理部门、工会、共青团、共产党组织，并且拒绝起用那些‘专家’级员工。”^①这也造成了这一部分人不得不步白俄人后尘，倒向中国政府，成为中国公民或流亡海外。更为严重的是，大量解雇员工，使得中东铁路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1930年1月起，苏联从国内聘请了152名高级管理人员（年薪至少2400卢布），但他们大多很年轻，缺乏工作经验；到1934年10月，上述152人中仅有31人还留在中东铁路工作，其他人都因无法胜任其岗位而不得不回国。”^②“冲突后，1930年1月时，中东铁路有员工25473人（其中苏联人8277人，中国人13656人，中国籍的俄罗斯人3540人）。苏联为了削减开支，实行裁员政策。一年后，包括临时工在内，铁路员工还剩19107人。”^③通过比对员工工资表，发现原来的管理人员中有462人被解雇，整个铁路线路上的员工，有5453人被辞退。^④而这种辞退或解雇是需要向其支付养老金和一定福利金的。到1931年，中东铁路虽然在陆续偿还被解雇员工债务，但是仍然还有700万卢布的债务，其中包括293.0363万

① Кротова М.В. Ситуация на КВЖД после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1929 г.// Вестник ЛГУ им. А.С. Пушкина. 2014. №.3. С.220.

② РГИА. Ф.323. Оп.11. Д.445.Л.56.

③ РГИА. Ф.323. Оп.5. Д.1254. Л.1.

④ РГИА. Ф.323. Оп.5. Д.1254. Л.27.

卢布的福利金。^①到 1932 年 5 月 1 日,需要偿还给被解雇者的各项费用累积到 779.1 万金卢布,而当时整条铁路的价值也不过 907.4 万金卢布。^②冲突后,中东铁路的经营长期难以为继,不见起色。最终中苏之间的“鹬蚌相争”,被日本所利用,日本攫取了中东铁路乃至整个中国东北的控制权。

五、结语

中东路事件结束后,呈现出几个社会性结果。第一,没有被遣返回苏联的白俄人,开始主动进入中国社区,努力成为“中国人”;第二,从事与铁路运营直接相关职业的人口有所增加,但铁路经济关联性产业人口下降幅度较大,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第三,中国民众对于东北当局的不信任,没有影响到国家主体性意识在广大中国民众中的认知和传播,伴随着铁路经济规模的缩减和苏联在铁路沿线地域的商业倾销,人们传统的“地方”意象被打破,对于中东铁路的依赖感降低,民族国家主体性意识有所加强。

纵观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地方化”历程,在中东路事件前,该“地方”有其强烈的“地方性”表达,使人们逐步形成了“地方”意象和“地方中心主义”观念。“地方性”表现在去政治化、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和对社会秩序的主导上。去政治化,即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的殖民地属性,排斥了中国政府的主权性干预以及行政控制;1917 年以后,面对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输入而采取了“无政府主义”式的消极抵制。区域经济中心地位,是指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在铁路经济的关联带动下,对周边区域经济产生了较强的辐射功能,使得区域整体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有更多经济保障。中东铁路公司对“地方”社会秩序的主导,则缘于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城镇、村屯、移民社区、公共设施的建设发展,与中东铁路的发展有直接因果关系,民众不仅物质生活方面要依附于铁路经济和公共福利,而且精神生活方面也寄托于“地方社会”的文化发展成果。因此,可以将中东铁路看作是地方社会整合和“地方”空间整合的共同媒介。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在空间和时

① РГИА. Ф.323. Оп.6. Д.537. Л.175.

② РГИА. Ф.323. Оп.5. Д.1042. Л.150-151.

间两个维度的伸缩，对于不同群体有其不同的“地方”意象。中东铁路的铺设及其运营，形成了产业与人口的双重集聚效应，打破了传统的以村屯、集市为主要聚落的人口结构，转而建立起了以铁路枢纽、车站、煤矿、森工企业以及为其提供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的城镇为核心的人口聚落体系。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线路，为人口和资本的流动规划了主要方向和节点。就中东路事件之地方性而言，在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这一“地方”内，不同人群的国家 and 民族认同虽然存在很大差异，内部也不具备同一性，但是在中东路事件这一政治情境中，却存在着维护中东铁路经济中心地位与保持社会秩序主导权的相同诉求，即“地方中心主义”观念。中东铁路运转的历史时间和辐射地域空间的不断扩展，使中东铁路在“地方”的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都超越了社会传统规范和政府规制的权威性。中东路事件中，无论是铁路经济文化的潜移默化，还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入，抑或东北当局的行政干预，都对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独特经济文化特征和自治制度等地方性知识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构成了威胁。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打破了人们既往的“地方意象”，极大地降低了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经济关联与辐射作用，主导社会秩序的力量被严重削弱。

国家治理视角下，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国一方的正义性以及当时苏联对中国在东北主权的侵犯早已有了定论，不容置疑。中苏间铁路主权与附属利权等核心国家利益冲突，是中东路事件爆发的主因；去殖民地化是中国发起中东路事件的主要目标，结果则以失败告终。主要缘于事前、事中未能关注到“去地方性”是去殖民地化的必要路径。去地方性就是要在“地方”平衡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在社会领域中的功能和关系。任何一项权力或权力关系失衡，都可能出现“地方性”表达。于“地方”而言，有利有弊。然而国家主体性的缺失和“去政治化”的表现，必然造成地方与中央的对立，破坏国家法治根基，使国家权力难以在地方治理中伸张。反之，国家依靠强制力输入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权力，缺乏对于地方经济区域一体化、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引导和保障，也会造成地方对于国家政策的消极抵制。如今，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存在着“地方性”的表达，附着着中俄两国人民共同的记忆和想象。中国人民不仅要牢

记被侵略被殖民统治的耻辱，也应理性看待中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地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吸引物功能，讲好这一“地方”故事。

【Abstract】 Before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Incident in late 1920s, China Eastern railway, the “localization” course of areas along the railway and dynamic expansion of space gradually led people to form the image of “locality” and the concept of “localism”. Its “localism” is embodied by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locality”, the centrality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leading forces of social order.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Inci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ty” broke people’s previous “local image”, reduced the economic correlation and radiation effects of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and areas along it. The power, which dominated local social order, was seriously weakened and objectively played the role of de-localism. Nevertheless, China’s efforts to decolonize failed at that time, and the creation of state subjectivity locally failed to achieve either, which weakened political, military, ideological and economic power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local area”. Meanwhile, it also caused great personnel and economic losses to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and areas along it as well. After the incident,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ocal area” was deepened, social order was in turmoil, and people’s life got into trouble. The Soviet Union’s military aggression hurt the feelings of two peoples. Cultural exchanges were blocked, and commercial dumping policies of the Soviet Union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shook the local economic foundation centered on the railway economy.

【Key Words】Sino-Soviet Relationship,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Incident, Northeast China, the Far East of the Soviet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До инцидента на Китайско-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е (КВЖД) в конце 1920-х годов процесс «локализации»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динамическ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КВЖД и прилегающих к ней районов привело 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локальных» образов и концепций «локального централизма». Данная «локальность»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деполитизацией «локального», статусом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и доминирующей сил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нцидент на КВЖД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локальности» разрушил прошлые «локальные образы» людей, уменьшил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и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КВЖД и прилегающих к ней районов, а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над местным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порядком была серьёзно ослаблена, объективно это сыграло децентрализующую роль. Однако в то время усилия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и претерпели неудачу, не удалось создание «локального» субъективизма,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ослаблению «лок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ощ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я, а также привело к огромным людским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потерям КВЖД и прилегающих к ней районов. После инцидента степень колонизации «локальных» районов углубилась, стала наблюдаться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а жизнь людей оказалась в затруднитель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Военные вторж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несли урон чувствам людей Китая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обмены были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ы, а 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демпинг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мешала развитию мест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потрясло мест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ую н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нцидент на КВЖД,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Китая,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